



北京文博

创刊
初题

2010.3 (总 61 期)

● 文物工作

古都传统文化与“人文北京”建设

——文博工作在“人文北京”建设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孔繁峙 (6)

关于文物资源合理利用若干问题的思考 刘景地 (11)

国营文物商店的前景与出路 李 惠 (15)

● 博物馆学

新形势下北京地区博物馆文化事业发展思路的几点思考 李学军 (18)

● 考古简报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西晋墓葬发掘简报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昌平区文化委员会 (24)

● 文物研究

紫砂茗壶赏析 于振华 (29)

延庆花盆关帝庙二十司地狱壁画考辨 范学新 (34)

大觉寺《大明敕谕》碑考述 王 松 (39)

清代孔雀挂屏中金线的制作工艺研究 李玉玲 李 涛 (44)

从《胤禛行乐图》看雍正帝的淡泊情怀 徐 瑾 (47)

● 北京史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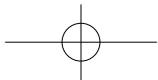
《五帝本纪》黄帝“合符釜山”“邑于涿鹿”地望考实 葛英会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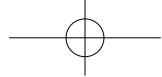
从亦庄的考古发现探亦庄的历史 张治强 (59)

门头沟区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 顾大勇 (69)

韩愈和北京国子监土地祠——从“优入圣域”匾额说起 王琳琳 (72)

二闸——明清北京的公共休闲空间 周 峰 (78)





北京文博



2010.3 (总 61 期)

从明、清北京孔庙祭孔析清代尊孔 常 硕 (82)

妙峰山古香道中北道漫考 王晓军 (87)

● 文物保护

清代明黄色缎刺绣夔龙拱福纹织成宝座垫套的修复保护 卫 国 (93)

北京丰台王佐遗址出土金属器的初步科学分析

..... 杨 莉 李延祥 李建西 (96)

● 资料信息

北京市文物局 2010 年二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尹 君 (101)

封面、封底：孔庙俯瞰图、孔庙大成殿内景

封二、彩插页：北京市文物局召开文物系统 2010 年度上半年工作总结会

封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部分介绍（十三）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 问：侯仁之 李学勤 吕济民

主 任：宿 白 副主任：孔繁峙 廖静文 王世仁 曹子西 齐 心 马希桂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 平 王 丹 王丹江 王玉伟 王有泉 王 岗 王鸿年 巴爱民 卢迎红 许 伟

刘开阳 刘建业 刘超英 向德春 李建平 吴梦麟 宋大川 张若妮 张展(大) 张展(小)

陈 旭 赵其昌 郝东晨 郝志群 姚 安 耿春卫 高小龙 高凯军 郭小凌 崔国民

葛英会 韩 扬 舒小峰 温桂华 谭烈飞

主 编：陈晓苏 编辑部主任：韩建识

本期责编：韩建识 陈 倩 高智伟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辑出版：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

北京文博网网址：<http://www.bjmuseumnet.org>

《北京文博》电子邮箱：bjwb1995@yahoo.com.c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 3, 2010

● CULTURAL RELICS WORK

Ancient Capital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nstruction of “Humanistic Beijing”——Important Promotion Effe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istic Beijing” by the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Work

..... by Kong Fanzhi (6)

Reflection on Some Questions of Reasonable Use of Cultural Relics Resources

..... by Liu Jingdi (11)

Prospect and Way out for the State-Operated Cultural Relics Store by Li Hui (15)

● MUSEOLOGY

Some Thoughts on Development Idea of Cultural Cause of the Museums in Beijing Area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by Li Xuejun(18)

● ARCHAEOLOGICAL REPORT

Brief Report on Excavation of Tomb of Western Jin Dynasty in Shahe Town,Changping District, Beijing City

..... b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 Changping District Culture Committee(24)

●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Dark-Red Enamelled Pottery by Yu Zhenhua(29)

Studies on Frescos of Twenty Si of Hell in the Temple of Guan Yu in Huapen,Yanqing

..... by Fan Xuexin(34)

Study on Stele of Great Ming Constitutiones Principum in the Dajue Temple

..... by Wang Song(39)

Research on 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Golden Thread of the Peacock Hanging Screen of Qing Dynasty

..... by Li Yuling, Li Tao(44)

Study on Quietism Feelings of Emperor Yongzheng through the Paintings of Yinzhen Enjoying His Leisure..... by Xu Jin(47)

●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BEIJING

The Textual Research about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Yellow Emperor “Hefu Fushan” and “Yiyu Zhuolu” Recorded in the *Biographic Scketches of Five Emperors* by Ge Yinghui(53)

Inquiry into History of Yizhuang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Yizhuang

..... by Zhang Zhiqiang(59)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Resources of the Great Wall of Ming Dynasty in Mentougou District

..... by Gu Dayong(69)

Han Yu and Land Hall in the Imperial College of Beijing——Speaking from the Tablet of “Youru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 3, 2010

Shengyu”..... by Wang Linlin(72)
 The Second Dam—the Public Rest Spac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Beijing
 by Zhou Feng(78)
 Analysis on Respect to Confucius in Qing Dynasty from Sacrifices for Confucius in Beijing Confucius
 Templ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y Chang Shuo(82)
 Study on the Middle and North Way of Ancient Pilgrimage Way in Miaofeng Mountain
 by Wang Xiaojun(87)

●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Repair and Protection for Throne Cushion Case Woven by Bright Yellow Satin Embroidered with the
 Pattern of Hydra-dragons Surrounding the Bat with the Symbol of the Happiness of Qing Dynasty
 by Wei Guo(93)
 Preliminary Scientific Analysis on Metal Wares Unearthed in the Sites in Wangzuo,Fengtai,Beijing
 by Yang Ju, Li Yanxiang, Li Jianxi (96)

● DATA AND INFORMATION

Chronicle of Events Concern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2nd Quarter of 2010)..... by Yin Jun(101)

EDITORIAL BOARD OF BEIJING WEN BO

Advisors:Hou Renzhi, Li Xueqin, Lv Jimin

Chairman:Su Bai

Vice-chairmen:Kong Fanzhi, Liao Jingwen, Wang Shiren, Cao Zixi, Qi Xin, Ma Xigui

Members:Yu Ping, Wang Dan, Wang Danjiang, Wang Yuwei, Wang Youquan, Wang Gang, Wang Hongnian, Ba Aimin, Lu Yinghong, Xu Wei, Liu Kaiyang, Liu Jianye, Liu Chaoying, Xiang Dechun, Li Jianping, Wu Menglin, Song Dachuan, Zhang Ruoni, Zhang Zhan(Elder), Zhang Zhan(Younger), Chen Xu, Zhao Qichang, Hao Dongchen, Xi Zhiqun, Yao An, Geng Chunwei, Gao Xiaolong, Gao Kaijun, Guo Xiaoling, Cui Guomin, Ge Yinghui, Han Yang, Shu Xiaofeng, Wen Guihua, Tan Liefei

Editor-in-chief:Chen Xiaos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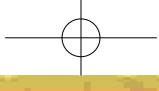
Director of Editorial Department:Han Jianshi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issue:Han Jianshi, Chen Qian, Gao Zhiwei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Book and Data 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URL:<http://www.bjmuseumnet.org>

BEIJING WENBO E-mail:bjwb1995@yahoo.com.cn



古都传统文化与 “人文北京”建设

——文博工作在“人文北京”建设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孔繁峙

以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为标志，北京城市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是继承发展奥运成果、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首都社会继续发展的新战略。其中“人文北京”建设理念的确立，是当前全市文博行业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首都发展大局，推动首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目标。

文博工作作为北京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首都建设事业中的人文发展、传承民族优秀历史文化、提升广大民众的文明素养和推动首都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落实“以人为本”理念，全面推进“人文北京”建设过程中承担着重要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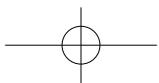
北京目前发现有 70 万年以来各时期人类社会生存、生产、生活的丰富的遗迹和遗物，有三千年以来城市发展史和八百余年建都史，为北京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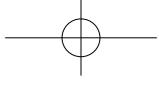
北京古都所保留至今的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既有物质方面的，也有文化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在物质方面，北京古都既有给人直观的蜚声中外的皇

宫御苑、长城陵寝及大批名城历史建筑，也有坛庙教堂、王府名苑、名人故居以及成片的胡同、四合院等传统建筑；在文化、精神方面既有博大精深的古典文献、诗书礼乐，也有以爱国主义、民族气节而激励后人的文天祥、于谦等一批民族“精英”文化。北京古都千百年来积淀的民族历史文化，在社会发展的历程中，永久持续地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今新时代，将会成为首都北京迈向现代化新阶段的持续发展的动力。

一、文博工作在“人文北京”城市建设中彰显古都城市民族传统的人文形态

在“人文北京”建设中，保护和延续古都名城的历史建筑，重塑古都历史特色的“人文北京”城市传统文化风貌。充分利用北京古都名城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在中华民族千百年形成的文化传统的根基上，打造北京世界城市新的城市形态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使命。





北京古都名城的历史建筑和文化遗存，代表了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古老文明，承载着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应成为首都北京向世界城市迈进的文化特色。在当前“人文北京”建设中，要充分利用和保护好古都城市的历史底蕴，在世界竞争发展中，凸显出古老的中华文明在首都城市发展中卓越的生命力。

首都的“人文北京”建设工程中城市人文环境的发展，要特别突出保护和展示北京古都名城的整体价值，从宏观上展示北京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名城历史建筑：一是，突出展示古都名城的整体格局，其完整的规划设计和营造体系，在世界都城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皇宫处于全城中央；天、地、日、月四坛布局于京城四周；皇城内的风、雷、雨、电等四神庙宇，分布于皇宫两侧；完整的南北中轴建筑贯穿于外城、内城、皇城、皇宫的中央；“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功能布局等，都承载着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为世界所关注；二是，在“人文北京”的人文环境建设中，要保护和展示北京名城三千多年城市发展的历史系列，将考古发现的数千年以来北京城市各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如西周燕都遗址、春秋燕都遗址、汉唐幽州城址和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墙遗址等形成一个完整的城市发展系列，全面展示北京古都城市发展过程与时代特色，以丰富“人文北京”建设的历史文化内涵；三是，保护和展示全市各种类型的历史建筑系列，再现古都名城传统建筑景观特色，通过维修保养等措施，在古都城市内逐步形成王府宅第系列、坛庙道观系列、名人故居系列、会馆教堂系列、传统老字号系列、历史街区系列等最具古都特色的传统建筑群落，以整合和丰富首都城市的历史人文景观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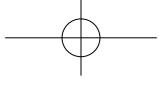
二、在首都“人文北京”城市建设中 弘扬古都名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性

北京作为古都名城，在三千多年漫长的城市发展岁月中，创造了足以令世人神往的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承载着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其优秀文化千百年来传承延续，历岁月而常新，在当今，已成为北京城市迈向国际的软实力，也是促进“人文北京”建设发展的凝聚力与推动力，并凸显以下五个方面的文化特性：

一是，在“人文北京”建设中，展示中华民

族于千百年形成的维护民族团结、坚持国家统一的历史文化特性。北京名城的许多历史建筑和文物遗迹，都体现了我国在秦统一以来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全国始终保持和延续了“书同文、车同轨”的国家大一统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在元、明、清三朝都城的时代发展中，更是把这种国家大一统的文化发挥到极致。从全市众多的遗迹中可以看到，北京历史上无论是蒙古人做皇帝时期的元朝，还是汉人做皇帝时期的明朝以及满族人做皇帝时期的清朝，在全国都始终推行规范统一的汉文字，与此同时，各少数民族的文字和文化也同时存在。北京保留至今的元、明、清历代的文物建筑、碑文石刻以及诏书典章中，都共同书写汉文、蒙文、满文及藏文等民族文字。在一些重要的建筑上，如元代在居庸关建造的“云台”过街塔基门券内，就共同铭刻有蒙文、汉文、藏文、维吾尔文、西夏文等六个民族的文字；在清代建造的很多重要建筑，或者同时书写汉文和满文，或者只书写在全国流行的文字——汉文，……大量的历史遗迹和遗物，都充分体现了我国历史上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传统文化特色。今天，北京作为全国的首都，在建设现代化和向世界城市目标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和弘扬历史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其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在世界动荡的环境下，切实增强各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向心力，共同维护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

二是，在“人文北京”建设中，展示中华民族历史传统文化延绵传承的特性。历经数万年人类社会的演变和数千年城市建设发展的北京古都城市，承载着巨大的民族历史文化价值，凝聚着中华民族代代相传坚强不屈的发展精神，这是北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世界城市发展的雄厚的传统文化根基。要充分利用北京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展示距今70万年前著名的“北京猿人”遗迹、遗物；展示十几万年以来的“新洞人”和“山顶洞人”的遗迹及文化；展示距今2万年和1万年前的东方广场人类遗迹和门头沟东胡林人以及6千年前的平谷上宅文化；展示古都城市历经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明、清等历代的发展而形成完整的时代系列。这些历经数万年的人类社会延续和数千年来城市的演变过程的历史遗迹和遗物，见证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起落，记录了中华民族漫长历史变迁的珍贵线索，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将向世人展示出，中华民族在艰苦漫长的社会发展中，获得了卓绝旺盛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保持了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延续性，这将极大的激励和提升



全市人民建设世界城市的信心。

三是，在“人文北京”建设中，展示北京历史上多民族相聚共存的民族和谐文化特性。我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长期以来，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城市，往往是全国各族民众汇集之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居住于古城城内的各民族既保持了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又形成了古都特有的多民族的文化融合，为中华民族始终保持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京在元代再度成为统一国家的都城后，在元代大都城内就高度汇集了全国各族人士在此居住和生活，并初步形成蒙、满、汉、回、藏、维等不同民族的聚居区，再经明、清两代的发展，北京地区各民族不但保持和延续着各自鲜明的民族习俗和文化特点，而且最终形成北京历史上特有的多民族文化并存及相互融合的文化现象。北京作为国家首都都是各族民众一心向往的城市，北京的各族民众和睦相处是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的缩影，北京城市的建设发展更是离不开各民族的共同努力。

在当前开展“人文北京”建设和世界城市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保持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增强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自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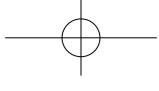
四是，展示北京历史上多元文化长期兼容并存的文化特性。以维护民族和谐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是各族民众千百年来同甘苦、共患难而形成的一种民族精神，是当今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北京历史上的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岁时节日和宗教信仰；在文化上，都延续了本民族的文字及观念；在建筑上，都保持着各民族的特色；在生活上，各有其遵循的习俗；在信仰上，也各有其宗教派别。尽管各民族在文化上各有不同，但都能相互融汇在古城城内，自元、明、清以来，各民族所信仰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正一道教、伊斯兰教的各类寺、院、庙、观、堂、宫等建筑在京城比比皆是，各教派在宗教节日中举办庙会、法会等丰富多彩的宗教活动时，其他各族民众和不同教派的信徒都能前往“进香”和“布施”，都能相互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并相互学习其优秀之处，从而形成了北京历史上特有的多民族和睦交往、相互融合的文化，并成为北京历史文化的一大特色——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在“人文北京”建设中，要充分发掘和展示历史上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内涵，继续保持各民族的文化特色，推进和不断增强各民族间的团结和凝聚力。

五是，展示古都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北京传

统文化特性。学习吸收国外的先进文化，发展和提升民族文化，是古都北京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文化传统，对于当前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具有重要的意义。元代的北京城，即是一个开放的大都市，与世界众多国家都有经济文化的交往。在北京保存至今的元、明、清历代的遗迹、遗物和文献记载中，京城百姓与外国的宗教人士、学者、建筑师、艺术家、科学家、旅行家等人士有着密切往来，广泛的吸收学习国外的科学技术与先进文化。元代的尼泊尔人阿尼哥为大都城设计修建了大圣寿万安寺（即白塔寺）白塔，为元代北京带来了佛塔的营造技术，至今仍是北京城一项标志性建筑。元代的意大利旅游者马可·波罗在元大都城的游览记载——《马可·波罗游记》，向世人展示了元大都既是一座向世界开放的城市，也是一座广泛吸纳各国文化的城市。元代以来的国子监和会同馆都曾有外国留学生和贡使人员居住的记载；明代后期欧洲一批传教士曾为北京带来西方先进的科学仪器和机械工艺等近代文化知识，如耶稣会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葡萄牙人徐日升、比利时人南怀仁、意大利人郎世宁等都在朝廷中传播测绘、天文和绘画等科学知识。同时，还带来了西方的建筑技术，如明代意大利人利玛窦主持建造的宣武门天主教南堂、清初建于东城的天主教东堂、清中期建于西城的天主教西堂、清后期建于皇城的天主教西什库教堂、东正教堂和亚斯立堂、圣心佑贞女中等一批教会建筑以及清末建于东交民巷具有多种欧式风格的各国驻清使馆建筑，特别是在举世闻名的圆明园中还建有完全欧式的“西洋楼”景区等等，这些都是古都历史上吸收借鉴国外先进文化的产物，并在此基础上促成了北京古都城市传统建筑的革命——中西结合的近现代建筑，使得古都城市的建筑景观和城市风貌产生了全新的变化，并成为那段历史中西文化交流的物化的记忆。在当前“人文北京”建设的新形势下，需要我们以更加开放的精神，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和科学理念，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北京世界城市。

三、充分发挥古都名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文北京”建设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建设“人文北京”是首都今后科学发展的战略方针，建设世界城市是首都未来发展的宏伟目标。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和历史文化名城，既是民族传统文化非常丰富的城市，又是最具发展潜力的现代



化的大都市。北京城市的发展应依托千百年积淀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影响力，当前，在“人文北京”建设和向世界城市发展的进程中，要突出展示和发挥古都优秀历史文化在五个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发挥古都传统文化在推动首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的重要作用。当前，古都历史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作用，在于如何将民族历史文化价值转换成北京城市现代经济新发展的创新要素，形成具有北京传统文化特色的产业文化经济。后奥运时期，北京市已对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做出了重大调整，以“首钢”为代表的一大批工厂和生产企业已全部搬迁或停产，在这一新的发展时期，文博事业应以突出古都历史文化内涵及区域历史文化特色为核心内容，在当前首都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发展中作出重要贡献。要充分利用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将北京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多种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重要资源，以促成和发展首都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首都的多项产业、服务业和城乡旅游业的新发展。

在北京城市的发展中，要全面保护和充分利用城乡保留至今的各类历史建筑、名胜景区、成片的历史街区和民俗村落、传统民居以及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为北京特有的文化产业和旅游资源，在不断培育北京文化经济新的增长点带动首都文化创意产业，促成现代服务产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全市文博行业在促进首都经济增长以及在加快首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大。如著名的明十三陵、居庸关、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司马台长城以及云居寺、川底下村等一大批历史文物景区的开放利用及影响力，已发展为一种文物经济，并成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亮点。当前，北京名城内成片的四合院胡同等历史文化街区，正逐步成为国内外游人参观的具有国际影响的游览、休闲区域，如什刹海、南锣鼓巷、国子监街、烟袋斜街等历史街区的多种开放利用方式，都围绕着旅游服务业形成了多种内容的文化产业经济，带动了社会就业，打造了区域性的文化经济业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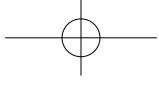
随着“人文北京”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古都名城的各类文物建筑如王府宅第、坛庙寺观、历史街区、名人故居、传统老字号等历史资源中所蕴藏的、独特的传统文化内涵，在北京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将会在科学保护、合理利用的基础上，为促进首都的经济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

（二）发挥凸显首都城市东方传统文化特色的作用。建设“人文北京”，特别是实现世界城市的

宏伟目标，北京需要打造高水平的现代文化，但更需要继承和弘扬悠久的传统文化。北京为在奥运会期间更好地向世界展示北京的城市形象和文化特色，对全市重要的名城建筑和文物建筑，采取了大规模的修缮保护措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一大批历史文物建筑和传统四合院，通过修缮整治后恢复了传统风貌，近40处文物保护单位实现了对社会开放，使北京市在奥运会期间向世界展示了东方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北京名城保留至今的历史建筑精华，如皇宫、皇城、中轴建筑和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城市整体布局以及成片的胡同四合院，都是极具东方特色的民族传统建筑，这是北京重要的城市建筑风貌和城市文化特色，在世界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人文北京”和建设世界城市，是北京城市建设发展的新目标。历史上，北京古都名城在规划建设尊重生态、尊重环境、追求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理念及由此表现出的城市文化观念，无疑会对北京城市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全面保护和充分利用北京古都城市的优秀历史建筑及文化特色，将使北京建设的世界城市更有文化，更有特色，也才真正能够走向世界。

（三）发挥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作用。在北京历史名城中具有一批思想文化内涵丰富并富有教育意义的文物建筑及遗迹，承载着北京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光耀千古的爱国志士及精英人物的动人事迹，是发挥民族优良传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教材。如反映历史上爱国主义精神的明代文天祥祠、谢叠山祠、于谦祠，清代的袁崇焕祠、庙和墓以及康有为故居，孙中山逝世纪念地等等，都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此外，北京作为我国近现代革命运动的策源地，目前仍保留有很多近现代革命运动及活动史迹：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地——东城区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旧址；革命先驱李大钊同毛泽东共同组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最早传播马列主义科学思想的重要阵地——北京大学红楼；1919年爱国学生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发源地——“五·四广场”原址；1920年李大钊、周恩来参加的京津两地进步社团召开会议进行革命活动的陶然亭慈悲庵和五四时期著名进步刊物《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旧址以及北平地下党组织开展秘密活动的多处办公、接头、活动的旧址等一批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充分利用北京众多的反映爱国主



文物工作

义、革命传统内容的各类遗址、遗物，面向社会生动展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难历程，广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不断激发全社会的爱国热情，激发民族的自尊心和国家建设发展的自信心。

(四) 发挥文化、科学知识传播场所的作用。北京古都是我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城市，全市各类的文物建筑和遗迹、遗物，都包含着古代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和高超的制作工艺，承载了古代的科技成果、科学知识和民族工艺技术等多种传统工艺知识。如建筑规模宏伟的皇宫王府，包含了我国几千年的营造技术和建造工艺发展历程以及我国高超的民族传统建筑科学知识；建筑精美、巧夺天工的古典园林，凝聚了我国数千年来的民族传统工艺技术以及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历史悠久、形制各异的街区坊巷、胡同四合院，则反映了我国千百年来北方民居制造技术、工艺及营造观念的发展与变化；全市众多的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名人故居所展示的各种考古发现、出土文物、陶瓷铜器、书法绘画等专题展览更是包含了我国历史上多项领先世界的发明创造和技术成果等等。北京古都保存至今的各类历史文化遗产项目，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铭刻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在“人文北京”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通过保护、开放、研究、宣传等措施，展示古都历史遗产的文化内涵，通过丰富的展品、高品位的展览和多种研究成果以及内容丰富的出版物、媒体宣传等多种方式，并以免费开放、展览进入学校、深入小区的方法，向社会展示古都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文物知识，宣传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发明与创造，使全市每一处文物建筑、历史遗迹和每一座博物馆都成为展示民族传统文化和古代科学知识的载体，成为展示传播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文明进步成就和古代科技知识的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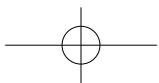
(五) 在对外交流工作中发挥文物提升北京市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作用。北京作为古都名城，代表了东方的古老文明，在世界上具有独特的影响力，全市各类著名的文物景区和文博单位，是接待国际来华宾客参观、游览的重要场所，增进了世界各国对北京的了解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古都历史文物在国家对外交流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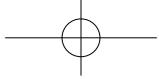
举办奥运会期间，全市各文物单位都以高水平的开放、展览，成功地接待各国来宾的参观、游览，使来宾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为北京奥运会增添了光彩。近几年，随着北京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展，首都博物馆先后赴法国、美国、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举办了多场古都历史文物展览，吸引了各国民众踊跃参观，获得了极好的展览效果，扩大了北京城市的国际影响，使展览活动成为展示古都传统文化和外国民众了解中国文化、认识北京的重要“窗口”。此外，我市一批各具特色的文博单位，充分利用文物资源优势，走出国门，与国外开展文物交流活动，如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与法国钟铃博物馆建立了文物的交流互展；北京孔庙与越南、新加坡等国家的“文庙”也建立了联系。在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形势下，为进一步扩大北京与国际的友好交往，提升北京的国际影响力，市文物局按照市政府的对外工作计划，先后在泰国首都曼谷、加拿大的温哥华、哥斯达黎加等国家，修建了最具中国民族历史文化特色的亭榭和过街牌楼等传统建筑，成为当地中国民族文化的象征。由此可见，北京古都文化的对外交流，是向国际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是展示北京形象、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有效方式。

北京文博工作要按照当前建设“人文北京”和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要求，积极配合首都的外事工作大局，进一步扩大与国际社会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加大文物对外展览的推介力度，以多种方式向世界展示古都北京辉煌的文明成就和我国对外和谐发展的文化理念，增进国际社会对北京城市的了解，真正使文物展览成为北京走向世界、世界了解北京的重要窗口。

“人文北京”建设，是向北京的未来提出了一个建设“新型城市形态”的概念，其发展方式将在北京历史文化特有的精神价值的基础上，培育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首都城市文化，其最终发展目标是提升北京城市整体文明程度，进而为国家首都创造一个全新的城市文化环境。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局长)





关于文物资源合理利用若干问题的思考

刘景地

东城区作为首都的中心区，是全市文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体现在文物保护单位最多、历史文化街区最多、胡同四合院最多。珍贵的文物资源不仅是东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的物质基础，也是东城区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近年来，东城区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积极探索、勇于实践，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的业绩。在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下，特别是按照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要求，重新认识、审视东城区丰富的文物资源，形成以下思考。

一、对东城区文物资源的再认识

（一）基本情况及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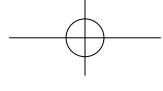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东城区是全市文物资源最丰富、最集中的地

区，具有鲜明的皇城文化和旧城风貌的地域特征。皇宫建筑、典章遗构、王府衙署、胡同宅院、寺庙祠观、近代楼宇等文物建筑一应俱全，具有数量多、品级高、密度大、品种全的特点。数量多：现有三级文保单位 127 项，其中国家级、市级占全市总数的 26%，还有大量的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及挂牌保护院落。旧城内 33 片历史文化街区中，东城区占 17 片，总面积 907 公顷，占东城区总面积的 36%。品级高：以世界文化遗产故宫为代表的太庙、社稷坛、皇史宬、地坛、孔庙、国子监、雍和宫等一大批皇家建筑。密度大：全区文物资源占地 200 多公顷，建筑面积 80 多万平方米，平均每平方公里有 10 处不可移动文物。品种全：皇宫、王府、坛庙、宅院、学堂、园林、教堂、名人故居、历史街巷、近现代建筑，一应俱全。

（二）对文物资源的理解

一般认为文物资源是指文物古迹。随着保护观





文物工作

念和方法的拓展,文物资源或遗产资源不仅仅指实物遗存,还包括历史、自然环境及文物建筑所承载和体现出来的特定历史信息 and 人文内涵,它既包括有形的也包括无形的。东城区总面积 25.38 平方公里,其中旧城内面积 18.18 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 71.6%。依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中“旧城坚持整体保护的原则”,对东城区文物资源也应该从整体去认识和理解。至少是四个层次,即旧城的整体、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和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因此,由众多文物古迹、传统院落胡同、历史街区而组成的物质遗存、灿烂文化、深厚底蕴以及所传达的信息和营造出的氛围,既是我们理解的文物资源,也是我们所理解的文物“大资源”的概念。

(三) 合理利用的法制依据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文物保护法》确立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全面准确地揭示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为我们合理利用文物资源提供了法律、法规依据。“保护为主”是核心,“抢救第一”是前提,“合理利用”是途径,“加强管理”是关键。“十五”以来,市、区政府不断加大文物修缮整治力度,一大批文物古迹得到修缮保护,对修缮后和将要修缮的文物建筑如何利用,成为实际工作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四) 合理利用是科学的保护

通过合理的利用充分保护和展示文物古迹的价值,是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利用主要是指服务于当前的实用功能,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为准则,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有效利用文物古迹创造经济效益。众多文物古迹中,比如王府宅院及近现代建筑,其设计建造本身就是为人所用、“以人为本”的,其功能设计与合理利用本质上不矛盾。

文物保护与利用是相辅相成的。合理开发利用文物资源是保护文物的有效途径,为文物保护提供了物质基础,还可以进一步提升社会影响力和地区的品位。正如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指出,只要人们在合理利用,文物资源就会被关心,也会避免因闲置而加速损毁,让旧载体衍生新功能,既有利于节省能源,又有利于环境保护。

二、文物资源合理利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 合理利用的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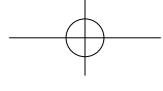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1、合理利用为文物保护开辟了途径

东城区利用文物资源开发特色旅游服务已经成为一大亮点,突出表现为,以“两南”(南锣鼓巷、南新仓)为代表的特色街建设成效显著和以特色院落为代表的会所、宾馆、餐馆开始形成气候。据统计,全区特色院落已有 90 多家,基本都在历史文化街区,既有高档会所也有特色小馆,约有 10% 是利用文物古迹。如:“前门 23 号”原美国公使馆旧址(市保单位),始建于 1903 年,占地 16000 平方米,由一座主楼和 4 栋官邸组成,建国初期为市政府使用,以后作为外交部办公及接待场所,改革开放后,作为第一批外资企业办公及内部接待,现为钓鱼台前门国宾馆。旧址见证了中国外交史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2006 年,在文物部门和专家的指导下,管理单位与著名文化名人李景汉先生合作,对旧址保护利用做了统一规划设计。整个修缮方案,包括修缮加固文物建筑,拆除临时建筑,整治院内环境,重新规划设计非文物建筑,依据历史档案复建使馆大门。修缮整治后的旧址既有效保护了文物又满足了使用功能。目前旧址已辟为集世界知名餐厅、当代艺术中心、多功能剧场、商务俱乐部于一身的极具艺术品质的商业新景点。近日,由英国《餐馆》杂志(Restaurant)评选出的全球最佳 100 家餐馆,前门 23 号的布鲁宫法餐厅是大陆唯一入选餐馆。像“前门 23 号”这样合理利用文物并收到成效的还有很多,如:前鼓楼苑 7 号的秦唐客栈、国祥胡同甲 2 号金融会馆、桂公府、嵩祝名院等。实践证明,合理利用为保护文物开辟了有效途径。

2、合理利用文物资源的几个特点

合理利用文物资源可以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物古迹的社会效益突出,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一是由文物古迹的社会效益形成的地区知名度,带来的经济繁荣和相邻地段的土地增值;二是以文物古迹为主要对象的旅游收益以及带来的商业、服务业和其它产业效益;三是与文物古迹相联系的文化市场和无形资产、知识产权的收益;四是依托文物古迹的文艺作品创造的经济效益。

目前东城区利用文物资源主要是文物本体的利用,有以下几个特点:从主体上,多是引进投资保护人合作开发的方式;从时机上,多是伴随文物建筑修缮整治或管理使用单位机构变化;从业态上,多是会所式经营,餐饮占主体;从投资上,由于文物的特殊性,修缮整治资金特别是腾退的资金数额



较大。如前门 23 号总投资已超过 2.4 亿元，几家四合院会所也都在数千万；从运作上，多是发挥好两个积极性，即产权管理使用单位和保护人的积极性。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主要是法规上把关、政策上引导，做好服务工作。

(二) 当前文物资源合理利用工作存在的问题、难点及机遇

东城区为拥有丰富的文物资源感到骄傲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在文物资源的合理利用上还存在着差距，丰富的文物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还不够明显。

从文物资源自身看，突出表现为“几多几少”：即数量多、利用少；资源多、产品少；破损多、修缮少；区域多、区属少。一是多数文物古迹被不合理占用，且腾退难度大，未发挥文物应有的作用。目前，全区三级文保单位合理利用约占 30%。二是一些文物建筑年久失修，破损严重，有的存在严重的火险隐患，实现合理利用需要大量资金，而使用单位一时无法解决。目前文物多是抢险修缮，整体修缮率只占 15%。三是对文物资源多是单体保护和利用，缺乏整体保护与开发利用，文物资源与旅游相结合，形成旅游产品并产生效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四是多数文物资源为中央、市属单位及部队使用，区属单位仅占 20%，且多为民居，房屋破损严重，修缮率较低。五是对文物资源挖掘研究不够，没有形成系统、有深度、可利用的基础材料，服务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物资源的有效利用。

从已开发利用的文物资源看，反映以下几点：一是投资大，收益周期长。由于文物建筑的年久失修，前期的修缮投资大，后期的开发利用力求稳妥安全，获得收益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二是交流少，宣传推介不够。希望政府提供交流平台，通过媒体或相关部门多渠道的进行宣传推介，扩大影响力，提高知名度，增加经济和社会效益。三是环境差，基础设施不足。建议加大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解决文保单位周边基础设施不足、卫生环境差、电线杆占地、停车难等问题，为开发利用提供良好的环境。

在看到问题和难点的同时，还应清楚的看到面临的机遇：一是政策法规和思路的更加完善明确。市政府确定了既要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又要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战略。二是社会各界对文物价值的认识日益增强，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为多元化保护利用创造了条件。三是经济实力的增强。政府有能力安排财力，加大投入，用于整治、

修缮文物项目，恢复历史风貌，改善市政条件。四是“人文北京”建设的新契机。北京不但要向世界展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一面，而且要展示世界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面，东城区作为文物大区应该有所作为。五是文物古迹进入新的修缮周期和使用周期，加之文物安全责任重大，多数中央、市属单位对居住类房屋有了新的想法，有的明确表示，如能搬迁居民愿意放弃产权，这为区域统一规划，实现产业功能，借力发展提供了机遇。

三、具有合理利用潜力的文物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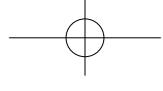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东城区现有文物资源有着巨大的开发利用潜力，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 依托皇城文化的王府坛庙。王府是清代特有的建筑规制，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据调查统计，北京尚存王府邸共 46 处，东城区有 21 处，占 46%。其中孚王府、宁郡王府、恒亲王府、惠王府、循郡王府等府邸主要建筑现为单位占用，有的已经实现腾退修缮，有的办公功能已经弱化，都有开发利用的可能。此外还有地坛、雍和宫、柏林寺、宣仁庙等历史古迹。

(二) 依托历史文化的重要古迹。国子监始建于元大德十年（1306 年），至今已有 700 年历史，是元、明、清三朝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机构，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保存完整的古代大学校址，辟雍是唯一一座古代皇帝讲学的宫殿，孔庙国子监浓厚的国学文化氛围为有效开发利用创造了条件。除故宫外同样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重要建筑，还有太庙、社稷坛、地坛、钟鼓楼、古观象台、皇史宬、宏恩观、清末太医院等。

(三) 依托人文内涵的名人故居。名人故居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城区是重要历史事件和名人故居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据北京联合大学 2005 年调查，四城区名人故居 256 处，其中东城区 76 处，占总数的 30%。现存名人故居中，除少数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或辟为博物馆外，多数为居民、单位占用。名人故居不仅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也是重要的旅游资源。

(四) 依托历史街区的胡同四合院。胡同四合院是构成历史街区的主要载体，东城区是现存胡同四合院最集中的地区，全市有 658 处挂牌保护院落，其中东城区 333 处，占 50.6%。全区现有平房 230 万平方米，其中直管公房 115 万平方米，占 50%。按目前认定标准，至少有 40% 的平房院落格局完整，周边胡同肌理较好，可以认定为有保护价值建



文物工作

筑。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北京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指出“鼓励城八区开辟以名人故居、胡同和传统街区为核心的历史文化旅游区，利用家庭、院落、街道推出国际旅游访问点，形成系列特色京味文化旅游产品”，东城区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五) 依托历史事件的近现代建筑。东交民巷记录了近代中国一段屈辱的历史，承载着深重的历史烙印。同时，使馆区的建筑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这里集中了墨非、片山东熊等世界著名设计师的作品。东交民巷特殊的人文历史、独特的城市景观及重要的历史事件，使这一地区极具利用前景，“前门 23 号”的开发正是基于这一点。此外，北大红楼、京师大学堂、中法大学、清末陆军部海军部旧址（段祺瑞执政府）、后沟胡同 2 号院“九栋别墅”、朝内大街 81 号院等“洋风建筑”都具有很好的利用前景。

(六) 依托文化氛围的现代化设施。文物资源的合理利用，不仅是文物本体的直接利用，还应该包括间接利用。东城区众多的文物古迹、名人故居、历史街区营造出的浓厚的文化氛围、鲜明地域特征及城市品质，其本身就是最大的资源。浓厚的文化氛围正是旅游、博物馆、影剧院、书店、画廊、餐馆、酒吧、会所等现代服务业所追逐的人文环境。

四、进一步推进文物资源合理利用

大力加强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不仅是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面临的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是文物保护工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一) 提高认识，更新观念。

丰富的文物资源是东城优势所在，是东城繁荣发展的基础。应不断增强现实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把保护好、利用好文物资源作为区情特色，纳入干部培训和市民教育，作为一种意识和观念扎根于东城区的干部群众中，逐步作为考核评价干部和工作的重要内容。充分分析、研究、认识文物事业的潜绩和显绩、长期和短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投入和产出，综合和单独成效，加强对文物资源内涵的挖掘和研究；按照“坚持原则，放宽理念”，在保护的前提下，多元化投融资，多方面整合利用，积极探索文物保护的新路子。

(二) 统筹规划，整合资源。

规划是政府的重要行为。坚持“政府主导”和“公益优先”，按照整体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编制好《保护规划》，按照保护规划，实现文物资

源的保护，促进文物资源的合理利用。首先把文化遗产作为重要资源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空间规划及产业规划，围绕东城区“二三六三”核心发展战略，落实《东城区文化强区战略纲要》要求。二是发挥中央、市属自管产资源优势，结合管理使用单位功能需求，用规划引导，协调推进文物资源的开发利用。鼓励管理使用单位，在保护前提下，发挥资源优势，“腾笼换鸟”，实现资源合理利用。三是文物资源的合理利用，要与文化旅游、风貌保护、城市建设、市政改造等项目相结合，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源整合，不求所有、但求所在、更求所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支持帮助其挖掘展示历史文化，营造历史文化氛围，提升文化品位，再现古都风貌。

(三) 创新机制，探索模式。

按照《保护规划》要求，积极探索文物资源合理利用的途径，学习借鉴好的作法和经验，结合文物资源特点，尝试“功能置换”、“腾退补偿”、“合作开发”等方式，为文物及有价值建筑腾退保护多渠道融集资金。针对投资大、门槛高的特点，完善以国家投入为主的文物事业和多渠道多元化投资文物产业的运行机制，积极探索融资运行机制，将四合院的修缮、改善、疏散和保护利用通过金融机构的资金担保依托社会融资，形成相应的金融产品。

(四) 完善设施，打造环境。

一是硬环境。继续加大旧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力度，改善文物古迹周边环境质量，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整治环境秩序。用环境吸引项目，用设施服务项目，为文物资源的合理利用创造条件。二是软环境。加强政策引导，积极为愿意投资文物保护事业的企业和社会单位提供指导服务，搭建交流的平台，大力扶持开发的特色院落，相关部门应研究通过减免税收等实际性措施，鼓励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向连锁化、品牌化发展。

(五) 统筹协调，形成合力。

文物保护工作不只是文化文物部门一家的工作，需要全区各部门共同努力。要达到文物资源的合理利用，充分发挥发改、建设、规划、文化、园林、旅游等相关部门作用，统筹协调，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文物资源的合理利用，发挥出文物在我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树立东城文化强区的形象，进一步服务于东城区乃至首都的建设和发展。

(作者为原东城区文化委员会副主任)



国营文物商店的前景与出路

李 惠

北京市文物公司下属的数家文物商店目前依然按照传统的经营模式进行经营管理和日常的销售活动。在文物市场日趋活跃、文物收藏品登上亿元时代的今天，保持那种传统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方法还能生存下去吗？这些国营的文物商店有前景和出路吗？我想回答是肯定的，有出路有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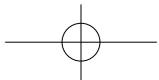
一、历史的回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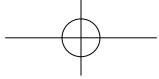
笔者 1978 年进入国营文物商店工作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1978 年的文物商店，每个部门窗子上都挂着统一的窗纱，一条仅四个字的提示“仅供外宾”让无数中国百姓与文物、与这个特殊的商店有了不能逾越的距离，也给文物商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陈列的商品按现在的标准来看可算是奢华。瓷器店里硕大的官窑粉彩鹿头尊、九桃瓶、带有标准官窑款的瓷盘、瓷瓶一点也不少见，字画店里大幅的近代名人字画、仿宋元的绢本传统山水画、翰林的书法字对比比皆是，商品柜存放的现代名人字画都是按画家名头分类的，比如：这一个柜子里

存放的全部是王雪涛的花鸟画，那一个柜子里存放的全部是颜伯龙的等等，这些名家的画当时只能算作三、四类的等级并不算起眼。那么一、二类的书法、字画也就是如今拍卖会上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名家字画大量的存放在普通的商品柜里。

“独家经营、特种行业”这个国家冠以的头衔过去一直是文物商店最大、最有效、最美丽的保护伞。市场上出现私人买卖文物一定是违法的，也一定会绳之以法。商店的领导所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教育职工遵纪守法，保证国家的文物细水长流为国家多赚取外汇。职工也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做好本职工作，恪守行业的规矩，保证文物商品不丢失不损坏。

文物商品的来源是多年来国家出资、文物部门组织到各地收购，也有老百姓自愿出让、转让的。那时百姓想出让家里的文物只有文物商店的收购部这一个渠道，所以不管什么人什么地方，只要有文物的交易一定是文物商店的人出头露面进行收购，因为那个时期社会上文物买卖严格按国家的规定，只有国营的文物商店有权收购。





那时的人们万没有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国家的发展、百姓的需求，文物买卖变成了大众的交易，文物市场变成了大众参与的市场，文物的买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这巨大的变化，一向墨守成规的国营文物商店还能生存吗？

二、文物市场的现状及其传统模式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新的国情，国家不断改变文物经营政策，文物经营不断市场化，各种属性的文物商店不计其数，拍卖文物的中介公司遍地开花，文物收藏的娱乐节目更是推波助澜的把文物的知识、价值向大众进行普及。特别是当今，文物的价值攀升到了亿元时代，这就像一种特效的强心针刺激了每一个藏有文物的家庭及文物经营者。每一个藏有文物的个体或集体都希望把自己存有的文物实现最大的价值、赚取最大的利润，这种巨大的诱惑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文物拍卖会上，也把人们的精力集中到追逐市场的动向上，其结果是文物的价值被迅速无限放大，从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外升级到日常生活当中，这种现象不管是在经营上还是在收购中都冲击到了国营文物商店。试想哪一家国营文物商店、哪一个传统门脸能够卖出单件价值上亿的文物（按规定那些都是线上文物，文物商店也无权经营），反过来哪还有人愿意把自己藏有的文物轻易转让给文物商店。文物商店上遇到商品来源的枯竭，下面临市场的不断萎缩，应该算是危机

四伏了。那么目前国有文物商店的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国营文物商店目前采取的传统经营模式是：由国家出资收购文物。根据市场行情由行业内的专家制定价格（价格一旦定下基本不变），再由各部门进行销售，每年完成一定的销售额（财务上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根据国家细水长流的文物政策安排销售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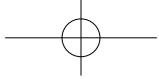
尽管市场上文物销售已经多元化了，但国营文物商店只能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线上文物不能销售，国家规定不能出口的不能销售，在允许的范围里进行零售。若要参与多元化的销售活动只能把文物商品送给旗下的拍卖公司。零售完全严格按照事先制定的价格和折扣份额进行销售。文物商店的职工由于执行统一的奖金制度和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收入基本上不受利润多少的影响，因此基本上是按照上级的要求进行工作，不用考虑市场影响因素及市场的各种变化。

近些年，文物商店的领导被市场巨大的变化及自身面临的危机压得不得不出一些办法与市场接轨，如：允许部门根据需要在拍卖市场上买一些东西，开放部门收购的权利等等。试想拍卖市场是多大的一个平台，买家形形色色，成交的价格是平台上公认的（价格会随着国内的经济形势起伏），这些价格回归到传统的门市里进行再销售有时显得非常尴尬。有些部门侥幸卖出了部分购进的商品，往往是搭了文物商店特有品质的快车或是遇有各种特殊机会。上要遵守国家政策，下要按照既定的目标进行销售活动，还要面对市场复杂因素的瞬息万变，对于一个把握有国家巨大财富的国有文物商店，身处市场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出路，如何让国家的文化遗产得到良性循环并创造出更多的人文和历史价值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要课题。

三、国营体制的潜力、优势及出路

国营文物商店毕竟是国家文物销售的主渠道并藏有大量的文物商品，虽然说并不一定每件商品的经济价值都很高，但其商品的数量之大和品种之繁足以让社会上收藏文物和经营文物的游兵散客仰慕。可以说文物商店是广大文物收藏爱好者信赖依靠的主要对象。

就体制而言，虽然过于严谨死板、制度化、程序化，但就是这种严谨的工作制度，制度化的管理手段恰恰成为广大文物收藏爱好者得以信赖的基础，因此得以保护了应回归博物馆的许多文物。比



如：文物商店的专家不会毫无根据的漫天定价，更不会有悖事实把赝品仿品认定为真迹，这是于国于己都不利的事情，完全不同于其他个体或集体，利益直接与当事人挂钩。因此文物商店商品价格的合理性和作品的真实性具有决定性的权威，这也是特有体制的最优体现，应该具有风向标和指导作用。这种体制从表面上看束缚了商店的发展，成为迈向市场的瓶颈，但文物的不可多得性和文化遗产的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像现代化的工业产品一样追求最大的市场份额。无论中外的古董店铺一律小门小脸就充分证实了它的这种天性。

就潜力而言，文物商店的国有体制与社会上急功近利的个体商贩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体制造就了一批正直、诚实、热爱本职工作、有深厚功底和专业知识的从业人员（目前活跃在主渠道媒体上的各种文物鉴赏节目的专家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在第一线从事文物工作的时间长，过手过眼的文物不计其数，掌握鉴定文物的真谛和内涵，是一批不可多得的专业人员。这种体制多年来保护了国家的财富，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体制上的一些制约在市场经济中虽然显得不够游刃有余，但好处在于它好像是一杯陈年的酒慢慢散发它独有的气息。比如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收藏朋友和一些文物商贩，放着轰轰烈烈的拍卖会不去，却到文物商店去淘买一些藏品和商品，聊到深处时往往流露出对国营文物商店的信赖和依靠。虽然选择余地相对较少，但价格的合理性和商品的真实性几乎是他们得以放心的两个基本因素。另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很多朋友觉得一件未曾谋面，没有被拍来拍去的书画、瓷器送给朋友或收藏更有意义。随着市场上假画泛滥，文物商店长期收藏的老货受到推崇，甚至原装旧裱的书画都成了抢手货。这种信息无疑传达了一是文物市场鱼目混珠的混乱现象，二是文物商品应该是一种回归、一种沉淀的特殊物

件。市场上急功近利的倒卖现象应不是文物的属性。国营文物商店这些潜在的优势会随着市场的成熟、收藏家的理智和行业回归慢慢显现。

文物市场价格的升级，亿元时代的到来，好像文物商店没有了优势。有人做过统计：多少件文物拍卖价格上亿、上千万等等。毕竟那是仅有的几件文物，文物商店从成立那天起为博物馆提供的藏品之富，为国家挖掘出有级别的文物之广、为国家赚取的外汇之多远远是十几年的拍卖不能比及的。就目前来看文物商店这方面的优势依然可见。十几家有深远影响的老字号、成熟的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员、数量可观的藏品，应该说是任何一家拍卖公司和收藏个体争相拉拢和依靠的对象。文物本来就是一种特殊商品，经济价值只能体现它其中的一种属性，唯一性和不可多得性才是它的重要属性，因此文物商店的优势无论在体制、人员、藏品方面都显而易见，用好它驾驭它是文物商店的基本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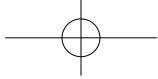
继续打造十几家老字号。老字号各有特点和强项，它是一种文化遗产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比如宝古斋，提到它人们自然想到名人字画，它可以是名人书画的代名词。宝古斋早先在日本和香港的名气已经很大，很多客人慕名而来。抓住这种文化现象发扬光大就是出路。老字号可以保留原有的模式和传统的经营，也可以衍生出副产品、创意产品。有影响的老字号应有自己的出版物、信笺、印刷品，还可以进行学术交流、讲座、培训。老字号可以借鉴现代画廊的一些模式包装专题和举办藏品专题拍卖，其实这些包装的模式老字号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创先河，很多著名画家都是通过老字号或是与老字号联手才得以发展的。这些办法都将给老字号带来无限的商机。传统文物商店一如既往守得住这份寂寞，守得住这些沉淀，一定也能守得住一片天地。



四、国营文物商店的美好前景

国营文物商店拥有一些老字号的店铺，保持着老字号的文化现象，有几处宜人的环境、雅聚的场所，藏有让世人为之震撼的文物，更有一些与时俱进的、贴近当代人生活的理念和文化创意，具有权威的市场指导和引导作用，是文物市场中的佼佼者，这基本应是理想中的国营文物商店。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公司宝古斋经理）



新形势下北京地区博物馆 文化事业发展思路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李长春同志进一步指出，博物馆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方面，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阵地。要把博物馆建设成为群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传播先进文化、愉悦群众身心的精神家园，广大青少年接受教育的第二课堂，旅游业发展的新兴景点，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学术研究和科普教育的重要平台。

博物馆内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馆藏文物资源、展览展示资源和专业人才资源；在建设人文北京、创建世界城市的过程中，文化将成为促进首都全面发展的新支点。面对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的社会趋势，我市的博物馆行业只有创新管理机制，创新工作思路，打破地域、隶属关系的局限，充分整合博物馆资源，才能适应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背景下的社会需求。

现就新形势下北京地区博物馆文化事业发展提出几点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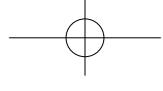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一、整合资源、形成品牌

1、整合核心文化区博物馆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

根据城市核心区的定位，四城区合并后作为首都核心区，将着力打造北京特色文化，成为突出文化特色、保护古都功能的核心区，成为北京形象的重要代表和未来“世界城市”的窗口。

在这一城市核心区内，集中了本市 60 座博物馆，是北京地区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展示古都皇城文化、传统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博物馆极其丰富，以故宫博物院

李学军



为龙头，辅以恭王府、雍和宫、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先农坛古代建筑博物馆、历代帝王庙、正阳门、钟鼓楼、白塔寺等特色博物馆，形成集中反映古都文化特色的博物馆群体。以上各博物馆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突出古都文化特色的展示内容，使用声光电、多媒体等现代化手段突出展示文化内涵，并以不同主题为线索进行有机串联，形成各具特色的参观线路，集中打造“古都文化特色品牌”。

此外，在这一区域内，以东城区的国家博物馆、西城区的首都博物馆为中心，积极构建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展示格局，集中举办代表中华传统历史文化、北京历史文化特色的展览，并充分利用其展览场地充足、软硬件设施先进的优势，通过市场化手段引进全国各省区的高端文化展览、文物精品举办特色展览及活动，打造“精品文化展示品牌”。同时，通过引进国际知名博物馆的高端展览、世界顶级文物精品，吸引国际组织及国际知名企业举办会议、活动等方式，为国际高端文化活动项目提供展示平台，形成国际高端展览、高端文化活动的举办中心，以提升首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树立国际文化形象，进而形成“国际高端展览品牌”。

2、整合核心区名人故居资源，打造名人文化品牌

城市核心区具有名人故居、名人纪念馆相对集中的优势，仅开放的注册博物馆就有宋庆龄故居、北京鲁迅博物馆、梅兰芳纪念馆、郭沫若纪念馆等10余家。由宋庆龄故居、郭沫若纪念馆等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共同组成的博物馆群体早在几年前即已联合开展了巡展、讲座等多项文化活动，联手打造首都的名人文化。在此基础上，各名人故居类博物馆应进一步开展研究，挖掘名人文化的内涵，引入现代化的展示手段，丰富展陈内容，打造首都的“名人文化特色品牌”。

3、整合民办博物馆、民间收藏家资源，建设民办博物馆聚居区

1997年以来，我市先后注册了民办博物馆二十余家。由于民办博物馆长期以来缺乏国家政策和资金层面的支持，其在馆舍、资金等方面均不同程度地遇到了许多问题，同时仍有许多拥有丰富文物藏品的收藏家，愿意将自己的文化收藏展示给社会，但苦于不具备举办民办博物馆的经济实力。今年，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专门文件，提出要大力扶植民办博物馆的发展。我市应结合这一精神，在整合民办博物馆、民间收藏家资源的基础上，由政府出资地兴建专项用于民办博物馆发展的博物馆聚居

区，由政府提供场地和馆舍，为私人收藏家创办民办博物馆、举办收藏家系列展览等文化项目创造条件，支持我市民办博物馆的发展。

4、整合博物馆人财物资源，提高博物馆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的综合实力

整合馆藏文物资源，提高藏品利用率。要在建立博物馆馆藏信息数据库的基础上，整合博物馆的藏品资源，一方面可以集中各馆馆藏文物优势，联手策划组织高水平特色展览，提高博物馆藏品的利用率，另一方面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系统、完整的研究标本和对象，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文物藏品的作用。

整合展览资源，形成特色鲜明的展览体系。各博物馆普遍均拥有内容不同、特色鲜明的主题陈列，通过全市博物馆行业展览项目库的建立，在认真分析现有展览内容和特色的基础上，对博物馆的展览项目提出指导性意见，鼓励举办弥补博物馆展览体系缺环的展览，并打造特色鲜明的展览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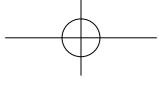
整合人才资源，完善人才梯队建设。通过对各博物馆专业人才状况的调查，以文物鉴定、文物保护修复、展览宣传策划、展览形式设计、展陈大纲编写、学术研究等不同业务工作领域，建立博物馆专业人员专家库，集中博物馆相关人才优势共同开展学术研究、文化讲座、复仿制品生产、讲解员培训、文物摄影培训、藏品保管与保养等，并承担相应的科研课题。

5、通过加强博物馆间横向联合方式整合全市博物馆资源，形成合力

在政府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主导下，加强博物馆间的横向联合，打破隶属关系，仿照八家名人故居联合开展活动的范例，将全市现有博物馆按照科技自然、宗教艺术、民族民俗、区域地志、建筑园林、文化艺术、革命军事、古代遗址、院校博物馆等不同专题进行组合，相同展示专题的博物馆之间以优势互补、团结协作为原则共同策划组织高端的展览及文化活动。由政府展览及文化活动进行适当资助。同时，各区县还可借鉴东城区的作法，在区县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下成立区县级博物馆协会，加强本区域内博物馆间的沟通与协作，优势互补地共同开展博物馆业务活动，以增强在区县文化领域的影响力。

二、统筹布局、夯实基础

统筹规划博物馆发展布局，在保持北京地区博物馆数量适度增长的同时，初步实现博物馆在门



类、空间上的合理布局。引导社会力量投入博物馆建设,大力发展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及可以弥补我市博物馆门类中缺项的博物馆项目,适时推进市区博物馆的建设,形成特色鲜明、布局合理的博物馆体系。对现有博物馆的周边环境、基础设施、标识标牌、展览展示等项利用现代化手段和方式进行提升。

1、制定博物馆事业发展总体规划,鼓励行业、企业集团等社会力量举办特色博物馆

在充分调研现有博物馆资源的基础上,从宏观的角度制定北京市博物馆文化事业发展总体规划,进一步完善具有北京文化特色的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鼓励代表北京特色传统文化、代表现代高新科技产业的行业或企业集团举办博物馆,以弥补博物馆门类上的缺环。支持中国园林博物馆、中国民航博物馆、北京公交博物馆、中国华侨博物馆、中国警察博物馆、中国化工博物馆、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北京奥运博物馆的筹建工作,促进首钢等工业遗址的利用,倡导同仁堂、内联升、瑞蚨祥、六必居等北京传统老字号举办特色博物馆。

2、重视区县博物馆的建设与功能的发挥

在文化建设中,区县博物馆的作用不可忽视。我市应加大投入支持区县博物馆的建设,实现每区县都有一座以现代化标准建设的高水平的区县级博物馆的目标,用于展示本区县行政区域内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挖掘文化内涵,以服务于本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选择有条件的区县及有条件的社区适时推进市区博物馆的建设,使博物馆真正与市区文化相结合。

3、以突出博物馆文化氛围为宗旨提升现有博物馆基础设施水平

在开展新馆建设的同时注重提升现有博物馆的整体质量和水平。积极推进徐悲鸿纪念馆、老舍纪念馆等改扩建工程,积极协助开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美术馆、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改扩建或新建等重点建设项目。同时,为突出博物馆的文化氛围,应进一步加大博物馆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周边环境的整治和博物馆开放区馆容馆貌的整顿力度,加强博物馆无障碍设施建设、指示标牌、语音导览、双语标识统筹等,建设北京地区博物馆中心库房以解决各馆文物库房不足的问题。

三、深挖内涵、产业开发

博物馆应充分发掘和利用自身资源,开发具有

地域和民族历史文化特色的高档次、高文化艺术品位的商品,满足观众需求。要树立正确的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理念,把博物馆的文化经营活动视为博物馆社会教育、文化服务功能的拓展和延伸,视为体现高雅文化内涵、弘扬博物馆人文情怀的特色文化活动。要不断挖掘博物馆与公众之间交流互动的潜力,精心设计制作精美、雅致的文化产品,最大限度地吧博物馆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社会服务优势,在传播先进文化的同时,树立博物馆公共文化形象。博物馆文化产品应注重高档化和平民化相结合,同时更要兼顾实用性。

1、发掘文化内涵开发博物馆特色文化产品

(1) 编辑各种图书、出版物和音像制品

观众通过展览看到的展品仅是馆藏文物的一部分,要想让观众对博物馆有较全面的了解,编辑出版各种图书和音像制品是非常必要的。这些出版物会成为一种扩大博物馆影响的有效宣传品;将陈列展览内容制成音像制品,可以当作进一步了解博物馆、学习历史文化的教材。

(2) 利用馆藏资源开发文物复仿制品

随着文化生活品位的不断提高,观众来博物馆已不满足于单纯参观陈列展览,他们还希望购买一些自己喜爱的典型文物的复仿制品,带回去继续观赏或收藏。同时,一些科研院所出于研究工作也需要购买一些文物复仿制品;博物馆一些具有代表性、社会影响大、观赏性强的文物复仿制品也可作为政府及各部门的馈赠礼品,这都为博物馆制作文物复仿制品提供了更多更大的市场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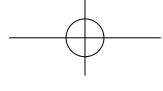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3) 以藏品为基础设计具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

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认识到开发特色旅游纪念品在有效发挥博物馆传播功能和提高传播效果方面的重要作用,已着手开发反映博物馆特色和代表博物馆文化品位的旅游纪念品,但目前大多数博物馆的纪念品仍然品种单调、雷同,且文化含量低,不能满足观众的购买需求。

博物馆以其丰富多彩并具有地区历史文化代表性的藏品资源为依托,开发兼具实用、欣赏和收藏价值的纪念品,最能彰显地方历史文化的个性,也最能吸引并激发观众求购的欲望。博物馆文化产品与其它商品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其开发必须与博物馆的宗旨、业务相结合,充分利用博物馆的文物资源、文化内涵及其研究成果,依托藏品融入文化内涵,并注重纪念品的高档化和平民化相结合,以及产品本身的实用性。

(4) 文物鉴定咨询及文物鉴赏项目

博物馆拥有众多精通文物知识的专家,又拥有



丰富的实物藏品，可以定期举办文物鉴定培训、文物鉴赏讲座、文物精品现场展示及咨询活动，既可普及历史文物知识，满足民间收藏爱好者的需要，同时还可以针对博物馆高端客户，开设馆藏文物观摩室项目，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给客户以零距离接触、研究、把玩历史文物的机会。

2、积极开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与开发

文化创意产业既是一个新兴事物，也是一个对博物馆事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的重要因素。博物馆应充分发挥自身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在建立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博物馆产业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展览产业：是指根据本馆藏藏品不断推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陈列展览、引进外地有影响的陈列展览、配合形式教育办展（主要是图片展）、向外竞标设计和输出展览项目等。博物馆的文化产品随着博物馆功能的扩大，可以表现在各个方面，但能够完整表现博物馆的收藏、教育和科研功能的还是博物馆的陈列展览。

(2) 服务产业：可分为技术服务、场地服务、商品服务、其他服务等。技术服务是指利用馆藏文物优势和人才优势开展有特色的讲座、咨询、鉴定、设计、辅导、培训等，以及承担科研项目获得收益等社会服务。场地服务是利用闲置的房屋出租、经营商店、餐饮，以及停车收费等社会服务。商品服务是指将本馆有特色的藏品开发成各种旅游纪念品，以及有关本馆的知识读物、光盘向观众出售等。其他服务，是利用博物馆的设备向观众提供照相、录像服务等。

3、寻求与其他产业的最大融合，构筑博物馆行业的新架构

(1) 积极开拓文化旅游市场

众多的文物古迹、历史景点和博物馆是首都重要的旅游资源。丰富的博物馆资源提升了城市的人文价值，必将对城市旅游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博物馆行业与旅游业相融合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除了通过有计划地举办展览，为本地居民展示和传播民族、世界文化外，还可以与旅游部门联手，共同打造文化旅游的热点。各博物馆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馆的市场定位，抓住双休日、黄金周长假的机遇，先以本地客源为对象，确定有本馆特色的展览或服务项目，逐步打出知名度，拓展旅游市场。还可尝试推出名人故居游、寺庙精品游、艺术精品游、北京史迹游等精品博物馆旅游线路一日游，进一步推动多渠道、多形式的合作，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软件服务，加大推介力度、

扩大社会影响、打造旅游品牌，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使博物馆成为每个旅游目的地的一项重要文化体验。

(2) 参与群众文化活动提高博物馆的社会知名度

各博物馆、纪念馆、艺术馆虽然是“高雅文化”的展示地，但并不代表它们与群众文化格格不入，面对人的精神素质和审美趣味的变迁，以及群众文化需求的增长，文博业应注重推衍形象变革，才可能成为群众文化的参与者、引导者，把其文化精神、思想内涵、艺术品位渗透到群众文化之中，提升博物馆的知名度。

四、完善功能、延伸服务

当代世界博物馆的发展趋势表明，现代博物馆的功能不再是简单的文物标本的收藏、研究、展示机构，而是应该成为面向社会、服务于公众的文化教育机构和信息资料咨询机构，其功能必将延伸到公共文化服务的各个领域，最终博物馆将成为融合学院、博物馆、图书馆、数据库、购物中心、游乐园、剧院、冥想空间等特性于一身的综合文化实体。博物馆社会功能的延伸必然涉及到博物馆服务模式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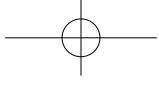
1、完善博物馆的展览展示功能

(1) 创新展陈内容

要增强展陈内容的整体性，系统反映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反映重要历史发展阶段，反映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教育等各个方面具有标志性的重要内容。要增强展陈内容的比较性，通过中外文物、中外历史的对比，古今演变的对比，不同类型文物的对比等多种方式，更好地揭示文物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要增强展陈内容的生动性，通过介绍文物发现、发掘的过程，文物的历史背景，与文物有关的文化内容等多方面的信息，让静止的展品活起来，让高深的专业知识生动化、形象化，引导人们在参观中增加历史和文物知识，提高观赏兴趣。特别是要注重介绍文物的古代工艺，展示我国古代的发明创造和工艺成果，再现古代技术和工艺流程，增强观众的自豪感和创新意识。要紧紧密结合各种纪念活动、传统节日、社会热点举办展览，要引入世界知名大型博物馆展览、世界著名馆藏珍品特展等国际展览项目。

(2) 创新展示方式

新颖的展示方式是博物馆增强吸引力和震撼力的重要手段。要注重创意设计，善于运用声光电



等现代科技手段增强博物馆的文化表现力,给观众营造身临其境的氛围,增强展览的视觉效果及其生动性、直观性和趣味性,帮助人们深入了解和体验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要重视观众的心理需求,以观众的感受为依据,使陈展方式和服务手段更趋人性化,让观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与欣赏展览的魅力。要探索把电影、电视、幻灯、录音、激光动画等辅助设备和新型工艺材料科学地运用于陈列展览,增强展览的文化表现力,丰富观众的信息量。要增强展览的参与性、互动性,通过模拟场景、多媒体背景介绍、动手制作等多种方式,让观众参与其中,把文物鉴赏提升为文化体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融入高科技展示手段,注重展示的背景资料、复原陈列等应用,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把文物的形成过程、发掘过程及其文化内涵充分展示出来。要吸收国际国内先进的博物馆展示手段,增强博物馆展览的科技含量,在展陈中使用电脑触摸屏、语音导览系统、三维立体数码影像技术等手段,推广多媒体技术和数字信息技术在博物馆展示方面的应用,以增强博物馆的趣味性和吸引力,使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形成完美的统一。要改变博物馆传统的展陈模式,丰富展陈手段,变固定陈列为活动展演、动态展示、流动展示,研究并实践博物馆大篷车项目的流动展演模式。

(3) 建立博物馆展览项目库制度,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支持高端展览的举办

在现有展览资源的基础上,开展博物馆展览项目库的建设工作,即各博物馆根据自身文物资源、文化内涵,策划拟举办的展览项目,通过专家评审程序,评选出可行的展览项目列入项目库,并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支持项目库中高端展览项目,逐年安排财政经费实施展览项目。

为提升展览的策划水平,保证进入展览项目库的项目质量,针对以往博物馆展览项目评审专家专业单一的问题,应重新调整博物馆展陈项目评审专家库的人员组成,除原有的博物馆展陈专家外,应引入院校研究人员、文化学者以及传播、旅游、城市文化等社会其他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对展览项目的评审工作,形成高端文化智囊团。

2、完善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博物馆展览应积极面向最广大的观众,担负起继承、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的历史任务,展览言之有物又能激起大部分观众的浓厚兴趣,需要展览从选题、策划、大纲编写、文物选择、陈列形式设计到宣传各个环节始终围绕观众的需求来完成。同时,与博物馆展览展示相配套的是博物馆讲解员的

讲解服务,讲解的水平与深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观众的参观效果和对于博物馆知识体系的理解。为适应现代化博物馆的发展需要,展示内容还可以采用语音导览系统的技术形式,替代讲解服务的作用。尤其是在观众接待量大的博物馆语音导览系统尤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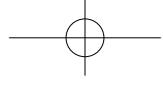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逐年推进的博物馆免费开放促进了社会各界对博物馆建设的关心与支持,激发了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增强了博物馆文化的辐射力,加快了博物馆融入公众生活的步伐,也更加有利于发挥博物馆服务于社会的职能。此外,发展壮大博物馆志愿者队伍,全面提高博物馆志愿者的整体素质,初步建立“博物馆志愿者信息交流工作平台”,可以充分发挥志愿者在沟通博物馆与社会、拓展博物馆社教功能方面的重要作用。

3、完善博物馆的公共服务功能

提升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与水平,最大限度地延伸博物馆的公共服务功能是博物馆行业的工作职责。博物馆应根据自身的条件开展特色服务,有条件的博物馆应逐步设立晚场或“博物馆之夜”活动项目,以适应不同观众群体的参观需求;博物馆内应提供 IC 卡服务、医疗救护、银行服务、纪念品销售等基础性公共服务;为专业人士提供图书资料的查阅,提供开展学术研究的平台;举办包括研讨会、工作室、录像电影电视活动厅、冬夏令营、有奖征文、知识竞赛等在内的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开展餐饮、书店、茶楼、阅览室等各种有偿服务;根据展示内容的特点,结合中小学教学大纲设计出面向各门课程的参观教学和实训活动,将教育课堂引入博物馆,并将教学内容制作成电影、电视、动漫等形象化的文化产品。博物馆还可以充分利用其藏品库房等硬件设施的优势,面向文物收藏单位或个人的收藏品开展文物代存、代贮、代保管业务,实现藏品保管的社会化服务。

4、完善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功能

博物馆科研活动的成果及其质量关系到博物馆的学术声誉和业务水平。评价一个博物馆的首要标准就是能否在对文物藏品、文化内涵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推出科学严谨、特色鲜明且能够引人入胜的展览项目,并使观众从中获得系统完整、印象深刻的知识体系。因此,博物馆行业应进一步提高对科研工作的重视程度,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博物馆科研工作的开展和科研人才的培养,强调科研成果要集中体现新的内容、新的发现、新的思路,形成更多观点新颖、科学严谨、意义重大、填补空白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学术成果带动博物馆业务工作的全面



发展。

5、完善博物馆的休闲娱乐功能

随着公众观念的不断更新，观众群体已经不再把接受教育作为参观博物馆的主要目的，而更加注重博物馆在调节心情、放松精神、增添生活情趣等方面的功能，强调博物馆的可参与性和互动体验。适当加强博物馆的休闲娱乐功能与设施已成为建立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因此，努力把博物馆建成集参观、餐饮、购物、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文化活动场所，满足游客多方位需求，已成为博物馆行业的重要职责。博物馆应从自身实际出发，在不影响博物馆参观环境和总体氛围的情况下，开设茶座、咖啡吧和快餐店以及画廊、文博书店等，有条件的还可以举办一些小型乐舞演艺活动。通过增加休闲服务，延长观众在博物馆的逗留时间，还可为旅游纪念品的销售创造更多的机会。

6、博物馆信息数字化建设

博物馆所蕴藏的丰富文物资源及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可以通过建立博物馆网络平台的方式予以充分展示和利用，借助信息产业的发展建立数字虚拟博物馆、网络共享博物馆物质文化资源、联合举办网上虚拟展览及其相关的拓展服务。数字博物馆的交互性不仅为博物馆与观众之间搭建起一条信息交流的平台，而且还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平台服务公众。文博网站还可开发网上购物服务项目，方便参观者网上订购书籍、图录、纪念工艺品等。

将计算机、网络技术引入博物馆藏品管理、展览文化传播、社会教育宣传等项工作中，力争达到博物馆行政主管部门建立信息网络发布平台，部分博物馆建有自己的网站或主页，并能通过网络传播信息、沟通情况，初步实现信息传播的网络化。积极开展博物馆信息资源的挖掘、开发、利用，建立“北京地区博物馆资料库”、“博物馆藏品信息数据库”和资源信息共享机制。同时，针对全市博物馆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建设覆盖全市博物馆的信息网络，加快信息传递速度，提高工作效率。

五、整体包装、策划宣传

博物馆应充分利用专业媒体资源优势开展博物馆展览项目的策划与宣传，以全面提升博物馆的社会知名度与影响力。

1、整体包装北京地区博物馆的文化形象

努力营造博物馆的文化氛围。通过对博物馆文化元素的整合，对博物馆的馆标、说明指示标志、

服务设施等进行整体包装，形成全市博物馆统一的文化形象；全市注册博物馆应制发统一的标牌，统一博物馆内外的各项文化标识，在路标、街道指示牌、公交车站等项目中增加博物馆名称的元素，利用路旗等载体宣传博物馆；统一博物馆说明指示标牌的文化元素，博物馆内的公共警示标志要与社会通用标识接轨；博物馆周边要打造与博物馆文化相适应的环境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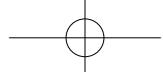
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统一制作针对全市博物馆的不同档次的文化宣传品，定期出版更新博物馆地图，各博物馆也应针对不同观众层次、不同发放对象设计制作不同档次的博物馆宣传品，进行免费发放以扩大宣传力度。可将宣传品通过旅行社、宾馆饭店、社区街道、出租车行业等系统进行广泛传播。

2、引入专业传媒开展博物馆宣传策划

发挥专业传媒优势，由政府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与歌华等传媒公司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在制定博物馆整体宣传规划的基础上，共同对全市博物馆、展览活动、馆藏文物、文化内涵进行调研和开发，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发掘策划出可资宣传推广的文化项目，再由其利用传媒行业的宣传优势开展针对博物馆、展览项目、文物资源、文化内涵的宣传。充分利用报刊杂志等平面媒体，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手机、互联网等网络媒体以灯箱广告、车身广告等形式，开展博物馆文化的全方位立体宣传。各博物馆也应相应设立新闻发言人、宣传联络人制度，构建上下畅通的宣传联络体系，并结合自身资源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提供可供宣传的文化资源。同时，博物馆所举办的大型国际文化活动、研讨活动、年会也可由专业文化公司承办，以充分发挥社会资源的优势将博物馆文化做大做强。

博物馆作为社会公益事业，需要各级政府的政策保障与资金支持，需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博物馆文化产品投融资环境，广泛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博物馆文化建设，切实落实财税税收、社会保障、投融资等配套政策，为博物馆文化体制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够在出台扶植文化事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设立博物馆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促进市区两级文物行政部门共管博物馆机制的形成、加大对免费开放博物馆资金支持的执行力度等方面，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 西晋墓葬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昌平区文化委员会

2010年1月2日至13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昌平区文化委员会为配合昌平区沙河镇规划北区工程建设，对沙河镇规划北区内考古勘探发现的古代墓葬进行了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发掘西晋时代墓葬3座、元代墓葬4座、明清墓葬103座。现将此次发现的3座西晋墓葬简报如下。

一、墓地概况

沙河镇北距昌平卫星城13公里，南距德胜门19公里。这次发掘的3座西晋墓葬位于昌平区沙河镇巩华城之镇辽门以东0.8公里处的原东一村范围内（图一）。发掘区地势平坦，北距北沙河约800米，南距南沙河约320米，地理位置为东经116°17′26.87″、北纬40°7′43.28″，海拔高度48米。这3座墓葬编号分别为M40、M41、M42，东西排列，墓道皆南向，虽遭到较严重的盗掘与破坏，但墓葬结构较为完整，出土随葬器物陶器、铜器、铜钱等。

二、墓葬形制

1. M40

该墓位于T1510探方的西部，东邻M41，开

口于③层下，打破生土层，为带墓道的长方形单室墓，坐北朝南，方向350°，墓口距地表深1米。南北总长6.5米，东西宽1~2.6米，墓底距墓口深1.44米。由墓道、墓门、墓室3部分组成。

墓道平面呈长方形，为斜坡状，南北长2.24米，东西宽1.14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坡长2.12米，深1.44米。

墓门位于墓室的南侧与其相连，因被破坏，两侧未留下痕迹，无法找到其具体位置。

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4.26米，东西宽2.6米。墓室四壁现存砖较少，墓底为残砖错缝平铺，一部分铺砖为整砖。用砖规格为：长0.30米、宽0.15米、厚0.05米。

经清理未发现棺木、骨架及随葬器物。

2. M41

该墓葬位于T1510探方的中部，东邻M42，开口于③层下，打破生土层，为带双墓道的多室墓，坐北朝南，方向355°，墓口距地表深1米，南北总长6.56~7.30米，东西宽6.76米，墓底距墓口深1.40米。由墓道、墓门、墓室、左室、耳室5部分组成（图二）。

墓道为东西并列。东墓道平面呈长方形，斜坡状，南北长2.76米，东西宽0.88~1.12米，深1.24米，坡度较大。内填花土，土质较松。根据清理来分析，为当时修建墓葬时运砖方便所修。东墓道之北呈“刀”形，与北侧室、南侧室相连，底部未铺砖，且较后者底部高出约0.20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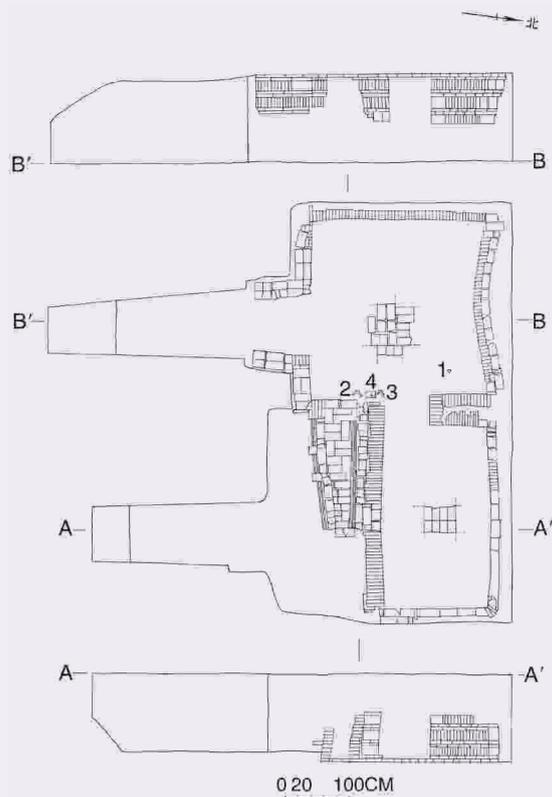
西墓道平面呈长方形，斜坡状，南北长3.12米，东西宽0.74~1.12米，深0.66~1.36米，斜坡长1.06米，坡度较小，内填红褐色花土。

墓门位于墓室的南侧，因被破坏，两侧未留下痕迹，无法找到其具体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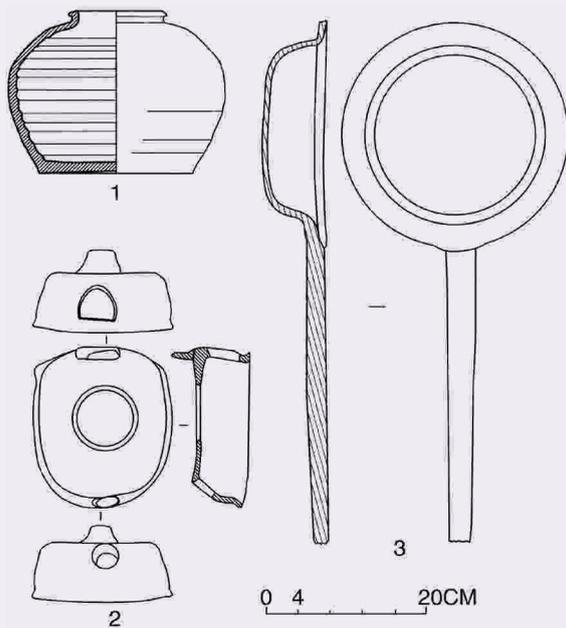
西墓道之北为甬道，底部未铺砖，两侧1平1竖砌，砌砖残高0.62~0.80米。主室位于甬道的北部，平面呈近



图一 昌平区沙河镇西晋墓葬发掘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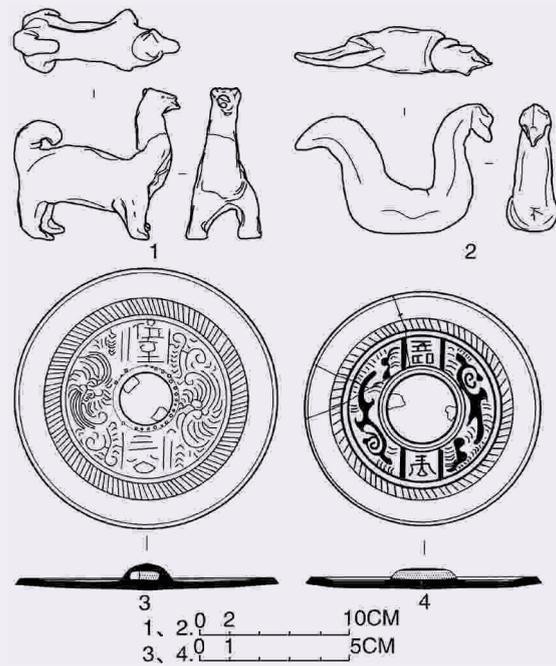


图二 M41平、剖面图
1.铜镜 2.陶鸡 3.陶狗 4.陶灶



图四 M41、M42出土器物
1.红陶罐 (M42:4) 2.陶灶 (M41:4) 3.铜髮斗 (M42:1)

正方形，南北长 2.60 ~ 2.76 米，东西宽 2.80 米，墓室四壁内砖砌法为 2 平 1 竖，相互错缝所砌，用砖规格为：长 0.23 米、宽 0.16 米、高 0.05 米，残砖大小不均；墓室内有铺地砖，铺法为平铺。出土器物位于墓室的东北部，发现有散乱的人骨。内填



图三 M41、M42出土器物

1.陶狗 (M41:3) 2.陶鸡 (M41:2) 3、4.铜镜 (M41:1、M42:5)

花土。

北侧室位于墓室的东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2.96 米，南北宽 1.72 米，破坏严重。四壁残高 0.60 ~ 0.76 米，青砖所砌，砌法为 2 平 1 竖，用砖规格与主室相同。内设铺地砖，平铺一层，未发现随葬器物。

南侧室位于墓室的东南角，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2.20 米，南北宽 0.52 ~ 0.92 米，残高 0.76 米，四壁为平砖错缝所砌而成，底部有铺地砖平铺一层，用砖规格与主室相同，未发现随葬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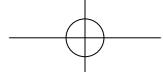
3.M42

该墓位于 T1610 探方的西部，西邻 M41。开口于③层下，打破生土层，为带墓道的长方形单室墓，坐北朝南，方向 350°，墓口距地表深 1 米，南北总长 6.32 米，东西宽 0.80 ~ 2.44 米，墓底距墓口深 1.42 米。由墓道、甬道、墓室 3 部分组成。

墓道平面呈长方形，斜坡状，南北长 2.40 米，东西宽 0.80 ~ 1.30 米，坡长 1.48 米，深 1.40 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包含有青灰砖残块。

甬道位于墓室的南侧与其相连，东西宽 0.74 米，南北进深 0.84 米，两侧为 1 平 1 竖砌法，现残存高度东壁 0.60 米，西壁 0.50 米。封门位于甬道南部，前后两层，为“人”字形封门砖，斜砖丁砌，残存共四层，残高 0.66 米。

墓室位于墓室的北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2.30 米，东西宽 1.48 米，四壁均采用 2 平 1 竖错缝所砌，残高 0.60 米。在墓室西部清理出人骨 1



考古简报

具，保存较差，仅残留小部分。出土器物主要位于墓室内西北角及东南角。墓室青砖错缝平铺，部分为残砖，整砖规格为：长 0.30 米、宽 0.16 米、高 0.05 米。

三、出土器物

在这三座墓葬中，M40 没有出土器物，M41、M42 出土器物主要有陶器 4 件、铜器 8 件、铜钱 44 枚。另提取 M40、M41 墓砖 2 块，现介绍如下。

1. 陶器 4 件。其中 M41 出土 3 件，器型有鸡、狗、灶。M42 仅出土 1 件红陶罐。

陶鸡 1 件。标本 M41:2，泥质灰陶，手制，挺胸卧状，形体瘦长，尖喙，冠、眼系手捏而成，圆柱形颈，扁圆腹，扁尾上翘，尾尖下垂，无足。长 13.3、高 8.6 厘米（图三，2）。

陶狗 1 件。标本 M41:3，泥质灰陶，手制，形体瘦长，四肢站立，昂首，挺胸，耸耳，嘴张开，两眼圆睁，尾巴上卷，四爪系手指捏制。通高 10.1、通长 10.8 厘米（图三，1；照片 1）。

陶灶 1 件。标本 M41:4，灶体略残，泥质灰陶，手、模兼制，灶体平面呈梯形，前宽后窄，无底内空，灶面略下凹，中有圆形釜腔，灶后壁有一圆形烟洞，正面中部有半圆形火门，火门上有一段导烟墙。通高 9.8、长 19.2、宽 14.4 ~ 17.4、壁厚 0.6 ~ 1.2 厘米（图四，2；照片 2）。

红陶罐 1 件。标本 M42:4，残，夹云母红陶，轮制。直口，平沿，短颈，丰肩，鼓腹，腹下弧收，平底略上凹。腹下残留修坯旋痕。平沿饰凹弦纹一周。口径 10、底径 19.2、高 20.4 厘米（图四，1）。

2. 铜器 8 件。其中 M41 出土铜镜 1 面；M42 出土铜镜 2 面，铜熨斗 1 把，铜簪 4 件。

“位至三公”铭镜 2 面。标本 M41:1，圆形，青铜质，半圆钮，穿孔，圆形钮座。正面抛光较好。背面铸“位至三公”四字铭文，阳文篆、隶体。其中“位至”左侧有两条、右侧有一条宽竖线，“三公”左侧有一条、右侧有两条宽竖线。竖线外并饰有双凤纹、两周弦纹及一周短斜线纹。正面直径 8.8、钮径 1.7、钮高 0.6、缘宽 1、缘厚 0.15、肉厚 0.1 厘米，重 70 克（图三，3）。标本 M42:5，圆形，残，青铜质，半圆钮，穿孔，钮平顶，圆形钮座。背面铸“位至三公”四字，阳文篆、隶体。其中“位至”及“三公”铭文两侧分别有两条宽竖线。竖线外并饰有双夔纹、两周弦纹及一周短斜线纹。正面直径 7.9、钮径 2.1、钮高 0.3、缘宽 0.9、缘厚 0.2、肉厚 0.15 厘米，重 82 克（图三，4；照

片 3）。

博局镜 1 面。标本 M42:2，圆形，残，带绿锈斑，青铜质，球形镜钮，穿孔，钮座圆形。正面抛光较好。背面饰纹饰 11 层，分内外两区。内区主纹区由鸟雀及铭文带组成。内区由“T”、“L”、“V”及单、双方格分成四区八部，双方格外至弦纹内饰鸟雀 8 只，每两只隔“V”形相对。“T”形纹两侧各有一枚带圆座乳钉，残剩 7 枚，其中一枚只剩圆座，乳钉脱落。单、双方格内铸铭文为“十二地支”，残剩“子、丑、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字，阳文篆、隶体；字与字间都有一枚带座小乳钉相隔，残剩 9 枚。弦纹外至短斜线纹内铸一周“张氏佳镜器大好上有朱阙(雀)下玄同出徐州青□□□王”22 字，阳文篆、隶体，右旋读。两处铭文字体均铸为反面字，个别减笔。外区主纹区饰三角及双线波折纹。正面直径 17.63、钮径 2.6、钮高 1.1、缘宽 0.5、缘厚 0.4、肉厚 0.3 厘米，重 412 克（照片 4）。

铜熨斗 1 把。标本 M42:1，完整，青铜质，带绿锈斑，敞口，方唇，宽平沿，深弧腹，平底，长条形柄与沿、上腹铸为一体，柄横截面为梯形。口径 14、底径 9.8、高 3.6、柄长 20、厚 1.2 厘米，重 718 克（图四，3；照片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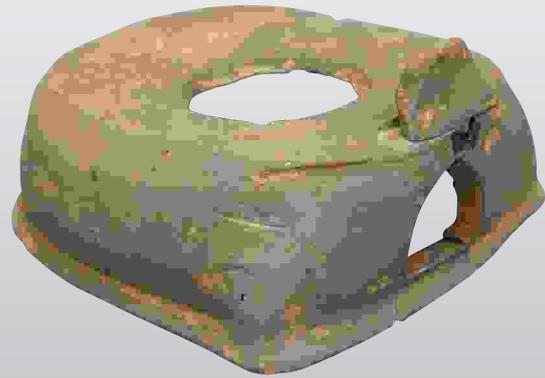
铜簪 4 件。标本 M42:6-1，簪体锈残，形状为双股“U”形圆锥状。残长 9.2、宽 0.5 厘米；标本 M42:6-2，簪体锈残，形状为双股“U”形圆锥状。残长 4.5、宽 0.7 厘米；标本 M42:6-3，簪体锈残，簪体形状为圆锥状细长体。残长 5.6 厘米；标本 M42:6-4，簪体锈残，簪体形状为“V”字形，尾残断。残长 7.9 厘米。

3. 铜钱 M40、M41 未出土铜钱。仅 M42 出土铜钱 44 枚，大部保存较好。“五铢”38 枚，其中“剪郭五铢”10 枚，“货泉”4 枚，“大泉五十”2 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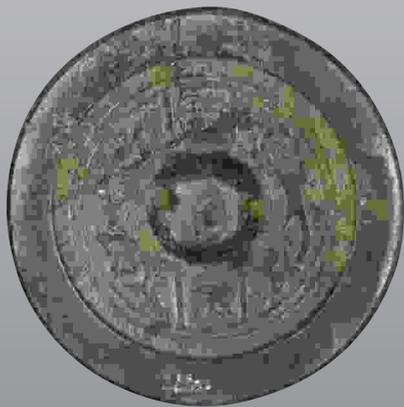
“五铢”28 枚。标本 M42:3-1，范铸，青铜质，青绿色，圆形，方穿，穿为广穿、方正，制作精致，钱体微厚。正、背面有圆郭，正面铸钱文“五铢”二字，篆书，阳文，右左横读，光背素面无纹。“五铢”二字字体瘦长。“五”字交笔不甚弯曲呈等腰三角形形式，“朱”旁横笔方折，“金”头呈三角形，四点较短，排列整齐。钱径 2.6 厘米，穿宽 1 厘米，郭宽 0.1 厘米，重 2.64 克（照片 6）；标本 M42:3-2，范铸，青铜质，青绿色，圆形，方穿，制作规整，钱体轻薄。正、背面有圆郭，正面铸钱文“五铢”二字，篆书，阳文，右左横读，光背素面无纹。“五铢”二字字体宽肥、圆柔，“五”字交笔弯曲，上下横与两竖平齐，“朱”旁横笔方折，“金”头呈三角形，四点较长，排列整齐。钱径 2.6 厘米，穿宽



照片1.陶狗 (M41:3)



照片2.陶灶 (M4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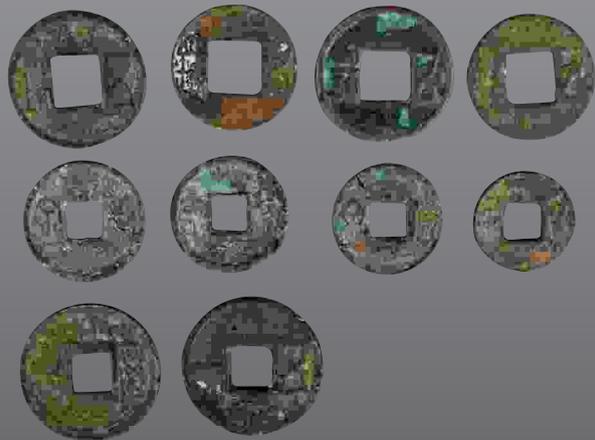
照片3.铜镜 (M42:5)



照片4.铜镜 (M4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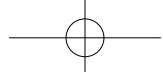


照片5.铜戛斗 (M42:1)



照片6.铜钱





考古简报

0.9厘米,郭宽0.1厘米,重2.2克(照片6)。

“剪郭五铢”10枚。标本M42:3-3,范铸,青铜质,青绿色,圆形,方穿,穿为广穿、方正,剪郭,钱体轻薄,略腐蚀,正面铸钱文“五铢”二字,篆书,阳文,右左横读,光背素面无纹。“五”字交笔弯曲,上下横与两竖平齐,“朱”旁横笔方折,“金”头呈三角形,四点较长,排列整齐。钱径2.4厘米,穿宽1厘米,重1.62克(照片6);标本M42:3-4,范铸,青铜质,青绿色,圆形,方穿,穿为广穿、方正,剪郭,钱体轻薄,略腐蚀,正面铸钱文“五铢”二字,篆书,阳文,右左横读,光背素面无纹。“五”字交笔弯曲,上下横与两竖平齐,“朱”旁模糊不甚清晰。钱径2.4厘米,穿宽0.9厘米,重1.51克(照片6)。

“货泉”4枚。标本M42:3-5,范铸,青铜质,青绿色,圆形,方穿,穿为狭穿,正、背面有圆郭,正面铸钱文“货泉”二字,篆书,阳文,右左横读,文字线条纤细秀丽,光背素面无纹。“泉”字竖笔中断,钱径1.3厘米,穿宽0.7厘米,郭宽0.1厘米,重2.05克(照片6)。标本M42:3-6,范铸,青铜质,青绿色,圆形,方穿,穿为狭穿,正、背面有圆郭,正面铸钱文“货泉”二字,篆书,阳文,右左横读,文字线条纤细秀丽,光背素面无纹。“泉”字竖笔中断,钱径1.3厘米,穿宽0.7厘米,郭宽0.1厘米,重2.71克(照片6)。标本M42:3-7,范铸,青铜质,青绿色,圆形,方穿,穿为狭穿,正、背面有圆郭,正面铸钱文“货泉”二字,篆书,阳文,右左横读,文字线条纤细秀丽,光背素面无纹。“泉”字竖笔未断,钱径1.1厘米,穿宽0.7厘米,郭宽0.1厘米,重1.72克(照片6)。标本M42:3-8,范铸,青铜质,青绿色,圆形,方穿,穿为狭穿,正、背面有圆郭,正面铸钱文“货泉”二字,篆书,阳文,右左横读,文字线条纤细秀丽,光背素面无纹。“泉”字竖笔中断,钱径0.9厘米,穿宽0.7厘米,郭宽0.05厘米,重0.84克(照片6)。

“大泉五十”2枚。标本M42:3-9,范铸,青铜质,青绿色,圆形,方穿,穿为狭穿,正、背面有圆郭,郭深、肉厚,正面铸钱文“大泉五十”四字,篆书,阳文,上下右左对读,光背素面无纹。“大泉”二字字体肥阔,“五十”二字字体瘦长。“大”字呈“燕翅”形,“泉”字竖笔中断,钱径2.7厘米,穿宽0.8厘米,重5.03克(照片6);标本M42:3-10,范铸,青铜质,青绿色,圆形,方穿,穿为狭穿,正、背面有圆郭,肉肥厚,正面铸钱文“大泉五十”四字,篆书,阳文,上下右左对读,光背素面无纹。“大泉”二字字体肥阔,“五十”二字字体

瘦长。“大”字呈“燕翅”形,“泉”字竖笔中断,钱径2.7厘米,穿宽0.9厘米,重4.52克(照片6)。

4.绳纹砖2块。标本M40:1,泥质灰陶,残断,平面呈长方形,正面饰绳纹十六道。长31、宽15.5、厚5厘米;标本M41:5,泥质灰陶,平面呈长方形,正面饰密集绳纹。长31.5、宽15.5、厚5.5厘米。

四、结语

此次发掘的三座墓葬的墓道皆南向,东西排列整齐,相互之间仅间隔约0.20~0.30米,应为家族墓葬。出土器物数量虽少,但种类丰富,其以铜器为大宗。M42出土的铜熨斗完好,而3面铜镜亦较为完整,特别是M42:2博局镜,不仅体形较大,而且镜面的铭文为反铸,实属中国古代铜镜中较罕见者。

M41出土的“位至三公”铭镜与顺义大营村西晋墓M5:3铜镜的纹饰、大小一致,而M42出土的红陶罐亦与大营村M4:2红陶罐相似。有鉴于此,我们判断这三座墓的时代为西晋时期。北京地区发现西晋时期墓葬较少,从公开发表的资料看,目前仅发现十余座。因此,此次在昌平区沙河镇发现的三座墓葬为研究北京地区西晋考古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墓葬所在的昌平区此前未曾发现西晋时期墓葬,此次发现亦填补了昌平地区西晋时期考古的空白。

昌平区沙河镇位于燕山山脉山前平原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因温榆河上游支流南沙河、北沙河在此交汇而得名。明成祖迁都北京后随即在沙河建行宫,正统元年(1436年)行宫被水冲毁。嘉靖十七年(1538年)重修并筑城围之,御赐名“巩华城”,是明代皇帝谒陵和北征驻蹕之地。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调军士疏通巩华城外安济桥到通州渡口的温榆河水道,并在巩华城北门内建“奠靖仓”,于城外东南处修复元代时期的临水泊岸,供运送御用物资。清代一直派兵戍守,称“巩华城营”。康熙十六年(1677年)行宫设为“擗毡局”。此次在巩华城东门外发掘的西晋墓葬对于研究沙河镇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有利于对明清时期的京畿重镇巩华城遗址的保护与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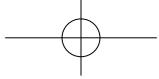
发掘:于璞 韩鸿业

器物修复:古艳兵

绘图:刘晓贺

摄影:于璞

执笔:于璞 韩鸿业



紫砂茗壶鉴赏



图一 清乾隆百果壶

于振华

一、关于宜兴紫砂壶的起源传说

饮茶习俗在中国古来有之。自明代开始，人们用高温杀青的炒青法制成散茶，并已在全国普及。散茶的饮用改变了传统的煮茶法，使冲泡法普及，也带来了茶具的根本变革，使紫砂陶壶脱颖而出并在各地普及起来，发展流传至今。

听制陶的人说，明正德年间金沙寺（位于宜兴县东南四十里）的僧人平时爱与制陶的人相处，将作缸瓮用的陶泥中较细腻的泥揉捏在一起，用水浸泡，去杂质后再揉练，经过一系列的拍打加工修整制成壶型，搭附在烧粗陶的窑内装烧，制成的陶壶被人们传用。有正德甲戌进士吴仕少年曾在金沙寺读书，随侍的青衣小僮供春（也有的称龚春）做完差事之后，私下里向老僧人学艺，所制陶壶具有造型规整朴实、色泽沉着风格。

二、关于紫砂茗壶的制作

从紫砂壶的制作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原料的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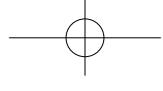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宜兴紫砂壶所用的原料，统称紫砂泥、本山绿

泥、红泥三种。

紫泥类，主要产自丁蜀镇黄龙山一带，深藏于黄石岩层之下，矿体呈薄层状，厚度一般在几十厘米到一米左右。紫泥类包括有天青泥，其质地细腻呈青蓝色，清中期出产，现今已经不见。底槽青泥，位于矿层的底部，在块状的矿石中有青绿色的鸡眼、猫眼，颜色偏紫泛青，细而纯正，数量很少。红棕泥，位于矿层中部，呈紫红色和紫色，有时还隐现绿色斑点或小云母片闪烁，质地软而致密。大红泥，位于矿中，出现量少，呈鲜艳的紫红色，片状结构，最佳烧结温度在 1180℃ 左右。

绿泥类，俗称本山绿泥，在古文献上称为梨皮泥。本山绿泥的矿土颜色呈淡绿色，片状，烧成后的颜色为梨皮冻色，今人看起来类似米黄色。本山绿泥的开采量很低，一般不做大件制品，仅做小件制品或用作化妆土。加入其它呈色剂可以制成更多颜色的制品。白麻子泥，属于本山绿泥类的一种。颜色与本山绿泥相似，质地粗，含杂质较多，需要精拣之后才可以用。烧成后呈淡墨色。红麻子泥，颜色类似紫泥，但质地粗。

红泥类，俗称朱泥、朱砂泥。因烧成后器物颜色呈似朱砂红而得名。主要产于宜兴任墅赵庄山嫩



文物研究

泥矿层的底部。此矿质坚如石，含铁量较高，产量也比较少。矿土呈砖红色，是以粘土为主的粉砂岩土。红泥的收缩率较大，常用来烧制小件器物。

除以上三大类以外，还有其它泥类。如：石黄，呈卵状，外观呈铁黄色，内核呈蛋黄色，质地细腻。白泥，呈白色，白中微闪绿。烧成后器物为白色。此泥产于宜兴大潮山，最早是用来制作日用陶器的原料，但淘练精细的部分，可以加入不同金属氧化物制成各种颜色的陶泥。土骨，呈骨状，含铁量高，烧成后呈黑色颗粒，将其掺到紫砂泥里，制成天星泥。嫩泥，呈砖红色，最早也是用来制作日用陶，将其掺入紫砂泥中，起到提高可塑性、降低烧结温度的作用。淘练细腻的部分可用作制陶的辅助原料。

紫砂泥原料经过加工和配伍，可以得到多种颜色的泥。常见的配方有：本山绿泥与紫泥相拼制成团泥；本山绿泥与白泥相拼，加入适量的氧化钴，制成墨绿泥；本山绿泥与白泥相拼，加入适量铬锡黄，制成枇杷黄色；本山绿泥加白泥，加入适量铬绿，制成菜茄泥；紫泥加入适量氧化锰，制成褐色拼料泥；紫泥加入适量氧化锰及氧化钴，制成黑料泥；伏东红泥加入适量铁红粉，制成朱红泥；另外，烧成器物的颜色也受温度的影响会发生深浅变化。

2、紫砂茗壶的成型及造型。

生泥的加工需要几道程序。将矿井出的矿精选，放自然环境中历经风、霜、雨、雪的风化，由大泥岩分解成小块及颗粒。用石磨将紫泥加工成粉，用筛子进行筛选分级。以手工将泥粉加入水调和后，即成生泥。用木槌打或将生泥装入真空练泥机制成熟泥。在制胎前，一般还要将熟泥再次练制，以便在制作时更为得心应手。经过制坯后，将壶坯装入匣钵，再根据各种泥色对温度的不同要求装入窑车入窑烧制。

紫砂壶成型的方法有全手工成型、手工与部分模具结合成型、全部石膏模成型、注浆成型、车坯成型等。全手工成型法是传统的古老制壶法，需要经过打身筒或镶身筒等工序。打身筒，先将熟泥开成一定规格的“泥路丝”，把这些泥路丝打成符合器皿要求的泥条和泥片，用工具划出泥条的宽度，旋出制作壶口、底、围片的料，再将围片贴在转盘中间，以泥条围接成筒状，用一只手垫在筒内壁上，另一只手持拍子拍打成型。镶身筒成型，用于方形器皿。将泥路丝切成方形块，再打成泥片，按照设计的样板裁切泥片，用脂泥粘贴成型。全手工制作要求艺人的技艺水平很高，但可以更加灵活准确地表现器物造型的线条，表现作者内心的意境，故属

于高档艺术品。当然，在当代艺术品中，为了更好地表现艺术主题，有时在作品的某一部位采用特定模具，这类作品属于手工与部分模具相结合成型。注浆成型是现代工艺的尝试，但是效果不好，不适宜用纯正的紫砂陶泥制作。拉坯成型方法，也是当代出现的做法，经过很多试验，终究不能用纯紫砂陶泥完成成型。用石膏翻模制作紫砂陶壶的时间并不长，凭借石膏模可以免去长时间学习制作技术的过程，生产速度加快许多。这种方法一来可以基本保证快速大量生产供应市场需求；二来也可以保证同一种造型的器物造型固定，满足大众的相同爱好，还有利于固定每一把壶的用泥量，以便比较精确地计划成本。但是，从艺术品角度看，这类产品缺乏生灵感，造型再复杂也是失神的。

紫砂壶的造型品种是最多的，除了仿照历史上的传统造型外，作者别出心裁的造型层出不穷。紫砂陶艺人初学时，必然先临摹前人的作品，待熟练地掌握了制壶各个阶段的技巧之后，才可以做到心手相应，按照自己的设计进行创作。将各种造型的壶分出类别，主要有以下几类：

(1) 以食品为题材的类别。如寿桃壶、荸荠壶、枇杷壶、三珍壶（竹笋、栗子、香菇）、南瓜壶、白菜壶、青椒壶、芒果壶、金铃子壶、西瓜壶、百果壶（图一）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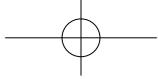
(2) 以各种植物、图案为题材的类别。如菱花、菊花、树瘦壶、如意、云蝠、扁方、圆珠、竹段、梅段等（图二—五）。

(3) 其他题材类别。如僧帽壶、百纳壶、八卦壶、人物故事壶、戏剧人物壶、灯笼壶、包袱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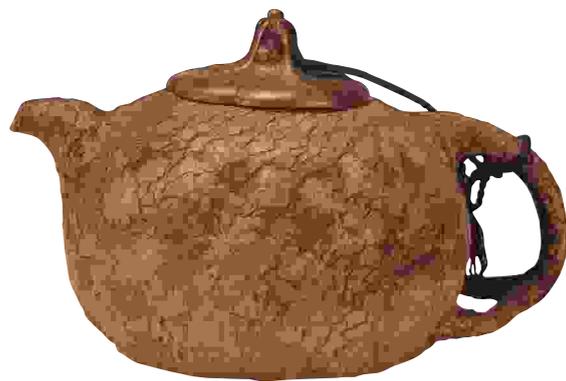
3、各时期紫砂茗壶的风格特点。

与其他文物的历史性一样，不同年代的紫砂壶各有其风格。北宋年间开始有了紫砂壶，直至明正德年间，这段时间的壶多为使用器皿，造型简单，制作粗拙，因是与日用缸瓮一起搭烧，器表上经常粘有釉泪痕迹。从正德至明末，器物风格浑厚、协调，纹饰以筋纹较多，简洁清素，注重线条，受其它器类的影响，仿青铜器、仿瓷器是制壶大家们的基本造型，在此基础上，各家又有不同之处。万历以前大壶较多，之后，由时大彬起，制壶受文人雅士影响，体型变小，艺术内涵增大。

清代的紫砂壶受其他类艺术品大环境的影响，进入到了又一个发展高峰。无论造型、技艺、装饰都有了许多创新。在康、雍、乾盛世，无论宫廷内外、皇室庶民、文人雅士，无不追求华丽富贵、奇巧精致的雅玩欣赏，使紫砂茗壶的制作更加兴盛。在继承发展传统方法之外，还使用了泥绘、浮雕、



图二 蒋蓉制荷花壶



图三 清末黄玉麟仿供春树瘿壶



图四 清光绪菊瓣壶



图五 紫砂松段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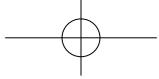
堆贴、镂空、绞胎、粉彩、珐琅彩、炉钧釉、包漆、包锡、镶玉等多种装饰。以陈鸣远为代表的制壶名家，将文人风范更多地表现在紫砂壶上，使紫砂壶成为文人雅玩。嘉、道期间，文人参与制壶，开辟了金石书画以外的又一领地，使紫砂壶有限的空间集诗、书、画、篆刻于一体，小小掌上把玩之物，句之精辟、字之多姿、画之简练、款之规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以陈曼生为代表的众多紫砂壶制作者，其本身并不在艺人范畴，而是文人，呈现了文人制壶的局面。清末至民国时期，虽然社会动荡多难，紫砂壶的制作受到很大影响，但仍不乏制作大师和优秀的作品出现。以程寿珍、范大生为代表的一代紫砂名艺人，承上启下，继承了前人的传统，

也为后人留下了大师们的佳作，将紫砂壶艺术推向前进。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各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推动下，紫砂工艺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各时期制壶大师，以顾景舟大师为代表，以后浪推前浪之势，层出不穷，蓬勃发展（图六）。在工艺上，恢复了优秀的传统作品制作，新创作作品也更加注重艺术的表现，作品在国内外频频获奖。

三、历代紫砂茗壶制作名人

供春，明正德四川参政吴颐山家僮，流传久远乃至当今的作品为供春壶。



图六 顾景舟制提梁壶



图七 汪寅仙神鸟出林壶

董翰，万历时人，创始制作菱花式壶。

赵梁，万历时人，多制作提梁式壶。

元畅，也有称其为元锡，万历时人。

时朋，万历时人，时大彬之父，与董、赵、元为当时供春之后的四大名家。董翰制壶风格文巧，另三者风格古拙。

李茂林，名养心，万历时人，善于制小圆式，风格简单朴实精致。他开创了匣钵烧制的先河，结束了以往紫砂壶与粗陶搭烧的方法，使紫砂壶烧制跨上新的台阶。

时大彬，时朋之子，号少山。祖上时彦在宋代做尚书。以前做大壶，后与文人相处，发现他们喜欢小壶，自此专制小壶。他本人还研究学习《黄庭》、《乐毅》帖，因此壶上的款字颇具书法功夫，是当

时其他人无法相比的。相传他制的壶盖子很严，能拔盖提壶。

李仲芳，李茂林之长子，万历时人，是时大彬高徒里的第一人。制壶风格文巧，很得师傅赏识。相传，每逢仲芳制作出好壶，大彬首肯之后落上自己的款识，就有“李大瓶，时大名”之说。过去管瓶也叫壶，意寓李仲芳制壶，时大彬落款。由此可见，传世时大彬款的壶，即或就是万历年间的，也很有可能出自李仲芳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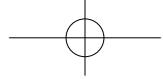
徐友泉，名士衡，万历时人。他多制仿古代的尊、壘等器物造型，厥制有：汉方壶、扁觥壶、小云雷壶、提梁卣、蕉叶壶、莲方壶、菱花壶、鹅蛋壶、分档索耳壶、美人垂莲壶、大顶莲壶、一回角壶等。尤其善于用泥配色，使颜色符合造型的要求。



图八 李昌鸿制青玉四方壶



图九 顾绍培制松云壶



他配的泥色有：海棠红、朱砂紫、定窑白、冷金黄、淡墨、沉香、水碧、榴皮、葵黄、闪色梨皮等。

时大彬弟子著名的还有欧正春，善作花卉果子式壶，非常精妍。邵文金，又名亨祥，仿时大彬、李仲芳之作，尤其仿汉方壶独绝。邵文银，又名亨裕，制壶文巧，具有大彬作品风格。蒋伯琴，名时英，制壶落“天籁阁壶”款。还有陈俊卿，大彬晚年弟子。沈君盛，大彬再传弟子，善仿徐友泉作品。与大彬同时代的还有：邵盖、周后溪、邵二孙。

明天启、崇祯时代制壶有名的有：陈仲美，原本是婺源人，在景德镇制瓷，后来转到宜兴制紫砂壶。他善于制造文玩用具，制作风格重锏叠刻，达到鬼斧神工的境地。他的作品还有香盒、花杯、狻猊炉、辟邪镇纸、鸚鵡杯等。沈君用，与陈仲美风格同类，更加妍巧，善于配土，壶的样式属于欧正春一派。沈子澈，制作水平与大彬齐名，造型丰富，无所不做。惠孟臣，所制大壶浑朴，小壶精妙，后人仿制很多，壶盖内有“永林”篆书小印的器物最为精致。此外还有：陈用卿、陈正名、闵鲁生、徐令音、陈辰、陈和之、陈挺生、承云从、周季山、徐次京等。

清初及康、雍、乾制壶名家有：惠逸公，雍、乾时人，制壶与惠孟臣不相上下，后人仿品也多。王友兰，顺、康时人，制拙政园茗壶。还有许龙文、郑宁侯、范章恩、潘大和、杨彭年、杨宝年、杨凤年、吴月亭。嘉、道时人有：葛子厚、冯彩霞、邵景南、邵二泉、申锡等。同、光时人有：俞国良、王东石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老一辈制壶人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十一位大师是：顾景舟、蒋蓉、徐秀棠、汪寅仙、吕尧臣、徐汉棠、谭泉海、李昌鸿、鲍志强、顾绍培、周桂珍（图七—十）。

四、关于紫砂壶的文化艺术内涵

1、对器物审美的见解。

对器物的审美主要在外表现上。如：光器即素器。对圆形光器造型的基本要求是圆、稳、匀、正。器物曲线柔中有刚、圆中有变、厚而不重、稳而不笨才是美的。方形光器，要求线条流畅、轮廓分明、工整对称、平稳雅重、方中带圆才是美的。光器靠线条说话，线条是有韵律的，作者的性格修养会影响对线条的处理。只有简单而不失内涵的作品，才能使不加装饰、以线条为美的光素之器显现出美感。对于花器来说，有意趣、不落俗套的花器才是美的。花器要求有新意、变化多端；有想像力、

敢于突破；仿生要造型、颜色逼真。大师们认为，最一流的作品是神品，下面才是精品，精品可以做到很精致标准，但缺少神韵。神品有时并不一定非常标准，但神韵好，会说话。大师们的最高追求也在这里。

2、对文化内涵的见解。

工艺美术大师对制壶作者的文化有很高的要求。他们认为，做紫砂的人不光学艺，还要学文化，提高艺术素质。没有文化的制作者就像无土栽培种植物，“只能长豆芽，不能长大树”。做壶如做人，做人也如做壶，文化水平低的人，没有艺术修养的人，看不出作品的好坏。



图十 谭泉海制江南春壶

之所以大师们看重文化的作用，是因为紫砂茗壶的制作、鉴赏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历史上就流传着文人制壶的习俗。

时大彬制壶，最初请人写好字，他依样描刻。以后逐渐自学书法，能运刀如笔，书法闲雅，有《黄庭》、《乐毅》之韵。之后，许多制壶艺人都擅长诗、书、绘画、篆刻，使紫砂壶除造型寓意外，还具有了诗意、画意。文人参与制壶，形成了制壶业的雅流。如：彭年、项元汴、董其昌、允礼、潘允端、邓汉、郑燮、汪淮、陈鸿寿、蔡恺、吴大澂、张之洞、胡远、端方等。他们当中既有高官显贵，也有文人雅士。他们将所喜爱的诗词书画、金石篆刻及收藏鉴赏的铭文雅句作为装饰，饮茶赏文，大大提高了紫砂壶的文化内涵。他们参与制作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有的设计新样定制，有的撰刻壶铭，有的钤印落款，有的著书立说，也有的偶尔即兴制作。文人的参与，使紫砂壶更加具有艺术和文化的元素，不仅提高了壶的品味，也提高了赏壶人的品味档次；不仅流传了制壶技艺，也继承了民族文化。这即是紫砂壶文化艺术内涵所在。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公司保管供应部助理馆员）



花盆关帝庙山门



延庆花盆关帝庙 二十司地狱壁画考辨

范学新

在延庆县千家店镇花盆村有座关帝庙，里面供奉着关帝、龙王、五仙、娘娘等众多神仙，是延庆东部山区多神信仰最具代表性的一处古建筑群。关帝庙曾在民国时期进行过大规模的修缮，至今在中殿和后殿的山墙上仍然保留着民国时期的龙王“雨毕回宫图”和地狱壁画 30 余平方米。而后殿东西山墙上的十殿阎罗和二十司地狱壁画（图一），与北京东岳庙七十六司、昌平桃林村七十四司地狱又有着很大区别，在北京地区十分罕见。

花盆关帝庙始建年代无考，清嘉庆十四年（1809 年）重修，民国时期亦有修葺。该庙为两进院落，由山门、正殿、后殿、东西配殿、钟鼓楼等 7 部分组成。后殿为娘娘殿，中间供奉紫霞元君，旁边侍立呵儿喽爷（主管气管炎疾病防治）、曹母奶奶（主管给往生的人灌迷魂汤）。东西两侧供奉着眼公娘娘和送子娘娘。在东西山墙上绘有完整的十殿阎罗和二十司地狱壁画。十殿阎罗与普遍流行的阎罗名称一致，而二十司地狱的名称却耐人寻味。壁画内容分布如下表所示：

花盆关帝庙后殿东山墙壁画分布图

六殿卞城王	四殿五官王	一殿秦广王	三殿宋帝王	二殿楚江王
孝亲司地狱	蛇咬司地狱	金桥司地狱	铁炕司地狱	炮烙司地狱
刀斩司地狱	枪劫司地狱	磨碾司地狱	虎咬司地狱	抽筋司地狱

花盆关帝庙后殿西山墙壁画分布图

十殿转轮王	九殿平等王	五殿阎罗王	八殿都市王	七殿泰山王
寒水司地狱	大斗小秤狱	修桥司地狱	割肾司地狱	刀山司地狱
箭射司地狱	锤播司地狱	斩腰司地狱	饿狗司地狱	油锅司地狱



佛教与道教都有地狱的概念，在具体内容方面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地狱观念。而民间普通信众一般很难区别开哪些是佛教宣扬的地狱、哪些是道教宣扬的地狱，往往把这些地狱观念掺杂在一起，形成了不同的地狱名称。所以民间关于地狱的名称和数量存在很大差异。根据佛教《十八泥犁经》^①的记载，地狱有十八层，指的是光就居、居虚略、桑居都、楼、房卒、草乌卑次、都卢难旦、不卢半呼、乌竟都、泥卢都、乌略、乌满、乌藉、乌呼、须健居、末都干直呼、区通途、陈莫。这些都是梵音，全部是一些刀兵杀伤、大火大热、大寒大冻、大坑大谷等的刑罚。后世比较流行的十八层地狱一般是指：第一层拔舌地狱、第二层剪刀地狱、第三层铁树地狱、第四层孽镜地狱、第五层蒸笼地狱、第六层铜柱地狱、第七层刀山地狱、第八层冰山地狱、第九层油锅地狱、第十层牛坑地狱、第十一层石压地狱、第十二层春臼地狱、第十三层血池地狱、第十四层枉死地狱、第十五层磔刑地狱、第十六层火山地狱、第十七层石磨地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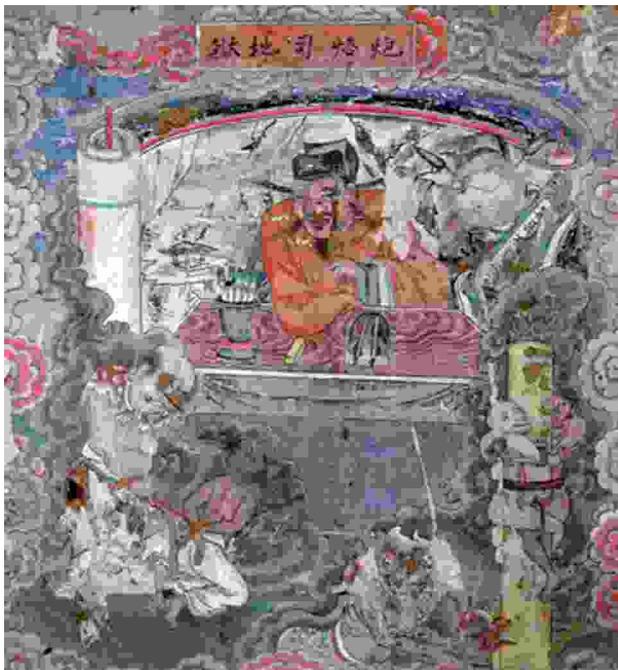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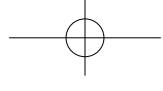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第十八层刀锯地狱。

与十八层地狱说法不同，按佛教的思想，阎罗王被认为是地狱的主宰，掌管地狱轮回。这一思想大约在南北朝期间由印度传入中国，其后与本土宗教道教的信仰相互影响，演变出具有汉化色彩的十殿阎罗。这十殿阎罗掌管着八重地狱。即第二殿的活大地狱、第三殿的黑绳大地狱、第四殿的合大地狱、第五殿的叫唤大地狱、第六殿的大叫唤大地狱、第七殿的热恼大地狱、第八殿的大热恼大地狱、第九殿的阿鼻大地狱。八重地狱之外，每重地狱各另有十六小地狱，加上血污池、枉死城，一共有一百三十八地狱。

此外，民间还有七十六司的说法（也称七十二司），这源于道教中关于东岳大帝的信仰。七十六司便是由东岳大帝管辖下的主掌人间善恶福祸、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冥府判官。司是中国古代官署的名称，唐宋以后，尚书省各部所属有司。明朝中央也设通政使司，地方设布政使司等。七十六司均设各自的判官，有些司的判官由历史上的忠臣、名



图一 后殿东山墙全景



图二 炮烙司地狱

人充当，如速报司的判官岳飞等。北京朝阳的东岳庙有七十六司塑像，昌平桃林村东岳庙比较完好地保存着七十四司的壁画。

而延庆花盆关帝庙后殿二十司地狱壁画却与常见的十八层地狱、八重地狱等在名称和内容上存在着很大区别。经对比研究，这二十地狱包括了传统的十八地狱、八重地狱之外的十六小地狱的部分内容，还包括七十六司的几个司，甚至还有很多地狱名称根本在经典上找不到。地狱名称被冠以“某某司地狱”，是七十六司与地狱的混合产物。这些地狱名称融合了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等关于地狱的内容，继承了当地传统信仰模式，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随意性。

1、属传统十八层地狱内容的壁画

炮烙司地狱：应为十八层地狱中的第六层的铜柱地狱，又称抱柱地狱。故意纵火或为毁灭罪证、报复放火害命者，死后打入炮烙地狱。小鬼们扒光被罚者的衣服，让他裸体抱住一根铜柱筒。在筒内燃烧炭火，并不停扇扇鼓风，很快铜柱筒通红。被惩罚者满身血肉糊焦，死而复生，生而复死，其苦痛难当；至罪消毕，多堕畜生，畜生报尽，倘得人身，亦多贫贱、短命，或生恶劣环境。炮烙又称炮格，源于商纣为取悦妲己而采用的一种酷刑。《史记·殷本纪》中有“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於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的记载。（图二）

磨碾司地狱：应为十八层地狱当中的第十七层石磨地狱。糟踏五谷、贼人小偷、贪官污吏、欺压百姓之人死后将打入石磨地狱，磨成肉酱。后重塑

人身再磨。另外还有吃荤的和尚、道士皆如此。

刀山司地狱：为十八层地狱当中的第七层刀山地狱。亵渎神灵者、杀牲者死后将被打入刀山地狱。脱光衣物，令其赤身裸体爬上刀山……视其罪过轻重，也许“常驻”刀山之上。因为阴司不同于阳间，那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牛、马、猫、狗以及人，来者统称为生灵。

油锅司地狱：应为十八层地狱当中的第九层油锅地狱。凡是卖淫嫖娼，盗贼抢劫，欺善凌弱，拐骗妇女儿童，诬告诽谤他人，谋占他人财产、妻室之人，死后打入油锅地狱，剥光衣服投入热油锅内翻炸。依据情节轻重，判炸多遍。有时罪孽深重之人，刚从冰山里出来，又被小鬼押送到油锅地狱里暖和暖和……

2、属十六层小地狱内容的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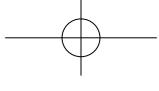
蛇咬司地狱：应为九殿平等王所管辖的阿鼻大地狱中的第十六小地狱紫赤毒蛇钻孔小地狱。在该幅壁画判官的判词中有“……引诱良家妇女及孀……”等内容，初步推断该地狱与淫邪有关。（图三）

抽筋司地狱：应与为九殿平等王所管辖的阿鼻大地狱中的第二小地狱抽筋播骨小地狱类似。生前好食动物之筋，如喜欢吃牛筋，又贩卖毒品、唆使犯罪、令人堕落，均堕此狱。观此中地狱，罪人被绑炼于柱上，筋被拉出，作绳索来拉车，后面又有鬼卒在鞭促、赶打，苦痛号叫盈天。又《玉准》云：遇有娇姿便思奸淫、怙恶不悛、恣行、唆人退婚、耸夫等，亦堕此狱。

寒水司地狱：应为二殿楚江王所管辖的活大地狱中的第十六小地狱寒冰小地狱。《经律异相》^②云：



图三 蛇咬司地狱



掷众生至寒冻处冻死。例如捕鱼，将鱼送入冰库，活活冻死，死后都入此地狱。《玉准轮科》云：仗势欺人，令人心寒亦堕此狱。当今许多不法之徒利用恐吓手段，逼迫对方就范，死后难出此狱。又好贪酒色，不孝敬父母亦是。

割肾司地狱：应源于第六殿下城王大叫唤大地狱中的第五小地狱割肾鼠咬小地狱。被打放此地狱的人首先被阴差割去生殖器，然后被绑于地，任由鼠咬，每日心慌意乱，刺痛难言，只怪自己一失足而成千古恨。

斩腰司地狱：应源于第六殿下城王大叫唤大地狱中的第十五小地狱斩腰小地狱。按着《佛说善恶因果经》上的说法，今生作巫婆骗人可上天取魂神把人救醒，死后要堕入斩腰地狱。此外，生前假扮道士或以神棍作法欺骗众生、诈骗财物。《玉准》云：不敬天地神明，均堕此狱。简单讲：破坏大自然环境、不珍爱资源就是不敬天地。

3、与七十六司名称相近的地狱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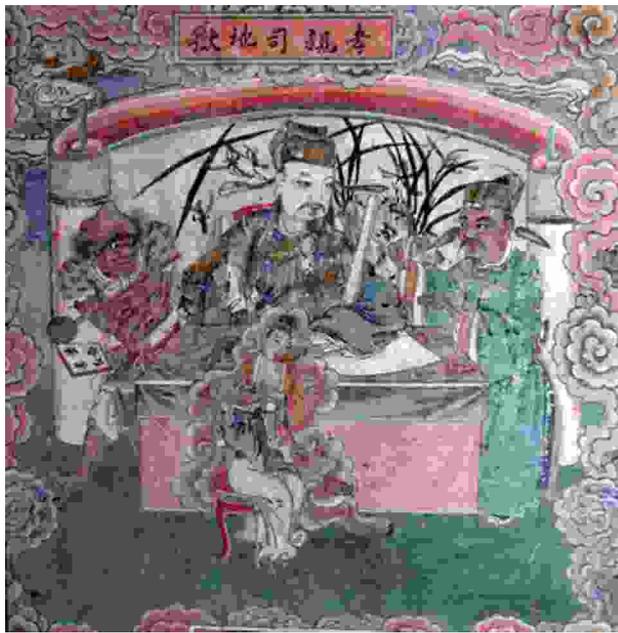
从泰山南高里山神庙的七十六司、北京东岳庙七十六司雕塑、《道藏》中记载的七十六司，到昌平桃林村七十四司壁画，七十六司的名称、排序均有不同。越是往民间发展，名称的随意性越大。^③

孝顺司地狱：应该源于七十六司当中的“孝顺司”。在北京东岳庙为“掌忠孝司”，在泰山南高里山神庙和《道藏》上均为“孝顺司”。花盆关帝庙的孝顺司壁画描绘的是一年轻妇人为一老妇人喂奶。该司的判官和小鬼显得和颜悦色。（图四）

金桥司地狱：应该源于七十六司当中的“金桥司”。在泰山山神庙七十六司中有“银桥司”和“金桥司”。花盆关帝庙的金桥司壁画描绘的是一位老人即将走上金桥的情景。身后判官的判词写道“在阳世生前好善孝亲，父母到地狱土地送过金桥指路”，旁边小鬼手持红批过的“善恶此报”路牌，前面的小童子则高举“金童引送善人”的飘带。看起来，阳世多行善事，就连父母死后在地狱也能受到优待。这应该是一个劝人行善的地狱。

大斗小秤狱：应该源于七十六司当中的“斗称司”。在昌平桃林村七十四司壁画中有“斗秤司”，其职能与第四殿五官王掌管的合大地狱中的第五小地狱断筋剔骨小地狱相近。主要是教育那些经商之人，生前“轻出重入”，缺斤少两的人，死后被打入此地狱。花盆关帝庙大斗小秤狱壁画中被惩罚的人被小鬼用秤钩钩住肋骨吊在秤杆上，另一头则挂着一个斗。背后判官的判词上还有“轻出重入……罪孽深重”等语。

饿狗司地狱：在昌平桃林村东岳庙七十四司壁



图四 孝顺司地狱

画中有“饿狗司”。花盆关帝庙饿狗司地狱壁画上一个人被一条黑色的恶狗咬住头部，倒在地上。旁边还有“无常”在用折扇煽风，背后的判官判词上隐约可以看出“春药”、“造淫书”等字。由此可以看出，被打入此地狱者与在阳世贩卖“色情淫秽”之物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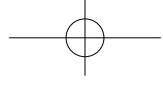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4、经典上找不到名称的地狱壁画

在花盆关帝庙后殿二十司地狱的壁画当中，有一部分地狱名称没有在通常人们所熟知的十八层地狱、十六小地狱和七十六司当中。个别地狱名称可以在其它经典当中得到印证，但有些可能是不同地区对地狱的称呼不同，或者是画师的主观创作。

铁炕司地狱：也叫铁炕地狱或火床地狱，过去“坑”和“炕”是通用的。这与十八层地狱中的“炮烙地狱”类似。火床地狱犹如人间的铁板烧。《经律异相》上说：“犯邪淫者，男抱铜柱，女卧铁床。”又如《正法念处经》云：喜爱杀生、烧、烤、煎、烹、焖、熏众生肉或践踏小虫者，死后均堕此狱；又其刑苦时间极长，非人能想象。即便此罪消毕，倘有犯其它罪业，再堕其它地狱一一受罪，直至罪业消竟。

刀斩司地狱：此地狱类似于人间处置死刑犯人，直接砍头了事。但是其前世究竟犯了何等错误还不得而知。

枪劫司地狱：这又是地狱观念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实证。在花盆关帝庙后殿的枪劫司地狱壁画中，审案的判官改成了头戴瓜皮小帽、戴眼镜的民国时期官员形象。处决犯人也不再用刀砍头，而是执行枪决。其在阳世犯了什么罪说不清楚，但是判



图五 修桥司地狱

词中隐约“善”、“恶”等字，应该还是善恶有报的延续。这幅壁画不仅能够证明花盆关帝庙壁画的绘制年代，同时也说明民间画师笔下的地狱没有固定格式，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

虎咬司地狱：也叫“虎啖地狱”。贪腹口欲，山珍海味犹不足，还要置网设陷阱捕捉野味，如山猪、野鹿、猴子等。凡此贪食动物者，死后入虎啖狱，成为老虎之美味佳肴。又《善恶报应经》云：妊身妇女，以药化胎，亦得是报。世风日下，道德式微，许多无知少女、妇女经常堕胎，尚不知犯此罪来日要入虎啖地狱之可怕！^④

修桥司地狱：在其它有关地狱的文献中没有发现在地狱里修桥的。花盆关帝庙后殿修桥司壁画中的两个人抬着石条在前面修桥，后面跟着一位拄着拐杖的老者，判官的判词模糊不清，可以看出“善工银也”等字。从判官和修桥人的神情分析，应该是属于福报类的地狱。可能是说在阳世时修桥铺路，多做善事的人，死后到阴间同样也有人其修桥铺路。（图五）

箭射司地狱：画面是一个人被绑在柱子上，肚子上被射了三箭。在地狱名称里与箭有关系的只有“射眼地狱”，按《经律》上说：生时以恶心恶眼看待父母，死后下此地狱，遭受被恶鬼射瞎双眼的刑法。但此幅壁画箭是射在肚子上，不知道处罚的是在阳世犯过何种罪孽之人？

锤擂司地狱：这幅壁画画的是一个小鬼正在用大锤猛砸一个趴在一块大石头上的人。判官们怒目而视，判词上只能看清一个“报”字。看起来这幅画反映的也是一个恶报的因果，但这个人究竟在阳世犯了什么罪却不得而知。

阎罗和地狱壁画，反映了人们鬼神信仰的内容。所有地狱壁画都是在教育人们弃恶从善。比如有教育人们活在世上的时候要做个好官，做个买卖公平的商人，孝顺父母、积德行善，远离淫邪等等。否则，等死后到阴间就会受到上刀山、下火海、抱铜柱、铁板烤、被虎咬、被恶狗撕、被锤砸、被箭射等一系列残酷的惩罚。与此相反，如果在阳世多行善事，死后也可以得到“孝亲司”、“金桥司”等地狱的优厚待遇。

如今，当我们再度审视这些壁画时，应尊重当时的历史环境，剥离其中封建迷信的外衣，从地方文化研究的角度去重新认识。二十司地狱壁画一方面对当时规范社会道德，维护社会稳定曾起到过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这些特殊的地狱信仰也对研究北京北部地区民间信仰的形成、演变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是研究延庆地区民俗、民间文化的珍贵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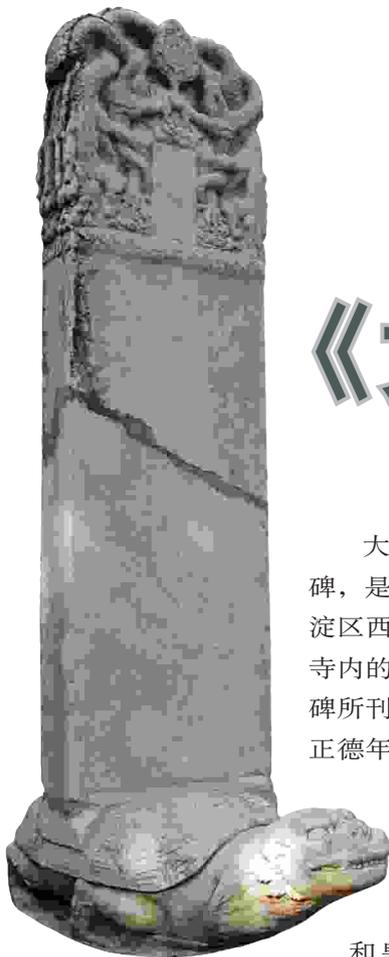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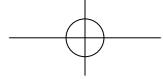
① 《十八泥犁经》，东汉安世高译。安世高，小乘佛经的首译者（约二世纪），本名为清，字世高，是西域安息国的王子，因为这一王族地位，所以西域来华的人都称他为“安侯”。泥犁，亦作“泥梨”、“泥黎”，梵语，意译为地狱。

② 《经律异相》，南朝梁代宝唱法师编撰。师江苏吴县人，俗姓岑，生卒年不详。《经律异相》属类书体，博采群言，广事搜罗，汇编众多散见于诸经律中的稀有异相故事，酌取精辟之理，条分缕析，依其内容分为天、地、佛、诸释、菩萨、僧、诸国王等二十二部，是百科全书的一种。

③ 陈巴黎：《北京东岳庙七十六司概述》，《北京文博》2004年第3期。

④ 参考《地狱变相图》，画家江逸子绘制，源于唐代画圣吴道子首创的《地狱变相图》，绘于2003年。

（作者为延庆县文化委员会副研究馆员）



大觉寺

《大明敕谕》碑考述

王松

大觉寺《大明敕谕》碑，是遗存于今北京市海淀区西北阳台山东麓大觉寺内的一块明代石碑。该碑所刊内容为明代成化至正德年间大觉寺所有的田产，以及明代皇帝下令保护大觉寺田产的敕谕，是研究明代佛教和皇家关系以及佛教经济的珍贵史料。

后期，孝宗开始沉溺佛教事务，据载当时“佛氏为中宫及大珰所信向。孝宗亦不能自异也”^③。大觉寺《大明敕谕》碑阳面所载敕谕正是在明弘治十七年，即孝宗主政最后一年颁布的，这时正是孝宗崇信佛教的时期。及至武宗，其崇信西番僧人，史载武宗“常袭其衣服，演法内厂”^④，并自封为“大庆法王”，又于西华门内建护国禅寺，^⑤对于佛教的崇信，武宗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石碑阳面正文开篇即提到孝肃太皇太后。孝肃太皇太后，英宗妃，宪宗生母，昌平人。^⑥因姓周，故又被称作周太后。周太后对孝宗影响至深，史载孝宗生西宫，母妃纪氏早死，周太后将他迎入宫中抚养，关心备至，因而使孝宗在宫廷斗争中得以保全，故“及孝宗即位，事太后亦至孝”^⑦。周太后笃信佛教，大觉寺《大明敕谕》碑碑文即载周太后“敬遵慈悲之教”。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周太后以“追思祖妣之仁，又世居其山之麓”为由，出内帑重修大觉寺。同年，周太后从弟周吉祥被任命为僧录司右阐教兼住大觉寺方丈，大觉寺也兼有了太后家庙的地位，即“恩泽稠叠”^⑧。

统治者在宗教取向上的选择，自然会对社会宗教倾向有很大的影响。大觉寺《大明敕谕》碑所刊刻的时间正是明孝宗和武宗崇信佛教的时期，这段时期，不管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社会风气上，都是有利于佛教发展的时期。而明皇室与大觉寺之间密切的联系使得明代皇帝对大觉寺尤为重视，大觉寺自宣德三年（1428年）重建至弘治十七年已有七十余载，经皇家赏赐，及皇家赐价银由大觉寺自行买卖经营，在这段时期内大觉寺积累了可观的田产，明代皇帝颁诏就是为了保护这些田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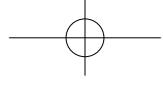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有明一代侵扰寺田等寺产纠纷一直是突出的社会问题，比如明太祖不但专设官员主理寺产问题，甚至曾亲自问断寺产纠纷。^⑨在某种程度上，寺院田产需要皇室庇护才能得以保全。北京地区戒台寺亦有明代《敕谕》碑一通，该碑记载了有人在戒台寺所属田地内“牧放牛马，砍伐树株，作践山场，

一、大觉寺《大明敕谕》碑形制及现状

大觉寺《大明敕谕》碑高3.30米，宽0.76米，螭首龟趺，汉白玉石质。此碑曾断裂两截，近年修复后置于大觉寺大雄宝殿北侧前方，龟趺为后补配。碑阳刻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十一月初九日孝宗敕谕，碑额篆书：大明敕谕。碑阴刻明正德四年（1509年）寺内田产。

二、大觉寺《大明敕谕》碑刊刻年代及政治环境

根据碑文，其内容涉及明代两位皇帝，即明孝宗和明武宗。有别于明代其他皇帝始终崇信佛教，明孝宗主政期间，其前期汰佛，后期崇佛。孝宗在位十七年，执政初期，有鉴于成化年间过分宠信释道，曾有汰佛之议。其主要表现有两方面，一是纠正清理成化时期滥封的法王、真人等，史载弘治元年“革法王、佛子、国师、真人封号。”^⑩二是重申寺额限制的规定，支持拆除私创寺观。^⑪至弘治中



又有恃强势要私开煤窑，挖通坛下，将说戒莲花石座并折难殿积渐坼动”^⑧，影响了僧人正常的法事和经济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明宪宗不得不颁诏保护该寺田产，不许他人再“骚扰作践”该寺山田园林。该碑刊刻于成化十五年（1479年），而明代皇帝降敕谕保护大觉寺田产为弘治十七年，两者相距不过25年时间。大觉寺与戒台寺的两通《敕谕》碑正可以相互印证明代寺产纠纷问题。正是因为明代僧人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寺院田产，所以才需要明代皇帝下旨保护其利益。大觉寺《大明敕谕》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刊刻的。

三、大觉寺《大明敕谕》碑所示大觉寺田产考

根据大觉寺《大明敕谕》碑两面碑文，可以确定大觉寺田产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寺院所属的田地；另一部分是归属于寺院的家人及佃户。

首先，论及大觉寺田产来源。从《大明敕谕》碑阳面内容可以看出，大觉寺田产来源分两种：

第一种是明代皇家所赏赐田产。明代皇室手中掌握着大量土地，这些土地主要是官田。官田即是籍没之田，这些田地由官府招募人员耕租。此外明代政府还组织开垦荒田、官湖田，俱为官田。^⑨这些官田中的一部分就成为了明代皇室赏赐田地的主要来源。明代沈榜在《宛署杂记》卷八《官庄子粒》中即论及此例，书载“历朝以来，各府州县没官田地渐多，奉旨征银济边，而以其余系之进宫项下，备不时拨给赏地之用。”^⑩

根据碑文记载，明宣德十年（1435年）起，明皇室先后赏赐给大觉寺庄田四处，有常乐庄地二十七顷九十九亩八厘，清河庄地八顷，汤山庄地二顷九十四亩一分四厘，冷泉庄地二十亩。其中庄地即指进入宫项之下的官庄，其田地即为庄田。

第二种田产来源是大觉寺出资买进的田地。购买田地的资金来源仍然是皇家，根据碑文记载，大觉寺以皇家所赐价银先后五次买地，这些地包括“顺天府宛平县□……八十五段，计地一十四顷九十八亩五分……顺天府昌平县□□里民人邓友□……八十五段，计地三十九顷四十七亩五分……金吾后卫指挥宋英亲弟宋□原买到□……三十亩……内官监太监刘□兄刘玉白地共五顷二十五亩……内府酒醋面局太监伍薰、侄男伍祥白地共五顷九十八亩”。^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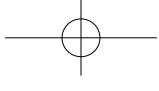
据时人记载，明代土地交易已经相当自由，或

出于钱粮短少，或因为手中田地无人耕种等原因，土地所有者都有可能将名下田产加以典卖。在《五刻徽郡释义经书士民便用通考杂字》中即有土地买卖的契约，契约中言明“某里某境某人，今为无银用度，情愿将已分官民田一段几丘，该几分……托中引就某宅，三面商议，实值时价若干两。其银当日交足，其田即听从银主管业……”^⑫。其他房屋田产买卖的事例在该书中也有类似记载，不再赘述。总之，将土地或房产等作为商品买卖在明代已然成为司空见惯之事。作为奉佛养僧的寺庙，也不例外地可以在皇家庇佑之下从民间购得一定量的田产。碑文中所载“顺天府昌平县□□里民人邓友□……八十五段，计地三十九顷四十七亩五分”即当属此等类型。

另外，如果将皇家赐予的价银看做物质上的资本，寺院还有无形的文化资本做为参与土地交易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寺院比世俗家户更多一层宗教的优越性。谢和耐指出，在一桩普通的土地交易中，若买方是寺院，那出售土地的人便可以认为在建福业，而僧伽和出家人在思想上的权威会增加其土地兼并的正当性。^⑬所以在掌握土地的人群中，自然就会有一部分人情愿将土地出售给寺院。

其次，论及家人及依附于土地的佃户。关于“家人”的概念，颜师古等人早有注解，最常用之意为“僮隶之属”，也就是奴仆。大觉寺《大明敕谕》碑阴阳两面对皇家赐给家人都有记载，但前后碑文略有差异，碑阳记载赐给“家人一十六名”，碑阴记载则是“钦赏家人一十六户”。不管是“名”还是“户”，都说明明代皇室对大觉寺之重视，不但赐予田产，还赏赐一定量的奴仆，以供寺院驱使。关于“佃户”，即是靠租种土地谋生的人。在封建社会，佃户一般固定地依附于某块土地，也就是说这些佃户会随着土地一起被转让，这种佃户被称为“随田佃客”^⑭。在大觉寺《大明敕谕》碑中所提到的“佃户五十七户”应是此种佃户，随着皇家将田地赐给大觉寺，依附于这些田地的佃户便一同转授到大觉寺名下。此外，早期佛教认为掘地伤生，僧人不事生产，因此，当时的皇家在赐予土地的时候，往往还将附近农户若干封赐给寺庙^⑮，后来佛教僧众逐渐形成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经济，但仍不免有皇家赐佃户给寺院以示恩宠的赏赐方式。

关于家人和佃户，两者有所区别。家人不依附于土地，不从事农耕，主要是作为仆人供主人驱使，而佃户则专指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在明代《四友斋丛说》中就有农民转变为官府家人不事农耕的



记载，书中记载“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百姓安于农亩”，随着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农民开始另谋它业。于是很多农民“去农为乡官家人”，不再从事农耕。^⑧

四、大觉寺《大明敕谕》碑所示北京地名考

在大觉寺《大明敕谕》碑中还提及数个地名，包括常乐、清河、汤山、冷泉、昌平、宛平等地。在这六个地名中，众所周知，明清时期昌平区包括今北京市昌平区和海淀区北部，宛平县领地则含今西城、宣武、门头沟、石景山四区全部，丰台、海淀两区大部及大兴区的一部分。而常乐、清河、汤山和冷泉四地是否与当今相同呢？在此依据资料略考如下：

常乐，最初为元代村名，明《永乐大典》中顺天府在“申明亭”、“乡社”、“军屯”目中称“常乐社”、“常乐里”。清康熙年间仍称“常乐社”、“常乐里”。光绪年间称“常乐村”。《光绪昌平州志》：“常乐村采访册：距城三十里，东至上庄三里，南至马房二里，西至前沙涧五里，北至八家四里，东南至大牛房八里，西南至苏家坨三里，东北至东小营三里，西北至后沙涧村五里。”^⑨根据描述，明清时的常乐村即今上庄乡常乐村，常乐村于1958年3月并入海淀区。^⑩

清河，在顾炎武《昌平山水记》中有记载为：“京师九门，其西北曰德胜门……出门八里为土城……又二十里为清河。”^⑪又根据《北京市昌平区地名志》和《北京地名典》的记载，清河在明代被称作清河店，^⑫或又被称作清河铺、清河社、清河村，旧属昌平区，于1952年8月划归北京市海淀区。^⑬古今资料相互印证，可推断出明代之清河与现今清河基本属于同一地区。

汤山，根据缪荃孙由《永乐大典》抄录出的《顺天府志》记载，“汤山在县（昌平县）东三十五里，下有温泉，俗呼圣汤”，^⑭《昌平山水记》也有类似记载：“曰汤山，在州（昌平州）东南三十里，有温泉可浴。《水经注》：湿水又东，温泉水注之，疑即此也。”^⑮昌平初为县，明正德年间升为州，其县治于明景泰年间有变化。由此推断，《顺天府志》与《昌平山水记》所记载的汤山应为同一区域。又根据《北京地名典》所记载，今日之小汤山所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与上引资料内容基本相同，可知即为碑中所述之汤山。

冷泉，根据记载，冷泉在元代就已经成村，因村中多泉，且与西侧的温泉村相对，故名。^⑯明代宋彦《山行杂记》：“金山口度岭至冷泉村，道旁皆水田，行二里许曰泰州务。”^⑰泰州务在明代被称作太州府或泰州务，至清代又称太舟务，即今天的太舟坞。^⑱自太舟坞东行约二华里即是今日之冷泉村，从地理位置上推断，明代冷泉村与今天的冷泉村应属于相同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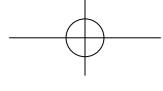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五、大觉寺《大明敕谕》碑所示明代土地税收制度

在大觉寺《大明敕谕》碑中，有多处提到征纳粮草之事，即明代政府向拥有土地田产的大觉寺征收赋税。自佛教东传以降，政府对于佛教寺院的赋役征纳大体经历过两个阶段，以唐代为分界线，在此之前，由于统治者崇奉和利用佛教，赋予了僧侣寺庙以种种经济特权。根据史书和佛典记载，唐以前之僧侣皆“不贯人籍”，^⑲“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⑳也就是说当时的寺庙享有免赋免役的特权。唐代开始施行两税法，其税法原则是“据地出税”^㉑，此后“天下庄产未有不税”^㉒，佛教寺院也要依法缴纳正税，佛教经济特权开始逐步丧失，到明代，寺院“赋役殷繁”^㉓。根据史书记载，明代“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㉔，说明明代僧侣寺院和普通百姓一样要向政府缴纳赋税。

横观碑文中有关征纳粮草的碑文，内容可分为三种：

第一，免征粮草。大觉寺《大明敕谕》碑阴面碑文：“钦赏本寺庄田四处：常乐庄一处，计地二十七顷九十九亩八厘；清河庄一处，计地八顷；汤山庄一处，计地二顷九十四亩一分四厘；冷泉庄一处，计地二十亩，俱免粮草。”该段碑文向我们提示了两层内容，一是这些田地属于皇家“钦赏”的庄田；二是这些田地“俱免粮草”，根据史料记载的钦定条例“钦赐田地税粮全免”^㉕，也就是说在明代由皇家赏赐给的田地不用承担赋税。

第二，征纳粮草。大觉寺《大明敕谕》碑阴面碑文：“成化十五等年，蒙宪宗纯皇帝奉圣慈仁寿太皇太后，赐价银买到顺天府宛平县□……八十五段，计地一十四顷九十八亩五分，该征□草二百八十一束。买到顺天府昌平县□□里民人邓友□□……八十五段，计地三十九顷四十七亩五分，该征□草三百三束三分。买到金吾后卫指挥宋英亲弟



宋□原买到□……三十亩，该征□草一百一十束。买到内宫监太监刘□兄刘玉白地共五顷二十五亩，该征（此行以下漫漶不清）买到内府酒醋面局太监伍薰、侄男伍祥白地共五顷九十八亩，该征□草□……束。”该段碑文也向我们提示了两层内容，一是这些田地是由大觉寺利用皇家赐给的价银所买下的民地；二是这些田地都标明了应征收的粮草数量，在弘治十七年十一月之前，这些田地一直都是正常向中央政府纳税的。

第三，免征一半粮草。相关内容，前半段与上面所引相同，即叙述成化十五年，大觉寺凭价银买到民地，该征粮草。后半段则是在弘治十七年十一月初九日“钦降本寺敕谕□□，内开买过两县民人地土该征草束免科一半”，在此碑阳面也有类似描述，为“所买地土该纳粮草养马□银免征一半”。以上碑文又向我们提示两层意思，一是弘治十七年十一月皇家给予大觉寺特殊恩典，依律该征的粮草俱免征一半，这种恩典在佛门丛林中是不常见的；二是给予特殊恩典的原因，碑文写得很清楚，“孝宗敬皇帝重念圣祖母太皇太后恩育甚厚，赐赉有嘉”，文中圣祖母太皇太后即孝肃太皇太后，也即周太后。周太后曾对孝宗皇帝恩育深厚，孝宗对其至孝。周太后崩于弘治十七年三月，为了感念周太后，孝宗对有周太后家庙性质的大觉寺加以了特殊恩典。

六、大觉寺《大明敕谕》碑所示明代僧官考

在大觉寺《大明敕谕》碑阴面，尚载有僧人法号二十余个，其中有“僧录司左讲经兼本寺住持性容……左觉义兼本寺住持悟祥……右觉义兼本寺住持净寿”等内容。碑文中所载之僧录司即是明代管理佛教事务的政府机构，左讲经、左觉义、右觉义都是僧录司官员名称。有明一代，明政府先设善世院，后改设僧录司，以掌管佛教事务，司内设官职八种。史载“在京设置僧录司、道录司，掌管天下僧道。精选通经典，戒行端正者铨之……僧录司掌管天下僧教事，设善事二员，正六品；阐教二员，从六品；讲经二员，正八品；觉义二员，从八品”^⑧。碑文中所示大觉寺住持性容即曾经担任左讲经一职，左讲经在僧录司中的职责为“接纳各方施主，发明经教”^⑨；住持悟祥担任左觉义，左觉义职责为“检束诸山僧行，不入清规者，以法绳之。并掌天界寺（僧录司最早所安寺庙）一应钱粮产业及各方布施财务，置立文簿，明白稽考。”^⑩住持净寿担任右觉

义一职，右觉义职责与左觉义类似。

除碑文所记载的三位住持外，大觉寺还有多位僧人曾任职僧录司。自宣德三年重修大觉寺始，至正德四年，有文字可考的大觉寺住持都曾在僧录司任职。宣德年间，大觉寺住持智光曾担任僧录司右善世；成化、弘治年间，大觉寺住持周吉祥曾任至僧录司左善世，《大明敕谕》碑所载性容，即为周吉祥之徒。善世一词源自《易·乾》：“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本义为善行于世，又可引申理解为导民善世之意。^⑪据史料记载，僧录司左右善世按正六品，与钦天监、大理寺左右寺正等官同等，^⑫是为总领天下佛教事务的官员，僧录司用印、封印皆由左右善世掌之。^⑬从以上情况看，至少在某段时期内，在大觉寺担任住持的僧人有在明代专门管理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僧录司担任要职的传统。

七、结语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⑭，这句话不但反映了古代皇权政治对于宗教事务发展的巨大影响，同时也是古代僧人游离在青灯古卷和世间俗事中的一种变通。明代皇帝崇信佛教，广封国师、真人，是政治上对佛教的支持；明代皇室赐田赐银给寺庙，是经济上对佛教的支持；社会风气也因为皇家的倡导而变得有利于佛教发展。明代佛教兴盛之功，应首推“国主”。

佛教的发展也对封建统治起到了辅助作用，正所谓“阴翊王度”^⑮。僧人以世出世间不二的观念，在持戒修行的同时，或为帝室祝延，或出则着官服而事于有司，而退则着僧服修道，在清修与世俗中穿梭，以至于能在山中修道而又能声闻朝野的僧人被视为高僧的标准和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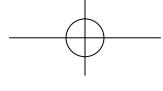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大觉寺《大明敕谕》碑即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缩影。

附录：大觉寺《大明敕谕》碑阳面录文

额题：大明敕谕

皇帝敕谕官员军民诸色人等：

昔我圣祖母孝肃太皇太后敬遵慈悲之教，成化十四年重修敕建大觉寺一所，祇奉诸佛菩萨，盖以阴翊皇度，普庇群生。凡殿堂门庑以及方丈庖□之类，規制悉备。本寺宣德十年原赏常乐庄地二十七顷九十九亩八厘，清河庄地八顷，汤山庄地二顷九十四亩一分四厘，冷泉庄地二十亩，并昌平县佃户五十七户，家人一十六名。成化十五等年买得顺天府宛平县民地八十五段，共一十四顷九十八亩五分，昌平县民地八十五段，共三十九顷四十七亩五



分，俱以资本寺之用。所买地土该纳粮草养马□银免征一半。恐后顽昧之徒罔知禁忌，或有褻渎毁坏盗窃陵占，兹特降敕戒谕：凡官员军民诸色人等，俱宜仰体至意，敢有不遵敕旨，辄肆侵犯者，必重罪不宥。故谕。

弘治十七年十一月初九日

大觉寺《大明敕谕》碑阴面录文

今将大觉寺原钦赏庄田并置买地土□□开坐：
宣德十年，蒙宣宗章皇帝奉圣母太皇太后钦赏本寺庄田四处：

常乐庄一处，计地二十七顷九十九亩八厘；清河庄一处，计地八顷；汤山庄一处，计地二顷九十四亩一分四厘；冷泉庄一处，计地二十亩，俱免粮草。

钦赏家人一十六户，佃户五十七户。

成化十五等年，蒙宪宗纯皇帝奉圣慈仁寿太皇太后，赐价银买到顺天府宛平县□□……八十五段，计地一十四顷九十八亩五分，该征□草二百八十一束。买到顺天府昌平县□□里民人邓友□□……八十五段，计地三十九顷四十七亩五分，该征□草三百三束三分。买到金吾后卫指挥宋英亲弟宋□原买到□□……三十亩，该征□草一百一十束。买到内官监太监刘□兄刘玉白地共五顷二十五亩，该征（此行以下漫漶不清）买到内府酒醋面局太监伍薰、侄男伍祥白地共五顷九十八亩该征□草□□……束。

弘治十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复蒙孝宗敬皇帝重念圣祖母太皇太后恩育甚厚，赐赉有嘉。钦降本寺敕谕□□，内开买过两县民人地土该征草束免科一半，钦此。本寺遵奉□□……外该征□草四百六十五束一分五□。

僧禄司左讲经兼本寺住持性容、左觉义兼本寺住持悟祥、右觉义兼本寺住持净寿，住持可保、道聪、道宝、湛洪；东序：提点净□、都官净伍、都寺道安、都文悟胤、监寺道受、副寺德受；西序：首座悟洪、可得、道景，书记道祥、道□，藏主周晖，维那德保、悟仙、惠春，堂司满玉、德渊；烧香官王□、张□、王□。

大明正德四年岁次己巳秋九月菊日立

- ①《明史》卷十五《本纪第十五·孝宗》。
- ②周齐：《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68页。
- ③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释道·僧道异恩》，中华书局，1980年。
- ④《明史》卷一百八十四《列传七十二·刘春》。
- ⑤《明武宗实录》卷一百十七。

⑥⑦《明史》卷一百一十三《列传第一·后妃一·孝肃周太后》。

⑧孙荣芬、张蕴芬、宣立品：《大觉禅寺》，北京出版社，2006年1月，39页。

⑨周齐：《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136页。

⑩北京市戒台寺明代《敕谕》碑阳面碑文。

⑪（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

⑫（明）沈榜：《宛署杂记》卷八《官庄子粒》。

⑬大觉寺《大明敕谕》碑阴面碑文。

⑭（明）佚名：《五刻徽郡释义经书士民便用通考杂字》。

⑮⑯何蓉：《佛教寺院经济及其影响初探》，《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⑰（日）丹乔二撰、虞云国译：《试论中国历史上的村落共同体》，《史林》2005年第4期。

⑱（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史九》。中华书局，1959年4月。

⑲（清）缪荃孙、刘万源：《光绪昌平州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143页。

⑳王彬、徐秀珊主编：《北京地名典》，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11月，498页。

㉑（明）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3页。

㉒昌平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昌平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7年10月，1078页。

㉓《北京地名典》，477页。

㉔缪荃孙辑录：《顺天府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4月，396页。

㉕《昌平山水记》卷上，18页。

㉖《北京市昌平区地名志》，1018页。

㉗（明）宋彦撰：《山行杂记》，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

㉘《北京市昌平区地名志》，1016页。

㉙《南史》卷七十《郭祖深传》。

㉚《广弘明集》卷二十七。

㉛《旧唐书》卷一百一十八《杨炎传》。

㉜《唐会要》卷八十四《租税》下。

㉝《招隐山志》卷十。

㉞《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㉟①②③④《金陵梵刹志》卷二，《中国佛寺志》4，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

⑤《大明会典事例·僧录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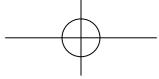
⑥《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108页。

⑦《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二。

⑧《高僧传》卷五《道安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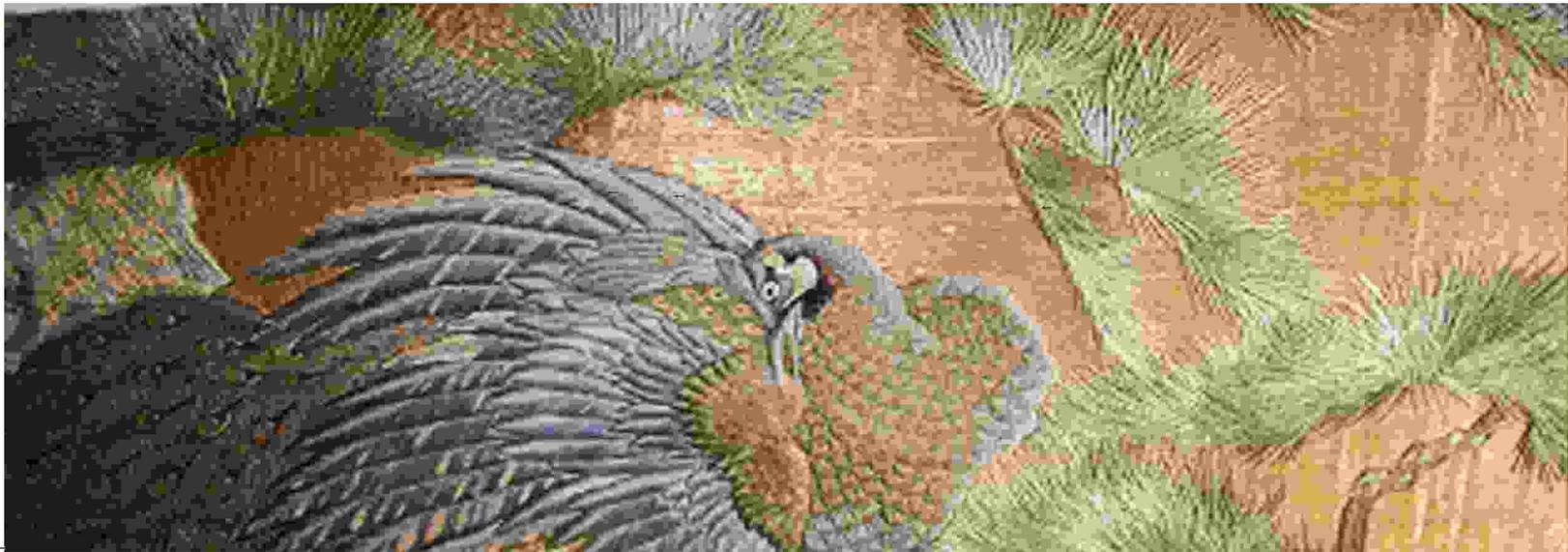
⑨《柳宗元集》卷六《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

（作者为北京西山大觉寺管理处助理馆员）



清代孔雀挂屏中金线的制作工艺研究

李玉玲 李 涛



一、引言

在纺织品中织入金线,是我国古代纺织技术中一种历史悠久的特殊工艺。传统的金线有“片金线”和“圆金线”之分。“片金线”亦称“扁金线”,制作时,将金打成金箔,粘上褙衬(褙衬料一般是纸或动物皮),再切成窄条,即得到片金线。“圆金线”也叫作“捻金线”,是在“片金线”的制作基础上,利用“片金线”缠绕丝纤维或棉纤维得到。

目前,利用现代科学仪器对古代纺织品中金线实物进行科学分析以及制作工艺研究,在国内尚不多见。2009年底至2010年初,首都博物馆文物保护和修复中心对传世的一件清代孔雀挂屏进行了抢救性修复,其中,挂屏上脱落的部分“圆金线”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为获取这批金线的制作技术信息,本文作者采用三维视频显微镜、扫描电镜和能谱分析、红外吸收光谱等技术,对金箔、金箔褙衬纸、金箔包裹纤维进行了鉴别分析。

二、样品及实验条件

(一) 样品

本次分析的金线均脱落自孔雀挂屏。该挂屏以金线作地,挂屏上,由金线与丝线等混合刺绣的孔雀,显得富丽堂皇、雍容华贵。金线有三种规格,为便于表述,暂命名为①号、②号、③号。其中,①号金线最粗,脱落于金色的地子,②号金线中粗,脱落于孔雀尾部,③号线最细,脱落于尾羽的修补处。

(二) 仪器及分析条件

三维视频显微镜 美国科视达公司生产,型号 HIROX KH-3000,在放大 50 到 300 倍的条件下来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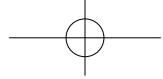
扫描电镜/X射线能谱仪 MODEL S-3400N 分析型扫描电子显微镜,配有 X 射线能谱仪。低真空,加速电压 15 kV,二次电子成像。

傅立叶变换红外显微镜 日本岛津公司生产的 IRprestige-21 型红外显微镜,样品在金刚石池内测试,得到透射光谱,波数范围: $400\text{cm}^{-1} \sim 4000\text{cm}^{-1}$ 。

(三) 分析结果与讨论

1. 显微观察

图 1 是三段金线在三维视频显微镜下的微观形貌,可以看出,①号、②号金线外层的金箔颜色发



红，线芯呈橙红色。线芯纤维纵面呈扁平带状，天然扭曲，具有棉纤维的特征。③号金线的金箔由三层薄膜组成，呈黄色，线芯为白色，其纤维呈圆柱状，光滑平直，有光泽，与丝纤维的特征相似。

分析结果见表1，①号金线内部线芯为两束线沿s方向夹捻，它的单丝数量较多，线直径最大；

②号金线线芯夹捻方向及单丝投影宽都与①号相同，但单丝数量仅是前者一半，故线直径次之；③号金线线芯线芯无夹捻，单丝投影宽较小，数量最少，因此其线直径也最小。从金箔的宽度看，①号金线最宽，②号次之，③号最小，与线直径的变化相同。

表1 金线及线芯在三维视频显微镜下分析结果

样品编号	金线投影宽 (mm)	金箔 (mm)		线芯投影宽 (mm)	单丝投影宽 (mm)	单丝约数 (根)
		宽度	厚度			
①号金线	1.03	1.5	0.0169	0.79	0.018	44
②号金线	0.72	1.07	0.0165	0.39	0.018	22
③号金线	0.34	0.26		0.16	0.009	18

2. 扫描电镜/X射线能谱仪

利用扫描电镜对样品进行微观形貌观察，同时，对三段金线的外层金箔、褙衬及线芯进行EDS分析。

(1) 金箔的EDS分析

表2中，①号、②号金线的金箔的化学成分基本一致，均为金、银合金，说明这两条金线可能使用同一批制作材料。根据清代工部则例，金箔

有“库金箔”、“苏大赤”、“田赤金”之分。“库金箔”的含金量最高，颜色发红；“苏大赤”的颜色正黄，成色较差；“田赤金”的颜色浅而发白，其中掺入了较多的银，也称作“选金”。从纤维观察以及分析数据看，①号、②号金线的金箔应该为“库金箔”。

③号金线的金箔中铝含量很高(>95%, wt%)，不含金、银，说明其实为铝箔。

表2 金箔的EDS分析结果 (wt%)

编号		Au	Ag	O	Al	总量
①号金箔	平均	89.35	10.65			100.00
②号金箔	平均	89.36	10.64			
③号金箔	中间层			2.22	97.78	

(2) 线芯的SEM-EDS分析结果

从线芯和褙衬纸的扫描电镜图和能谱分析结果(表3)可以看出：

①号、②号线芯纵面呈扁平带状，呈现自左向右的自然扭曲。线芯中主要含碳、氧元素，无氮元

素，初步推测①号、②号线芯为棉纤维。

③号线芯光学显微镜下纵面呈圆柱状，光滑平直，有丝纤维的特征。线芯中不含氮元素，电镜下纵向平直有沟横，这是人造丝的特征，判断可能是人造丝。

表3 线芯的EDS分析结果 (wt%)

编号	C	O	Na	Mg	Al	Si	S	Cl	K	Ca	Co	总量
①号	60.99	36.99	0.63	0.05	0.05	0.03	0.23	0.43	0.49	0.08	0.03	100.00
②号	64.31	34.47	0.43		0.28	0.03	0.08	0.18	0.20			
③号	45.87	53.85	0.10	0.16							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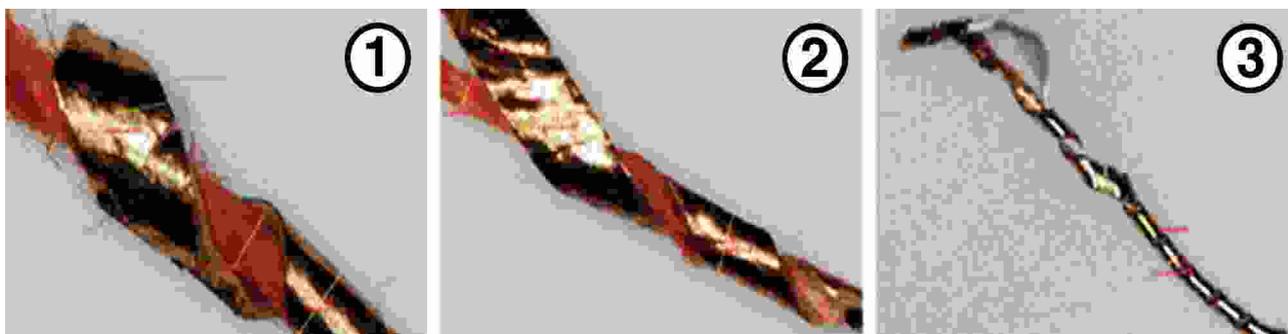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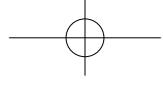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图1 金线的纤维观察结果(①号金线、②号金线、③号金线)



(3) 褙衬纸的 SEM-EDS 分析

①号、②号金线的褙衬由较粗的植物纤维组成, 纤维粗短, 偶呈扁平状, 两端渐尖, 端部钝尖形。纤维表面有横向条纹。薄壁细胞有阔叶木特有的导管分子, 呈长方形。因此, 判断该褙衬纸的原料为某种阔叶木的韧皮纤维。

另外, 对褙衬纸的显微观察发现, 纤维表面及纤维之间分布大量的球形颗粒, 颗粒的轮廓接近正

圆形, 表面光滑。在正交偏光下, 颗粒的中心较边缘突出, 近似“凸镜”。有非常明显的“消光十字”现象, 脐点稍偏离正中心, 粒径 $2 \sim 20 \mu\text{m}$ 。以上特征与小麦 (Wheat) 淀粉粒完全符合。推测是用于粘合褙衬纸与金箔的小麦淀粉糊的残留。

EDS 分析表明, 褙衬纸含碳、氧、钠、镁、硫、钾、钙等元素, 这些元素应该是造纸过程中碱性物质 (如石灰、草木灰) 等的残留。

表 4 褙衬纸的 EDS 分析结果 (wt%)

编号	C	O	Na	Mg	S	Cl	K	Ca	总量
①号	52.65	45.35	0.37	0.03	0.97	0.15	0.28	0.20	100.00
②号	61.79	34.10	0.43	2.17	0.46	0.77	0.71		

3. 傅立叶变换红外分析

(1) 线芯的红外分析

从线芯的红外分析谱图可以看出, ①号、②号线芯在主要的吸收峰位上完全一致。具体的峰位归属如下: 3350cm^{-1} (O-H 的伸缩振动吸收), 2920cm^{-1} (C-H 的伸缩振动吸收), 1640cm^{-1} 和 1427cm^{-1} (骨架振动的吸收), 1056cm^{-1} 、 1161cm^{-1} 、 1110cm^{-1} 、 1037cm^{-1} 和 898cm^{-1} (O-H 的弯曲和 O-C-O 的伸缩振动)。上述峰位与天然纤维素的特征吸收谱带完全一致, 说明①号、②号线芯为某种纤维素类物质。与之前判断为棉纤维的结论一致。

③号线芯红外谱图与①号、②号线芯一样, 具有纤维素的特征谱带, 根据扫描电镜微观形貌分析, 其具有丝的特征, 能谱仪的测试不含氮元素, 疑为人造丝 (人造丝即人造纤维, 主要是纤维素纤维), 经查阅文献后, 得知人造纤维和天然纤维的特征吸收峰基本相同^①。因此可以推断③号线芯为人造丝。

(2) 褙衬纸的红外分析

从红外吸收谱可以看出, ①号、②号褙衬的吸收峰相似, 它们的吸收峰与天然纤维素的吸收峰一致, 进一步证明①号、②号褙衬为纸质褙衬。

已知的明代纺织品中使用纸质褙衬的例子, 参见《南昌明宁靖王妃墓出土的纺织品平金线的 SEM 分析》一文: “明代平金线的褙衬为植物纤维, 元代平金线的褙衬为动物纤维。南昌明宁靖王妃墓出土的纺织品平金线的褙衬是竹纸。由 $2 \sim 3$ 层竹纸经纬交替叠加一起, 经木棒捶打使之紧密结合而成。”^②

③号金线没有褙衬, 金箔内壁贴覆一层无色透明薄膜, 薄膜的红外吸收峰及其归属如下: 最强谱带在 1751cm^{-1} (C=O 伸缩振动), 1369cm^{-1} (CH₃

的弯曲振动), $1234\text{cm}^{-1} \sim 1053\text{cm}^{-1}$ (C-O 的伸缩振动), 894cm^{-1} , 这与醋酸丁酯纤维素^③的红外吸收谱带一致。

三、结 论

通过对三段金线的检测与分析, 得到如下初步认识:

(1) ①号、②号金线是真正的圆金线, 由粘贴在褙衬的金箔缠绕线芯制作而成。金线的线芯是棉线, 金箔的褙衬为纸质, 粘胶剂为淀粉糊。

(2) 金箔含金量近 90%, 应是清代文献中提到“库金箔”, 金箔的平均厚度不足 0.017mm , 且厚度较均匀, 说明当时金箔制作工艺达到很高水平。

(3) ③号金线的“金箔”实为铝箔, 其内外壁贴覆的薄膜为醋酸纤维素类物质。醋酸纤维素类是 20 世纪 40 年代后才发展应用的高分子材料, 因此, ③号金线应是前人在修补该件孔雀挂屏时使用现代工艺和材料制成的代“金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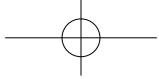
该研究开创了采用科技手段探索首都博物馆馆藏纺织品金线制造工艺的良好开端, 对于研究、修复及复原古代纺织品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①李青山:《纺织纤维鉴别手册》,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9 年, 第 109 页。

②周昉、汪自强著:《南昌明宁靖王妃墓出土的纺织品平金线的 SEM 分析》,《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三次学术年会论文集》, 2004 年, 第 153 页。

③李青山:《纺织纤维鉴别手册》, 第 102 页。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技术部实验室职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博士研究生)



从《胤禛行乐图》看 雍正帝的淡泊情怀

徐瑾

雍正帝是一位历史上最受争议的帝王，一方面他绝对为勤政之君，为清朝的鼎盛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仁君”的称号却与他无缘，在稗官野史中胤禛甚至被妖魔化，变成一位为了谋权篡位，摒弃了母慈子孝、兄弟手足，整日骄奢淫逸，喜怒无常，无德而暴戾的昏君。随着近几年清史研究的发展，雍正帝得到了更加公正的评价：雷厉风行，不苟言笑，城府颇深，现实而刚毅是胤禛固有的个人形象，他似乎远离了被许多帝王闲暇时所津津乐道、附庸风雅的文人情怀。但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宫廷绘画中，却有百余幅以胤禛形象绘制的行乐图，其数量是其他帝王所不及的。在众多行乐图中，胤禛化作各种形象，他将自己置身于山川河流、恬园雅舍中，或扮作田间稼穡的农夫，独钓江雪的渔翁，采菊东篱的隐士，或闲坐高阁、遥望远山，或停舟待月、追慕悠思。他甚至不惜将自己离奇的变换身份，或古人、或神仙、或僧人、或外藩洋人，充满各种奇幻色彩。而众多行乐图则营造出一种共性：在清雅的意境中，体现出主人公远离宫廷斗争，超脱闲适的淡泊情怀。在这里，胤禛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这个儒雅飘逸、悠然自得、追求士人风雅生活的胤禛，与朝堂之上那个正襟危坐的现实主义者大相径庭，可谓是对雍正传统形象的颠覆。本文就从《胤禛行乐图》入手，试析胤禛这鲜为人知的淡泊情怀，以及胤禛为什么终会选择以“铁腕君主”的形象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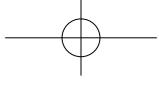
一、怡然自乐中做个富贵闲人——胤禛行乐图的主题

在现存的胤禛行乐图中，多无作者姓名款识，但应为当时宫廷画师所做，尤以成组画册居多。胤

禛行乐图可以根据绘制的内容分为几类：其中，很少一部分是以胤禛的现实生活为描绘题材，这类作品中，胤禛的年龄较为年轻，部分还处于皇子时期。以描绘燕居生活为主，胤禛身着常服，常有臣子、侍从、家眷随侍。画面以园林为背景，疑为康熙赐予胤禛的圆明园，特别是其中一幅清晰的绘制出胤禛以年轻的皇子形象端坐于朗吟阁中(图一)。朗吟阁位于圆明园中路“天然图画”内，是康熙赐给胤禛的书斋，胤禛曾做诗《秋日登朗吟阁寓目》^①，描绘秋日夕阳下登临朗吟阁所见赏心悦目之景色。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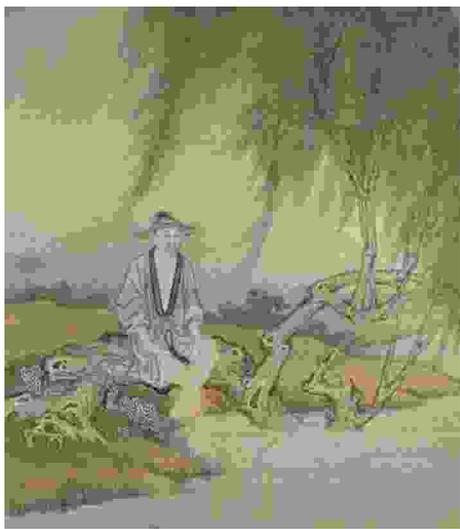
图一 清人画胤禛朗吟阁图像



文物研究

二，是有着具体情节的风俗画，以《胤禛十二月景行乐图》册为代表。十二月景行乐图描绘了古人在一年中因时令而从事的清雅之好，分为：正月观灯、二月踏青、三月赏桃、四月流觞、五月竞舟、六月纳凉、七月乞巧、八月赏月、九月赏菊、十月画像、冬月参禅、腊月赏梅。此套行乐图为众人像，雍正身着汉人服饰，混于人群之中，或为主人，或为观众，整套图画散发出悠闲富贵的生活情趣。其三，是意境清雅的设色山水画。画中胤禛身着汉服，装扮成古代文人隐士，置身于高山远水中，深林清涧边，高阁庭院里，山野村舍间，如隐士一般，在画中独坐静思、看山观水、漫步游春、深山访友、清谈论道……呈现出一派闲淡而幽静的隐士之乐。此类题材的最大特点就是皆为成组图册，以描绘自然景观为主，胤禛的形象只是点缀其间，那种逍遥自在的淡泊气质与自然景致浑然一体，整体画面弥漫着诗画结合的文人画气息。其四为胤禛的肖像画，在这些画面中，已全然不见胤禛的帝王身份，他转换成各种不同的形象，除了传统题材中的文人隐士，他甚至把自己装扮成诗词典故、神话传说中的人物。

虽然各篇行乐图绘画风格不同，但都蕴含着一种清心寡欲的淡泊情怀，那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墨客所向往的诗画结合的归隐生活，也是胤禛行乐图所表现的共同主旨，如以下几幅：



图二

图二中，胤禛是一位清流濯足的野老农叟。夏日郊外，清流河畔，岸边杨柳随风拂动，胤禛坐在弯曲入水的树干上，头戴斗笠，身着粗布宽衣，袒胸缩袖，入水濯足，似将凡尘俗物随清泉流去，留下一身清凉。画师将胤禛的形象描绘得随意不羁，似能感受到拂面而来的夏日凉风和耳边潺潺流淌

的清河水。罗大经在《山居述事》一诗中云：“坐弄清流，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②正是这种生活状态的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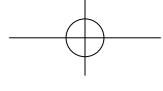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图三

图三中，胤禛手持团扇，悠然漫步于水边。岸边湖石泛出青苔，石旁兰草已长出新叶。如雪梨花压满枝头，有的欣然怒放，有的含苞待放。忽而春风吹皱一池春水，便是“濛濛岚气侵衣润，款款香风扑面轻”。^③雍正正在他的御制诗中曾写道：“斋居读书暇，晚来池边步。水面落花浮，水底行云度。山色从西来，泉声日东注。静观物何间，超然得妙悟。”^④读书之暇或政务之余，胤禛漫步于圆明园的池边湖畔，纾解案牍劳形，思悟人生，这幅画正是胤禛真实生活片段的写照。



图四

图四中，胤禛独坐水边自斟自酌。他倚坐在岸边的怪石上，身边修竹湖石掩映，几朵不知名的鲜花盛开其间，身后是片开阔而平静的水面，波澜不



惊。一壶清酒，一碟素食置于石上，胤禛举杯独酌，面色淡然，望向远方。恰似胤禛诗中所云：“对酒吟诗花劝饮，花前得句自推敲。九重三殿谁为友，皓月清风作契交。”^⑤皇帝掌握着他人的生杀予夺的权力，拥有不可冒犯的绝对威仪，注定要成为孤家寡人高处不胜寒，怎会有推心置腹的至交好友呢，也唯有寄情于皓月清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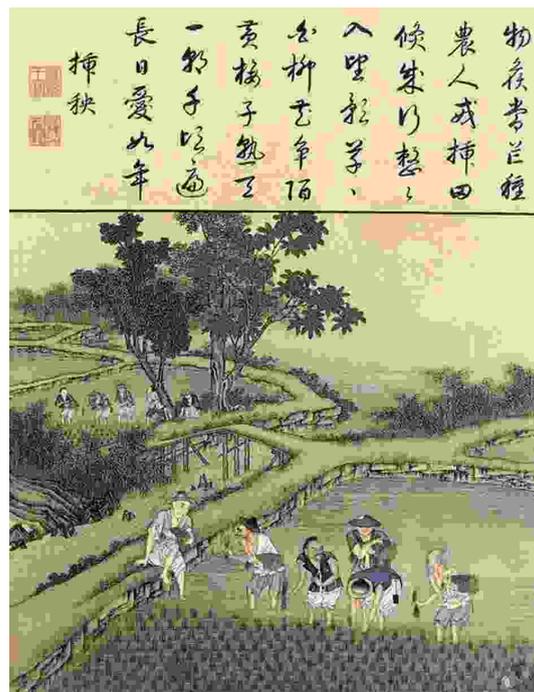
胤禛行乐图营造了诗一般的意境，在他亲自择选、将历代“佳章好句”简编成册的《悦心集》和御制诗中，许多诗句都与画中情景相对应。胤禛曾这样评价自己：“朕生平澹泊为怀，恬静自好，乐天知命随境养和。”^⑥并自称为“天下第一闲人”^⑦。

二、以退为进的御政之道——以淡泊情怀做政治手段

虽然胤禛标榜自己“澹泊为怀，恬静自好”，但他却可以在众多兄弟明争暗斗，环境极为复杂的皇位之争中运筹帷幄，后来居上，不露声色的最终问鼎皇权。胤禛登基皇位之所以出人意料，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其他皇子都纷纷锋芒毕露的争权夺位时，“雍亲王”却一向以平静淡泊，以与世无争的外表示人，而胤禛正是在“富贵闲人”的掩护下，一边韬光养晦，一边厚积薄发，以退为进的夺得皇位。可以说，在这一胤禛政治生涯乃至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中，他的淡泊情怀曾作为一种精明的政治手段被胤禛所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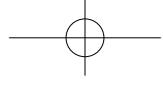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康熙的嫡子孝诚仁皇后之子——皇二子胤礽在出生后的第二年即被册立为皇太子，因此在胤禛前三十年的岁月中，他也像过往的古人一样，本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多过着较为单纯而平静的书斋生活，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令他积累起如文人雅士般深厚的文化基底，给人以“悠游恬适”的皇子形象。这一时期，胤禛“韬光养晦”，以“退”的姿态处在政治舞台上。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胤礽第一次被废后，皇子们对储君之位都已跃跃欲试，胤禛虽表面不动声色，但已暗地运筹，在此复杂的环境下，胤禛采取平和而讨好各方的策略，在康熙为众子相互倾轧而身心俱煎，多位皇子因争储而牵连获罪的形势下，胤禛始终因其低调而圆滑的处事方式确保其地位的稳定，并博得康熙好感。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胤礽被复立为皇太子，十月，胤禛被册立为雍亲王。此时，胤禛因争储梦想破灭，从而更加表现得“恬静自好，乐天知命”^⑧。从胤禛所做《雍邸诗集》中

的诗文题材可以看出胤禛完全过着一种闲居生活，以排解政治上的失意，同时打消康熙对自己争储的忌讳。《胤禛行乐图》中的大量场景就是胤禛雍邸生活的真实写照。就像他在《悦心集》序文中描述的“前居藩邸时，虽身处繁华，而寤寐之中自觉清静闲旷，超然尘俗之外”。^⑨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再废胤礽太子位后，胤禛则在他一向与世无争的掩护下，进行全面的争储计划。胤禛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他善于理会康熙心意，巧妙处理父子关系，及时吸取兄弟们的教训，善于网罗各种有用人才。康熙在初废太子时就传谕旨：“诸阿哥中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⑩胤禛深知明目张胆的争夺王位是康熙最恶，因此他一面暗渡陈仓，秘密筹划，一面以“天下第一闲人”自居，给人以归心田园、无意皇位的错觉。在康熙再废太子不久，各派皇位争夺战进入白热的情形下，胤禛则命人以自己及其福晋形象，作46幅为一册的《胤禛耕织图》，其中第1至23幅为耕图，第24幅至46幅为织图，其中胤禛夫妇化作田间坊里辛苦劳作的耕夫与织妇（图五），且每幅画面上均有胤禛题



图五 《胤禛耕织图》之插秧

诗，并钤有“雍亲王宝”和“破尘居士”之印。无论其画中辛勤劳作于田间的农夫形象还是以“破尘居士”自居，都向众人特别是康熙表达了他关心民生，偏爱农桑，无意权力之争的意图，以胤禛一向“置身事外”的性格，这套《耕织图》更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但迷惑了康熙，也放松了其他皇子对胤禛的警惕，实则成为胤禛争储的一把利剑。



文物研究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胤禛心腹戴铎曾在给他的书信中写到争储的策略：“……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所以为难。”^⑩这正是为胤禛指明如何处理好与康熙的父子之道：既显示出自身才能，又要谦逊而避免过分张扬，可谓是一语道破。胤禛虽心口不一回复此信说：“语言虽则金石，与我分中无用。”^⑪但胤禛却是这样做的，他正是吸取了众兄弟树大招风的教训，八面玲珑的处理好各种关系，对于康熙极表其孝道，认真处理好康熙交代的事务，在平和的外表下，表现出精干的办事能力。康熙曾评价他“至其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⑫同时，他又不露痕迹的笼络百官，特别是对雍邸人员加以培植，形成人数不多但能力强大的嫡系亲信。虽然胤禛的皇位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最终的论证，但不可否认，正是在这种闲适淡泊状态的成功掩饰下，胤禛不显山不露水地逐渐在康熙心中脱颖而出，步步向皇位走近。胤禛的策略是：以“天下第一闲人”的姿态以退为进，貌似一鸣惊人，实则步步为营的向皇权逼近。

三、勤政之君的归隐梦——以淡泊情怀做养心之术

胤禛并非政客，因此他的淡泊情怀不仅限于政治工具的做秀，而是深入影响到他个人心性的养成，以静谧修身，以悠远闲旷的清雅之心来“消除结滞，浣涤烦嚣”，这是胤禛一直所追求的。

胤禛在处理政事上多以刚毅果断的个性示人，但同时也有过于急躁、激烈的性格缺憾。康熙曾评价胤禛幼年时“喜怒不定”，康熙四十七年胤禛禀明父亲“昔年曾蒙皇父训饬，此十余年以来，皇父未曾降旨臣有喜怒不定之处，是臣省改微诚”^⑬，特请求“将谕旨内此四字，恩免记载”，足见胤禛对于此缺点的重视与抑制之心。雍正还特地将康熙所训导他的“戒急用忍”四字，“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⑭因此胤禛极为注重修身养性，行乐图中书斋独坐、湖边漫步、清波泛舟、松下论禅等都是他生活中真实片段的写照用以平心静气，消匿急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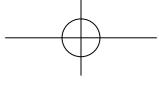
虽然雍正在政务上的许多极端做法证明他并没有真正做到“戒急用忍”，“无喜怒不定之处”，但经过多年的沉淀，胤禛却养成了性格中平静、内敛，追求清雅的一面。通过雍正、乾隆父子两人行乐图的粗略对比（图六、图七），就可以明显看出胤禛



图六 《乾隆雪景行乐图轴》

的这一个性。弘历行乐图多以群像示人，即弘历身边簇拥着侍者僮仆，家眷在旁，子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题材也多为苑囿中的宫廷生活，乾隆虽身着古代汉装，意在追求古人的风雅之美，但帝王的身份并没有改变。弘历行乐图中要刻意呈现出一派“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⑮的景象。加之绘画中已借鉴西洋油画画法，中西结合的绘画风格更使乾隆朝行乐图呈现出华丽富贵的风格。而胤禛行乐图，如前文所述，表达的是胤禛淡泊闲适，从容自在，超然尘俗之情，多只有两三家人为伴，更常常独自一人，突出一个“静”字。胤禛诗中“长伴予游鹤与松，何烦扈跸得从容”^⑯正是对胤禛行乐图最为精妙的概括。从雍正、乾隆行乐图形象和意境迥然不同，也可看出父亲善内敛、儿子喜张扬的不同性格。

《胤禛行乐图》中胤禛的形象是文人雅士，而画中背景园囿也表现了胤禛个性中对于田园生活、自然质朴的向往，许多学者认为行乐图中描绘的景致取材于圆明园。康熙四十八年，胤禛被封为雍亲王，受赐圆明园。圆明园建园初期，全然不同于皇家园林固有富贵奢侈的造园宗旨，胤禛采取一种取法天然、因地制宜的理念，即“林皋清淑，波淀潆泓，因高就深，傍山依水，相度地宜，构结亭榭，取天然之趣，省工役之烦。槛花堤树，不灌溉而滋荣；巢鸟池鱼，乐飞潜而自集。”^⑰园中景致在此时



从《胤禛行乐图》看雍正帝的淡泊情怀

也皆走天然质朴之风，“园之中或辟田庐，或营蔬圃，平原隴廛，嘉颖穰穰”，“至若凭栏观稼，临陌占云，望好雨之知时，冀良苗之应候。则农夫勤瘁，穡事艰难，其景象又恍然在苑囿间也”。^①如果说日后的圆明园是将中国园林所有精华集于一身“富贵神仙地”，那么建造初期的圆明园更像是实现胤禛归隐情趣“不尚其华尚其朴，不称其富称其幽”^②的“文人隐士园”。

如果说以淡泊情怀为养心术对于皇子时期的胤禛起到的是性格养成的作用，那么随着胤禛由皇子到皇帝身份的转换，从此要承担异乎寻常的压力与挑战，胤禛的淡泊情怀则是对自己疲惫不堪心灵的最大慰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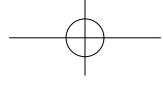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即位后的雍正远远没有享受如行乐图中清幽的文人雅士之乐，他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勤政的帝王之一。他登基伊始就十分清楚为君的宗旨和责任。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十七日，雍正上御乾清宫，召诸王满汉文武大臣官员时就曾面谕曰：“自古为君难，至于朕躬继承大统尤为难之难者。”^③寝宫养心殿西暖阁中高悬宸翰之匾、联：“勤政亲贤”，“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圆明园中更有雍正帝亲自书写的“为君难”三字。有臣僚曾称颂他：“竟日端坐，至黄昏秉烛之候，尚览悉庶务批达奏章。皇上莅政之勤，从古未有。”^④此言虽不免落入臣子对君王歌功颂德的俗套，但所言却是事实。特别是雍正皇帝建立了“朱批奏折”制度，用他的话来诠释：“此等奏折，皆本人封达朕前，朕亲自阅览，亲笔批发，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无一假手于人也，亦无一人赞襄于侧，非如外廷宣布之谕旨，尚有阁臣之撰拟也。”^⑤据统计，雍正朝现存满汉奏折近41600余件，均为朱批，雍正在位13年，朱批竟有三四百余万字，可谓“朝乾夕惕，事无巨细，亲为裁断”^⑥。除了更甚于康熙、乾隆的勤政外，不同于其父其子，胤禛不喜游乐，他在即位之初就罢鹰犬之贡，放生宫中珍禽异兽。虽在皇子时期曾陪同康熙出巡多次，足迹遍布半个中国，但其登基后却极少出巡，除东陵祭祀外，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紫禁城与圆明园之间，即便是近在承德的避暑山庄，成为雍正皇帝后的胤禛也不曾巡幸，这固然有对胤禛集团的提防，政务繁忙无暇顾及是更重要的原因，因此他的生活可谓十分单调。同时在他当政期间，曾经残忍刻薄的铲除了自己的手足兄弟和曾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宠臣，因此胤禛势必会落下凌虐弟兄、不仁不义的话柄。胤禛曾在《悦心集》序文中写道：“自总理万机以来，宵旰不遑，求如曩时之怡情悦目，不可复得”。^⑦书中胤禛表明

理想中的生活应如雍邸时“宁静之宰，恬澹之致”、“十分知足，外无求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成于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而雍正四年却是雍正统治中最为血雨腥风而极为重要的年份：正月，削隆科多职，令赴俄罗斯议界、允禩议罪削宗藩、易允禩亲王为民王；二月，革允禩民王，拘禁宗人府，改允禩名为阿其那，其子弘旺为菩萨保；五月，监禁允禵及其子于景山寿皇殿侧、改允禩名为塞思黑，押送保定监禁；八月，允禩卒于保定幽所；九月，允禩卒于幽所。可见，雍正充满冷酷和残暴的现实生活与他标榜的宁静致远可谓大相径庭。正是在这种矛盾的煎熬和无奈中，我们看到在《胤禛行乐图》中雍正扮做农夫、渔翁、仙人、道士、僧人、古代经典中的陶渊明、东方朔……，他出现在庭院池边、深山林涧、泉边松下，甚至上天入海、擒龙除虎……胤禛运用权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实现那个勤政之君遥远的理想。于是，通过《胤禛行乐图》展现了这样一个雍正：一边辛苦谨慎的遵守着他单调而具有时效的生活，把国家一步步推向鼎盛，甚至用不近乎人情的手段扫除障碍，给自己的儿子留下一个足以享受一生的天下，无畏留下后世的骂名。一边又小心翼翼的在他极为丰富的幻想世界里遨游，享受而不沉迷。淡然放下、随遇而安的闲人生活虽不再，但在谨慎而不敢懈怠的帝王之道中他偶尔也会躲进那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中排解忧思，“异想天开”，而后更加义无反顾的走向前方。

综上所述，淡泊情怀之于胤禛，不能只简单的视为政客在权力之争中的手段与工具，也非文人精



图七 《清人绘胤禛行乐图》



文物研究

神世界中的单纯追求。它是胤禛自身拥有的一笔财富，并被他在人生不同阶段淋漓尽致的“为我所用”。青年时期，作为修身养性的指导，而着力改变“喜怒不定”的性情；壮年时期，作为政治手段，以“韬光养晦”为掩护，为问鼎皇权推波助澜，即使没有得到皇位也可为自己留有余地。登基以后，则更像是一种心理慰藉以调整作为铁腕帝王的疲惫心性。历史证明，胤禛热爱至高的集权，满怀热情的成就皇帝的事业，而无论从行乐图、《悦心集》还是众多的御制诗显示，淡泊而悠然的清雅生活也是他由衷渴望的，而对于后者的喜好，胤禛却不得不最终深深埋于心底。因为，胤禛并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着特殊的经历和背景，这就注定让他终不能成为生活在田园，带着满身潇洒，带着些许幽默的“富贵闲人”。首先，胤禛成长在推崇儒家、尊敬孔子、倡导程朱理学的康熙朝，从小严格接受正统的儒家传统教育，理所应当会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作人生信条，由此注定他要选择的是承担责任。其次，身为皇子，胤禛生活在一个充满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宫廷环境中。康熙子嗣繁多，共有子女 55 人，其中儿子 35 人，他们之中除了夭折的，列入排序的就有 24 位，到康熙四十七年，第一次废太子的时候，20 岁以上的皇子有 12 位。康熙对众皇子期望甚高，他们从小便接受极为全面而严格的教育，因此康熙的皇子们各有所长，皆非等闲之辈。而胤禛排行第四，是年长皇子，政治活动中占据一定优势，其生母是乌雅氏，外祖父威武，担任护军参领，虽然胤禛的生母和外家并不高贵，但胤禛从小由康熙的第三任皇后孝懿仁皇后抚养长大，孝懿仁皇后不但深受康熙的宠爱与尊重，她的佟佳氏家族更是与康熙有血亲关系，在康熙朝占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无论先天的背景与资质还是后天的修养与能力，胤禛都有足够的竞争条件，因此在太子被废后，无论胤禛以何种超脱世外的形象示人，那只是一种手段，他的最终目的必然是夺得皇位，这是他身份与环境所必须做出的选择。再次，胤禛的特殊还在于他有一位雄才大略，平定天下，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的父亲——康熙大帝，而作为康熙“遗诏”中“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①的继任之君，前有康熙朝末年留下的各种弊端等待着他革新整饬；旁有各种反对势力虎视眈眈，借机策反；身后更是担负着治理泱泱大国、亿万黎民百姓的责任，雍正只能在前人巨大的压力下，在天下人的注视中，尽其所能用超乎前人的努力，做个不辱使命的勤政之君，用更加尖锐而极端的手段，铲除异己阻碍，从而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

天下。基于上述原因，注定使得胤禛要向世人呈现的是他强硬而精干的一面，如青史所留名，而将那平静而淡泊的感性一面小心的隐藏起来。这份淡泊情怀留给雍正的是一个特殊的人生、矛盾的个性以及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而我们只能从雍正朝大量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中，从雍正朝浩繁的奏折、档案中，摸索着走进胤禛心中那更广阔的世界。

①清世宗：《清世宗御制文》卷 30，《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0 年，第 350 页。

②清世宗：《悦心集》卷 2《山居述事》，中华书局，1985 年，第 44 页。

③清世宗：《清世宗御制文》卷 21《山池晚步》，第 242 页。

④《清世宗御制文》卷 25《池边》，第 283 页。

⑤《清世宗御制文》卷 30《花下偶成》，第 345 页。

⑥⑧⑨⑩《悦心集》卷 1《御制悦心集序》，第 1 页。

⑦《清世宗御制文》卷 6《雍邸诗集序》，第 85 页。

⑪马齐、朱轼等：《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3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壬寅”条，中华书局，1985 年，第 345 页。

⑫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文献丛编》第三辑《戴铎奏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

⑭《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35“康熙四十七年十月戊子”条，第 353 页。

⑮鄂尔泰、张廷玉等撰：《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 49“雍正四年冬十月丙寅”条，中华书局，1985 年，第 738 页。

⑯⑰《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 19“雍正二年闰四月庚寅”条，第 315 页。

⑱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第 2 页。

⑲《清世宗御制文》卷 28《湖际闻野寺钟声》，第 330 页。

⑳㉑朱彝尊、于敏中、窦光鼐等撰：《钦定日下旧闻考》卷 80《世宗宪皇帝御制圆明园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1321 页。

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第一册“雍正二年十月十七日丁亥”条，中华书局，1993 年，第 33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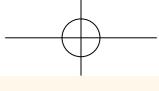
㉓《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 45“雍正四年丙午六月”条，中华书局，1985 年，第 667 页。

㉔清世宗敕编：《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序，商务印书馆，1983 年。

㉕清世宗敕编：《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 19 上。

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康熙遗诏》。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展览部馆员）



《五帝本纪》

黄帝“合符釜山”、“邑于涿鹿”

地望考实

葛英会

汉以来文献所载黄帝“合符釜山”、“邑于涿鹿”两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开端时期的重大事件。但是，由于年代湮远，有关这两件盛事发生地的认定，在各类文籍乃至民间传说中存在诸多歧见。唐代以前的几种注释，不过是大略指示两地所在的州郡，到唐宋以下，则异说纷出。关于涿鹿的位置，主要集中在涿鹿、涿州两地；关于釜山的位置，则主要有潘县历山与安肃釜山两说。见于文献者，涿鹿所在还有徐州彭城说，釜山所在还有东安安墟说。在乡野民间的传说中，合符釜山还有河北涑水、山西高平、河南灵宝等说法，由于文籍不载，又无实证可据，在此不予讨论。另外，“合符釜山”与“邑于涿鹿”两事均与“北逐荤粥”密不可分，在涿鹿、釜山所处方位的追索与辨析中，上古以来北方地区民族争搏与文化交流的历史遗痕，也不失为具有重要价值的参考资料。

黄帝“合符釜山”并“邑于涿鹿”，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相关内容十分简略，有关两地的确切位置，并无任何说明。只是说黄帝在“修德振兵”、“征师诸侯”，先后打败炎帝与蚩尤部落之后，巡狩四方，封禅祭祀山川鬼神，意在“合同万国”并抚慰黎庶。太史公记述相关史实，说黄帝曾东至海岱，西至崆峒，南至熊湘，尔后“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了了十几个字，透露的历史信息十分有限。汉唐及后世学者对数千年前涿鹿、釜山故地所在位置的推定，都是以司马氏的简略记述为出发点，但各家见解却不尽相同，可见其中问题相当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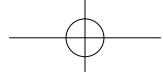
对黄帝“合符釜山”与“邑于涿鹿”的各种歧见，本小文拟在后文做出述评并提出个人的主张，敬祈学界同仁给予指正。

一、黄帝“邑于涿鹿”之南北歧议

在进入议题讨论之前，我们需要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即由中华初祖轩辕黄帝统领天下的五帝时代初期，下至《史记》成书的西汉前期，已经历了三个千纪的漫漫岁月，比《史记》成书以至于今的积年超出千年以上。太史公作《五帝本纪》也因岁月漫渺而为之叹喟，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之言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由此可见《史记》所述五帝史略，其所据除孔子所传《五帝德》、《帝系姓》等少量战国（或秦至汉初）典籍外，更多应是来自民间的“百家之言”。有关黄帝于“北逐荤粥”之后，于涿鹿故地营造都邑的说法，也应当视作司马氏个人的一种判定，而不是上古史地的实录。虽语焉不详，却为史书所首出，后世学者执有疑议，也属情理之中。

正是出于上述的原因，所以，在相关文献中，已知年代最早的对于涿鹿方位的推定，就出现了差异。见于六朝宋裴骃所作的《史记集解》，其录引东汉服虔的见解，谓“涿鹿，山名，在涿郡。”而其录引三国魏张晏的见解，则说：“涿鹿在上谷。”可见涿鹿所在方位的南北之争，在后汉至三国时期既已出现。唐初司马贞《史记索隐》则遵从太史公原意，谓：“班氏《地理志》上谷有涿鹿县，然则服虔云‘在涿郡’者，误也。”唐初及此前学者对于涿鹿故地的研判，不过大略指示其所在州郡而已。虽然班氏《地理志》已然把涿鹿隶于上谷郡地，其后学者却仍然秉持个人固有的见解，足以说明涿鹿故地所在方位的不确定性。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把涿鹿列于涿水流域，云：“涿水出涿鹿山，迳涿鹿县故城南，王莽所谓褫



北京史地

陆也。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而邑于涿鹿之阿，于是也。”此说与《五帝本纪》相比，对黄帝“邑于涿鹿”，在以下两点更加明确：1、地近涿水上源之涿鹿山；2、在汉涿鹿故城之南的高隆之地。至于涿鹿山与涿鹿之阿的相对位置，仍不甚了了。见于《魏土地记》，亦仅以汉下洛城来标示涿鹿故地的所在，云：“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及至唐初李泰作《括地志》，才从几个基点出发，对涿鹿故地所在方位，做出较为明确的说明。1、以怀戎县为基点，云：“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2、以妫州为基点，云：“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3、以涿鹿山为基点，云：“涿鹿山在妫州东南五十里，山侧有涿鹿城，即黄帝、尧、舜之都也。”

以上所述北魏以至唐初相关学者关于涿鹿故地的推定，大都是以汉上谷郡涿鹿县为着眼点进行的。在此以后以至清代的正史中，一直尊崇《史记》一书的权威性，墨守《五帝本纪》的记述，把汉代上谷涿鹿视为黄帝初邑之地，不敢有所逾越。其实，汉代于上谷郡置涿鹿县，不等于说汉代之前乃至上溯于上古时期，涿鹿故地一定就在这里。如隋之固安县乃战国燕方城故地，而汉之故（固）安县原在燕之舞阳故地。自唐代开始，另有一些学者，遵从东汉服虔的见解，主张古之涿鹿在汉之涿郡、唐之涿州。其不唯经典是从而求真求实的治学态度，实是令人感佩。

主张涿鹿故地在涿州的见解，既见于舆地类文献，也见于碑碣刻铭以及文人题咏等资料，相关记载有数十种之多，河北徐水釜山文化研究会已经进行初步的汇集与整理，此仅录年代较早者以示其例。唐人胡曾以《咏涿州》为题作七言绝句，诗文中却以“涿鹿”二字称述：“涿鹿茫茫白草秋，轩辕曾此破蚩尤。”《太平寰宇记》是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成书的舆地书籍，其对古涿鹿地望有明确说明：“涿州，古涿鹿之地，星分尾宿十六度。《史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即此地。”

在唐代以来的各类文献中，相关的记载还有不少，其中不乏关键性例证，兹选择数例补充于后。

明清两代，于京师或州县要冲之地设守备军队，称“卫”或“所”，明代涿州所置称涿鹿卫。《读史方舆纪要》载：“涿鹿卫在州治西北，永乐七年建；涿鹿左卫在州治西，永乐八年建；涿鹿中卫在左卫西，永乐十一年建。”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按曰：“涿鹿三卫设自明永乐年间，本朝（清朝）初年，以涿州三卫并良乡兴州卫，香河营州卫合为一卫，设守备一。至康熙二十八年悉行裁省。”

一些览胜怀古的诗文往往涉及往古名胜之地，其对古代史地的研究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明景泰才子刘溥《草窗集·赋得涿鹿邱伯纯作》：“平生爱访古，走马游四方。金台南去百余里，乃是涿鹿古战场……当时妖雾久销沉，空余易水东归海……”

明宣德进士周廷用《八厓集·涿鹿道中作》：“涿鹿云黄草树深，燕京风物昼阴阴。河山尚拥轩皇阵，台榭虚怜郭隗金……”

清乾隆御制诗《涿鹿览古》云：“燕云易水带晴川，涿鹿城南鞭客鞭。村指楼桑闻剩碣，河流挟活始通船。道元故宅询遗老，子干荒墟霭暮烟……”

以上节录三种诗文，其易水、挟活、燕京、金台、楼桑、道元故宅、子干荒墟皆是古代涿州的水道与人文名胜名称。易水在今易县及周边，挟活河在今房山县南境与涿州交界处。燕京为辽所置，在今北京城西南部。金台指燕昭王招贤台，楼桑、道元故宅、子干荒墟分别指蜀汉昭烈帝刘备、《水经注》作者北魏酈道元、东汉经学博士卢植的故里。这些览胜怀古的诗品，明白地表述了这样的认知：古涿州之地就是上古黄帝初建都邑的涿鹿故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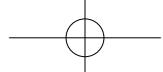
如果说古代文人览胜怀古的诗作与舆地著作不可等同看待，但诗文所涉历史名胜，则绝非子虚乌有的向壁虚构。其间虽少有历史地理方向、方位的具体标示，但景地所临水道、所在州郡的描述，应当可以信从。

另外，历代构筑并世代流传的人文名胜故地，多有碑碣刻铭遗存，记录下名胜创立与沿革的故实以垂示后人。碑铭所及的地理方位，应具有较高可信度。

据《吉金贞石志》，唐元和四年立、唐范阳节度使刘济撰《涿鹿山石经堂记》，称：“济（刘济）封内山川有涿鹿山石经者，始自北齐，至隋沙门静琬，睹层封云迹，因发愿造十二部石经，至国朝贞观五年，涅槃经成……”（据《日下旧闻考》录文节录）

另据《房山县志》，辽沙门志才《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曰：“有隋沙门静琬……于大业年中至涿鹿山，以大藏经刻于贞珉，藏诸山窞……”（据《日下旧闻考》录文节录）

上录涿鹿山石经堂记、涿鹿山石经塔记两方碑记，其所在即今房山县云居寺。云居寺的具体方位，《大清一统志》称“石经山在房山县西南五十里，本名白带山。”此白带山为房山境大防山支脉，由白带山云居寺向南不远的山前平地上，即涿州城所在。宋《太平寰宇记》称：“唐武德七年，改涿县为范阳。”又说：“白带山在范阳县北四十里。”即是



说涿鹿山位于涿州城以北四十里处。

两方碑记明确指称房山云居寺石经为涿鹿山石经，可见当年无论是达官还是沙门，以石经所在山峦即涿鹿山，是深信不疑的。由此可以验证东汉服虔“涿鹿，山名，在涿郡”的说法切近事实。西汉初年置涿鹿县于上谷郡，并由此造成黄帝初邑在上谷涿鹿的见解，当另有缘由。

黄帝初邑涿鹿、涿州之南北纷争，自东汉以来的近两千年中，历代学者秉持不同见解，迄今未能达至广泛认同的看法。本小文通过以上述评，笔者的主张倾向于后者。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后者除明确表达其结论性见解之外，对前者并未提出具有说服力的否定性依据。于此，我们认为，在这个历史疑案的研究中，必须获取新的理据与新的资料作为支撑，才有可能对破解谜团有所补益。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指出，有关黄帝初邑涿鹿一事出现的诸多歧见，都来自《五帝本纪》的同一个简单记述：邑于涿鹿之阿。正因为如此，我们以为，要厘清各家的歧议，就必须回到问题的原点，认真地追溯“涿鹿”之称的由来，检讨“涿鹿”一称的本字本义，在正本清源上做功夫。为此，下述拟从名称用字、文献求证以及考古资料三个方面作出考证，以期使这项研究获得新的突破。

涿鹿，是汉上谷郡的一个县名，涿是汉以来郡、州、县的名称，两称共用的一个涿字，《水经注》以为均与涿水有关，涿鹿为涿水之源，涿乃于涿水之滨营造的城邑。涿，是以水为形符，以豕为声符的形声字。见于舆地类记载，涿字首先应视作水道的名称，其用作郡、州、县的名称，应是因水道而起。涿字之下系以鹿字，学者或以为涿水上源的一个山名，我们则赞同涿鹿之鹿应是一个假借字，其本字应是大陆之陆。《说文解字》阜部：“陆，高平地也。”涿陆一称的原意应是涿水之滨的高平之地。涿鹿之鹿本字为陆，是古代学者已经持有的看法。《汉书·地理志》上谷郡涿鹿县下，班固自注曰：“莽曰拊陆。”《水经注》灤水条：“涿水……迳涿鹿县故城南，王莽所谓褊陆也。”清王绍兰《说文段注订补》云：“褊、拊皆误字，其字当作豨。”认为王莽所改应是豨陆。清音韵训诂大师钱大昕谓：“豨，当作涿字。”今按：陆与阿、陵古时意义十分接近，均指地势高平的大土丘，今之考古学者称作河滨台地，是古代先民营造都邑的首选之地。古代幽都也称作幽陵，就出于这层意思。由此，我们认为，《五帝本纪》所载“涿鹿”，本应写作涿陆，所谓“涿鹿之阿”应作“涿之阿”，而涿之阿与涿陆意义完全相同。

在此，笔者声明，做出上述判断，绝非是凭

空猜想，也不是主观臆断。因为我们惊奇地捕捉到下述文献资料。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水部涿字条下，说：“上谷有涿县”，而不说上谷有涿鹿县。清段（玉裁）注本《说文解字》方于涿字下增补“鹿”字。为此，段氏云：“鹿字，各本夺，今补。”此所谓“各本夺”，是说传世所见汉以来各种版本的《说文解字》，于此均不录“鹿”字。依许氏《说文解字》的条例，在涿字条目之下，其训解仅仅针对涿这个单个词字，根本不可能涉及到涿鹿这个与涿无关的另外一个地名。此所谓上谷，应是采用秦制。在秦代，涿县属上谷。学界一般以《汉志》为据，认为涿县为汉代所置，其实战国燕已置有涿县（详下）。《汉志》涿县在涿郡不在上谷，是常识问题，许慎及后世传习《说文》的学者，于此都称“上谷有涿县”，唯有段氏独具卓识，指摘其误夺鹿字，这种推断几乎不可能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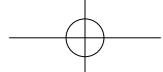
我们在此作这样的研判，是基于传世战国燕国古玺文字已经有涿县（图1）。该玺文有鲜明的古燕文字的地域性特征，其为古燕遗物已为学界所公认。此印文著录于清代吴式芬《双虞壶斋印存》、陈介祺《万印楼藏印》等多种印谱，现今通行的罗福颐《古玺汇编》也收录了这方玺印。印文四字：“豨都司徒”，豨即古涿字，是涿都执掌土地、户籍与教化民众官员的印玺。见于古燕官玺，“都司徒”之外，还有“都司马”、“都司工”玺，学界认为，燕官玺之“都”等同于县。可见涿县在战国时期已经存在。秦统一六国，行郡县制，涿县隶属于幽州上谷郡。汉高祖六年置涿郡，治所应即战国至秦的涿县故地，涿县遂为涿郡属县。《说文解字》涿字条下“上谷有涿县”之说，应该是以秦制为说的。



图1

至此，对持续近两千年的涿鹿故地南北之争，有必要再稍作回顾。两种歧见的关键在地分南北，即上谷与涿郡之辩。但南北两说却始终存在一个共同点，即将黄帝初邑之地称为涿鹿。就是本应该写作陆的鹿字，使这个千年之争成为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谜团。我们的结论是，涿鹿本作涿陆，涿陆与“涿之阿”同义，指涿水之滨的高亢之地，即故涿县、涿郡、涿州的所在。唐宋以来云居寺石经所在的涿鹿山，应称为涿山，易水、金台旧址之南的涿鹿之野宜称为涿之野。

涿鹿所在为徐州彭城说见《徐水、徐山与合符之釜山》一节。



二、釜山所在之潘县历山与安肃釜山说

《五帝本纪》所载黄帝与诸侯合符之釜山，其所在位置以及与涿鹿的相对方位，是唐初李泰《括地志》首先提出来的。据该书妫州怀戎县条载，“釜山在妫州怀戎县北三里，山上有舜庙。”又载：“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

今按，唐怀戎县即妫州的治所，可知李泰笔下的釜山与涿鹿故城的相对方位是西北、东南方向，间距约五十三里。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此说。

据笔者获知的资料，釜山故地在安肃（民国以后称徐水），是明代李东阳在《历代通鉴纂要》自注中提出的。李氏原文有关内容节录于下。

李东阳《历代通鉴纂要》卷一：“帝（黄帝）立制度，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制阵法，设旗麾，天下有不顺者，从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海，西至崆峒（今肃州），南至江，北逐薰鬻（今北虏），合符于釜山（今安肃县），邑于涿鹿之阿，

迁徙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

黄帝合符之釜山即安肃釜山，在清代得到广泛认同。

清嘉庆十三年《安肃县志》卷九载：“釜山符合，在县西四十五里，状似釜，黄帝朝诸侯合釜于此。”

清光绪七年《保定府志》卷十八载：“釜山在安肃县，黄帝朝诸侯合符于釜山，即此。”

釜山所在的安肃县，隋唐两代称遂城，隋以前称武遂，始于战国燕之武遂城。唐李泰《括地志》载：“易州遂城县，战国时武遂城也。”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十二《保定府》，于“安肃县”有釜山及周边环境的见闻：“釜山，县西四十五里，以形似名。西接黑山，东临峭壁，中有谷甚宏敞，初入曰釜阳口，内为釜山村。泉甘土肥，物产鲜美。黄帝朝诸侯，合符釜山，或以为即此山也。”

见于北魏酈道元《水经注》灤水条，于历代正史所主张的黄帝初造都邑的汉上谷涿鹿县左近，并无有关黄帝与诸侯合符釜山的记载。而远在涿鹿之南易水流域的古武遂、今徐水县地，酈氏所记，却有一座称作釜山的山峦，应即《历代通鉴纂要》自注黄帝合符釜山即安肃釜山所本。

酈氏的记载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其于灤水流域本无釜山的记录，但在一些学者的笔下却指鹿为马，在汉之潘县境编造出一个釜山来。易水流域分明有称作釜山的山峦，专治酈学的学者杨守敬与熊会贞合撰的《水经注疏》中却未提到明清学者即已提出的有关安肃釜山的看法，于此写为：此山无考。

于汉潘县境指为釜山的山峦原称历山。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录引《魏土地记》云：“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历山，山上有虞舜庙。”这座历山，在唐李泰《括地志》一书，已改称釜山，云：“釜山在妫州怀戎县北三里，山上有舜庙。”汉之潘县，北魏时已废止，从北齐至唐代，其县地一部分改置为怀戎县。由此可知，两种记载中“山上有舜庙”之山，无疑是指同一座山。到宋太平兴国年间成书的《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两书，又对《括地志》的釜山说做出进一步说明，云：“潘城西北三十里有历山，形似覆釜，故以名之，其下有舜祠。”于此，当代酈学专家段熙仲已经指出：“《御览》《寰宇记》均作‘历山’，与下文‘形似覆釜，因以名之’不相应。又《寰宇记》作‘三十里’，《御览》则作‘三里’。”其实，《御览》《寰宇记》两书之间或与《魏土地记》的矛盾之处还不仅于此，如虞舜庙所在又有山上、山下之分，且虞舜庙的所在，其无论是山上还是山下，毫无疑问都是祭祀舜帝之所。而釜山本是黄帝与诸侯合符的所在，其所建立者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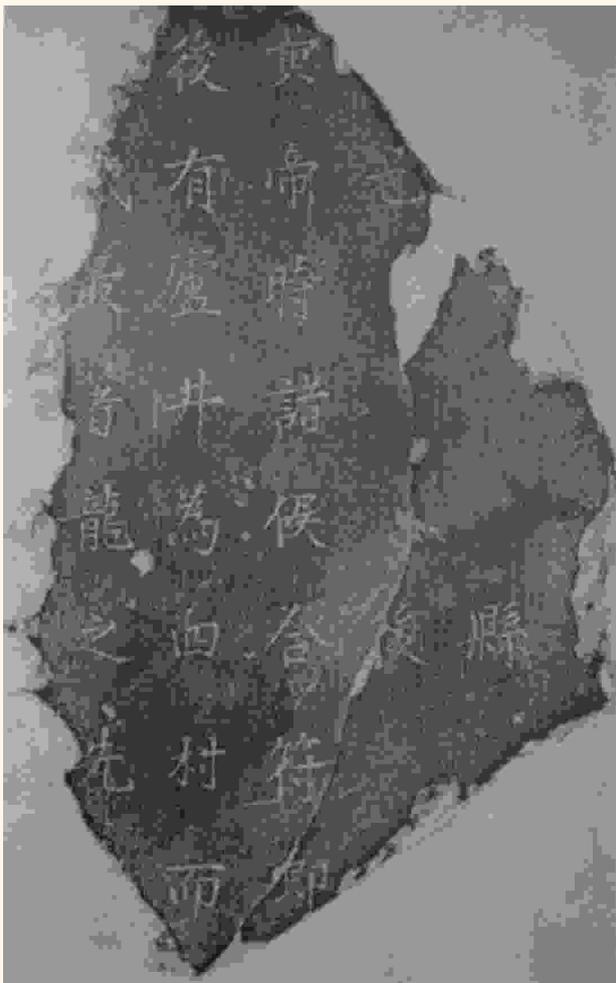


图2 合符残碑





是轩辕庙而不是虞舜庙。《括地志》《御览》《寰宇记》三书潘县历山即釜山之说，漏洞太多，显然不足凭信。

如本文在上一章节的讨论，黄帝战蚩尤、逐荤粥、初建都邑的涿鹿故地在汉涿郡涿县而不在汉上谷涿鹿，为黄帝合符之地即安肃釜山而不是潘县历山，在地域与方位上提供了支撑。安肃釜山见于《水经注》易水条，明李东阳《历代通鉴纂要》自注本于《水经注》相关记述，提出黄帝合符釜山即安肃之釜山，在学界已得到了广泛关注，民国年间一些郦学专家谓“此山无考”，不是事实。

《水经注》易水条云：“易水出涿郡故安县闫乡西山。易水出西山宽谷中……易水又东届关门城西南，即燕之长城门也，与樊石山水合。水源西出广昌县之樊石山，东流迳覆釜山下，东流注入易水。”此所谓易水，清戴震以为是北易水。此处的长城指西起安肃，经容城至文安的燕长城。此所谓“覆釜山”，位于北易水支流樊石山水旁之燕长城门左近、樊石山水与易水交汇的不远处。

《水经注》又云：“易水又东流，屈迳长城西，又东流，南迳武遂县南，新城县北……俗又谓是水为武遂津。津北对长城门，谓之汾门……亦谓之汾水门，又谓之梁门矣。”此所谓长城，亦谓燕长城，杨守敬谓“在今安肃县西北二十五里，地犹名长城口。”此所谓汾门、梁门，熊会贞云：“据《注》言梁门在武遂津北，则在安肃西。”今据上述郦氏所述，已很难指点相关水道的走向以及与釜山、遂城的相对方位。而燕长城遗迹虽至今犹存，但其汾门或梁门的所在却未能确指。不过我们起码可以明确这样一个事实，即古武遂与釜山都位于燕长城门左近，而三地皆在今徐水县城以西的徐水境内。《水经注》所记与今之徐水釜山与遂城镇的相对位置可以互证。

见于文献中，樊石山水与涑水（拒马河）皆出自汉广昌县（今涑源县），两条水道的上源都与樊石山相关，故二者在学者的笔下时有混淆。如前录《水经注》所载，流经釜山之侧的樊石山水，其“水源西出广昌县之樊石山。”于《析津志》一书则说：“涑水，出磐山福祿水。”据《辽书·地理志》称：“磐山县……有磐山，在今保安州东南一百二十里。”清



图3 徐水釜山山顶残碑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亦以磐山为涑水上源。民国熊会贞从杨守敬作《水经注疏》，认为《析津志》之磐山就是《水经注》之樊石山，涑水与樊石山水皆出此山中。但涑水东北流，即拒马河；樊石山水东南流，入易水。是同源一山而派分两水，不可混作一谈。

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一百二十六京畿东安县下录引《长安客话》云：“东安，古安墟，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合符釜山，即此。”清乾隆年间由于敏中等编纂的《日下旧闻考》，对这条记载既无增补，也无考证。不知《长安客话》所述的出典为何。或许安墟即是安肃之误，亦未可知。

二重证据法是今天从事古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与手段，即在纸上证据之外，还要以地下出土资料加以验证。徐水釜山文化研究会会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已在这两个方面作出努力，并在徐水釜山山顶古庙遗址的科学发掘中，在“始建年代应早于明晚期”古庙地基之下的乱石中，发现铭刻有“黄帝时诸侯合符即（此）”的残断石碑。从地层关系分析，此碑的年代应该属明代或更早。这块残碑出土于徐水釜山之巅的事实，为黄帝合符之地的研究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图2、图3）

三、徐水、徐山与合符之釜山

今徐水县，其名称始于民国，以县南有河道称徐水而得名。此河道称徐水，最早见于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山国北平县”下班氏自注，云：“徐水出北平（今满城）东至高阳入于博。”郦道元《水经注》把徐水河道列于滹水条，云：“（徐）水西



北京史地

出广昌县东南大岑下，世谓之广昌岑。”《注》文还记载了徐水河道两岸的文物古迹，所述甚详。唐初《括地志》易州永乐县（今满城）条亦有相关记述，谓：“易州永乐县有徐水。”至于此河道为什么称作徐水，则文献阙载。清《九域志》一书称：“安肃县有古徐城，周景王时大将徐峻所造。”民国间（1931年）商务印书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谓：“徐城在直隶徐水县东。”由上述两种记载的表述，可以认为：该河道称作徐水似与徐城有关，而徐城则因筑城人为徐姓而起。徐水县之称，原是由人名而城名，由城名而水名，再由水名而县名。徐水县于大金国一度称徐州，也应由徐城、徐水而起。今按：徐城建造人徐峻，为周景王大将。周景王在位为公元前544—520年，属春秋后期，于《春秋左氏传》一书，周景王在位相当于鲁襄公十九年至鲁昭公二十二年，其经文与传文中，皆不载徐峻造城事迹。

与黄帝合符釜山密切相关的涿鹿之阿，《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录引《舆地志》一个十分离奇的说法：“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这个说法无论与涿鹿故地南北两说的任何一种说法相较，都会有风马牛的感觉。

彭城，秦代所置县名，汉代称彭城郡，唐代为徐州彭城县，即今江苏徐州南面的铜山县。彭城之地，周代属徐州，汉代归青川，与远在北方的涿郡或说是上谷的涿鹿混淆起来，真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舆地志》何以将故涿鹿视作徐州彭城，笔者以为是把徐州之徐混同于徐城、徐水之徐。《隋书·地理志》载：“彭城有徐山。”商务印书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指称“徐山在江苏铜山县南七十里。”由此可见，徐山之徐与徐水、徐城之徐虽同称作徐，却不可混为一谈。徐水由来已如上述，彭城徐山的缘起，据《元和郡县志》所载：“徐偃王北走彭城武原东山之下，百姓归之，号曰徐山。”这就是说，徐州彭城之徐山，源自西周穆王时徐偃王北走彭城武原东山，《舆地志》不察，误把涿鹿故城所在，向东南方向推移了数千里之遥。当然，这个失误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事出有因，就是把徐山、徐水之徐弄混了，实不知其来源有徐峻、徐偃王之分。不过，这个失误恰恰反射了这样的史实，即黄帝“北逐荤粥”之役确与徐水地区密切相关，合符釜山并邑于涿鹿两事，应当就是在徐水釜山及左近的涿州发生的。

关于徐城，酈道元《水经注》在圣水条下云：“圣水自涿县东与桃水合，水首受涑水于徐城东南、良乡西，分垣水，世谓之南沙沟，即桃水也。”于拒马河下云：拒马河“即涑水也……东迳徐城北，桃垣二水出焉。”酈氏两注都说徐城的所在是在桃水

由涑水分衍而出之地。民国时杨守敬《水经注疏》谓：徐城“当在今涑水县北。”熊会贞亦于此按曰：“拒马河自涑水县北分流，东迳涿州北，古桃水之道也。”以上诸说均与《九域志》所载不同，其缘由需作进一步追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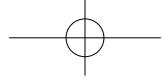
四、“荤粥”之族与“怀戎”“静戎”之称

今山西、河北的北部地区，为古冀州、幽州的属地，自古以来都是北方游牧民族经常侵扰出没的地方。黄帝“北逐荤粥”之荤粥，就是中原先民对北方游牧部族最早的称呼。《史记·五帝本纪》索隐曰：“荤粥，匈奴别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獯鬻，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汉曰匈奴。”汉以后，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地区建立多个政权的五胡，北宋以后先后入主中原的辽、金、元、清四朝之契丹、女真、蒙古族，均属北方戎族的后裔。塞内农耕民族在与北方游牧民族数千年的角逐、交往与融合中，沉积下许多与民族矛盾或民族和解相关的历史文化遗产，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

与本文讨论主题相关者，我们关注到北方地区曾经启用的多个称作“平戎”的地名。在宋代，保定一带曾置平戎军，也称保定军，寓意似是获取平戎之功，方能保定疆土。汉以来，中原政权对北方戎人除征战讨伐之外，也兼施以亲和怀柔政策。到唐代，在汉渔阳县地置怀柔县，就是出自这种缘故。于此类似，从北齐开始，《史记》所载黄帝初邑的涿鹿故地，就曾置县称怀戎，到辽统治北方时，才改称怀来县，元代又改为保安州。古代徐水地区也应处在汉人与戎人角逐、融合的地带，前述与徐水邻近的保定称作平戎即是佐证。两汉时期，徐水所属涿郡故（固）安县的称名，似乎也与当时的民族关系相关。到宋代，徐水地区先置静戎军，后设静戎县，不久又改称安肃军、安肃县，都与宋辽征战密切相关。大金以至清代，徐水县地除大金短期称作徐州外，均沿用安肃之名。安肃义为静，由静戎达至绥静演绎而成，与固安、保安、保定等名称，取义大体相同。

本节所述，意在从历史文化的角度，阐述徐水故地自古以来就处在汉戎先民长期角逐，不断交往，逐渐融合的地区，这对辨明五千年前黄帝在“北逐荤粥”之后，与众诸侯合符于安肃釜山，是有所助益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



从亦庄的考古发现 探亦庄的历史

张治强

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文中简称“亦庄”）位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东部发展带上，沿京津塘高速公路的城市五环路与六环路之间。京津塘高速公路、五环路、四环路、机场高速路等多条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和城市主干道以及城市轻轨，使亦庄开发区拥有联结各重要经济区域和交通枢纽的畅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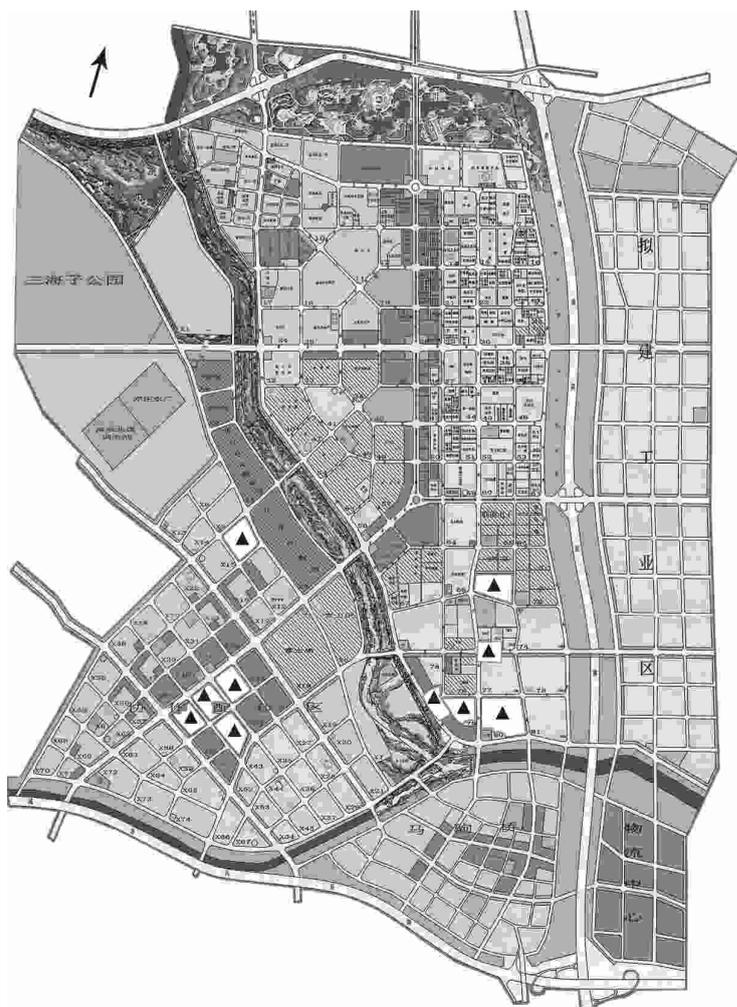
路以及多种交通方式。亦庄距离城市四环路 3.5 公里，距离三环路 7 公里，距市中心天安门广场 16.5 公里，距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25 公里，距铁路货运站 7 公里，距公路货运主枢纽 5 公里，距国际物流中心 1 公里，距天津新港 140 公里。

上世纪之前，亦庄地区因基本建设项目较少，地下文物的保护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社会对文物的重视，特别是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步伐的加快，施工中不断有文物发现，得到了开发区和市文物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常设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文物保护人员，对亦庄开发区建设工程进行巡视，事实证明在地下文物保护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自 2003 年以来，配合亦庄开发区工程建设抢救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为亦庄开发区的建设、亦庄的人文资源的保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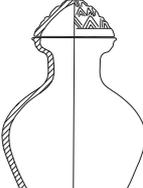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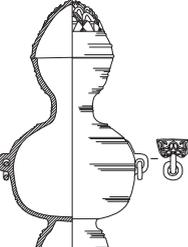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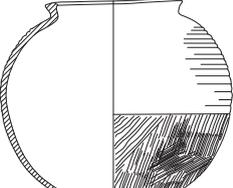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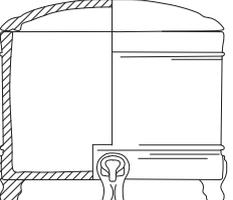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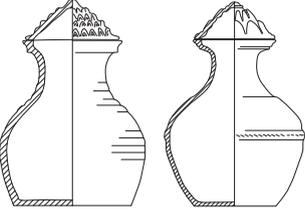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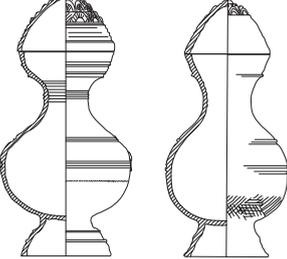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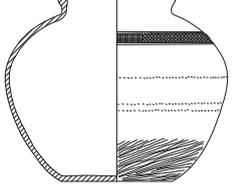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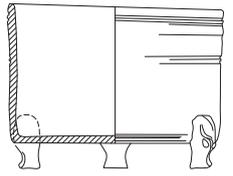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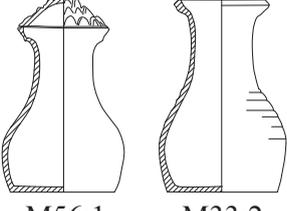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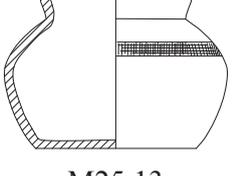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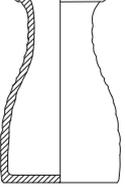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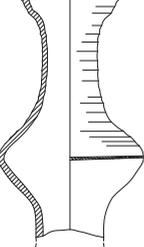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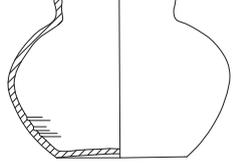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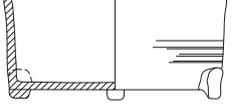
鉴于亦庄地区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对近年来配合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的考古发现有一个归纳总结。本文仅通过分析近几年亦庄地区发现的汉墓，对亦庄的历史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配合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考古发现

2003 年 10 月至 2004 年 4 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 79 号地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发掘墓葬 41 座，其中东汉墓 14 座，唐墓 7 座，清代墓 20 座^①。2003 年 11 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亦庄康定街发掘唐墓 2 座^②。2003 年 11 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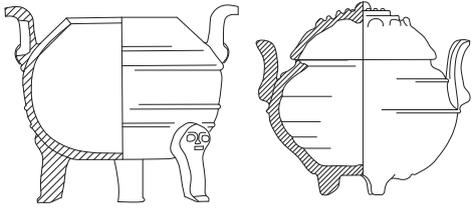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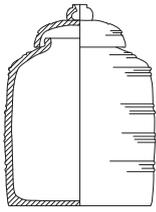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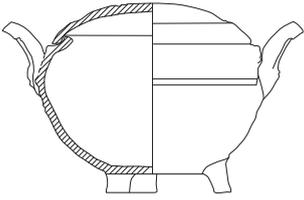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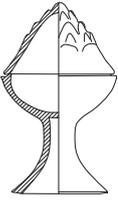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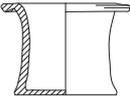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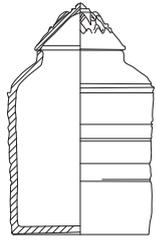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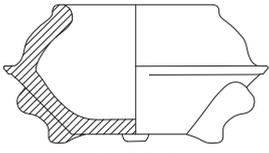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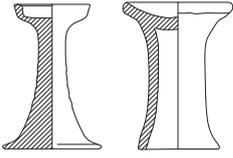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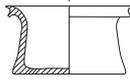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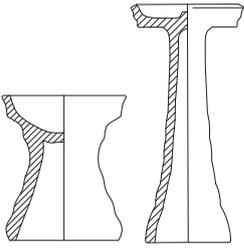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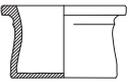
图一 亦庄开发区发现汉代遗迹位置示意图

期别	细颈壶	壶	鼓腹罐	尊
王莽至东汉初	 M15:7	 M15:23	 M15:35	 M15:1
东汉早期	 M17:4 M43:1	 M41:10 M55:2	 M19:1	 M19:7
东汉中期	 M56:1 M33:2		 M25:13	
东汉晚期以降	 M27:5	 M27:14	 M51:2	 M27:8

图二 亦庄X10号地汉墓陶器分期图

亦庄开发区西南环路发掘战国墓 1 座，汉墓 8 座，唐墓 1 座，明墓 3 座，清墓 1 座^⑤。2004 年 2 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亦庄开发区兴业街东段发掘汉墓 6 座，唐墓 1 座，窑址 1 座，井 1 眼^⑥。2004 年 4 至 6 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亦庄开发区东南 80 号地发掘 66 座古墓葬，其中汉墓 7 座，唐墓 20 座，辽墓 12 座，金墓 2 座，明墓 2 座，清墓 23 座^⑦。2004 年 5 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亦庄开发区东南 81 号地发掘古墓 8 座，其中辽墓 2 座，明墓 3 座，清墓

3 座^⑧。2004 年 6 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亦庄开发区 X42 号地发掘古墓葬 19 座，其中辽金墓 7 座，清墓 12 座^⑨。2004 年 6 至 7 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位于博兴路东侧由北到南的污水管线工程中，发掘古墓葬 7 座，其中东汉墓 6 座，辽墓 1 座，窑址 2 座，井 1 眼^⑩。2004 年 6 至 7 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新凤河路发掘古墓 15 座，其中东汉墓 14 座，唐墓 1 座，清理窑址 1 座，井 1 眼^⑪。2005 年 5 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亦庄开发区 69 号地发掘

鼎	灯	井	仓
 <p>M15:11 M14:2</p>			 <p>M15:30</p>
 <p>M41:6</p>	 <p>M55:4</p>	 <p>M17:8</p>	 <p>M41:1</p>
 <p>M25:1</p>	 <p>M25:15 M33:14</p>	 <p>M33:16</p>	
	 <p>M27:12 M26:4</p>	 <p>M27:3</p>	

古墓葬 31 座，其中唐墓 21 座，辽墓 10 座。2007 年 4 至 6 月，在大兴区亦庄开发区 X10 号地鹿圈镇发掘墓葬 64 座，其中汉墓 58 座，唐墓 6 座。发现西汉晚期水井 1 眼，汉代窑址 8 处，唐代窑址 2 处^①。2008 年 6 月，为配合大兴区亦庄镇博兴七路综合市政工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发掘清理了 4 座汉代砖室墓^②。2008 年 11 月，配合卡达克汽车检测技术中心工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西南部（东邻博兴路，西接博兴六路）发掘清理

汉墓 9 座^③。（图一）

二、不同地点汉代墓葬的分期

在亦庄地区汉代墓葬发现较多，且较集中分布，有必要对其进行一次分期梳理。汉代墓葬中又以 X10 号地为主，发现墓葬多，时代跨度大，从它的分期入手对其他地点的汉墓进行分期。

1. 亦庄 X10 号地汉墓分期

表一 亦庄 X10 号地汉墓形制与分期表

数量	类别	墓号	时代依据			时代			
			出土陶器	墓葬形制	铜钱	王莽至东汉初	东汉早期	东汉中期	东汉晚期以降
6	土坑墓	11	✓			✓			
		12	✓			✓			
		15	✓			✓			
		41	✓				✓		
		48	✓						✓
		57	✓				✓		
11	无墓道单砖室	6	✓				✓		
		8	✓			✓			
		9		※			※		
		10		※			※		
		13	✓				✓		
		14	✓			✓			
		16		※			※		
		22	✓				✓		
		31		※			※		
		37	✓						✓
		39	✓				✓		
13	有墓道单砖室	17	✓				✓		
		18	✓				✓		
		19	✓				✓		
		20	✓					✓	
		23	✓	※			※		
		25	✓					✓	
		26	✓						✓
		27	✓						✓
		29	✓						✓
		32		※					※
		33	✓					✓	
		36	✓	※			※		
		38		※					※

数量	类别	墓号	时代依据			时代			
			出土陶器	墓葬形制	铜钱	王莽至东汉初	东汉早期	东汉中期	东汉晚期以降
13	有墓道单砖室	40	✓					✓	
		42		※				※	
		43	✓				✓		
		47		※				※	
		49		※				※	
		50		※				※	
		51	✓				✓		
		52		※				※	
		54	✓		○		※		
		55	✓				✓		
		56	✓					✓	
		60		※				※	
		61	✓		○		※		
10	有墓道双砖室	7		※					※
		24		※					※
		30		※					※
		34		※					※
		46		※					※
		53	✓						✓
		58		※					※
		62	✓						✓
		63		※					※
		64	✓						✓
5	有墓道多砖室	28		※					※
		35		※					※
		44		※					※
		45		※					※
		59	✓						✓

注：“✓”代表依据陶器分期；“※”代表依据墓葬形制分期；“○”代表依据铜钱分期。

表二 亦庄地区 2003—2005 发掘汉墓分期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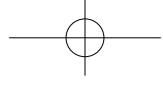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类别	地点	墓号	时代依据			时代				
			出土器物	墓葬形制	铜钱	王莽至东汉初	东汉早期	东汉中期	东汉晚期以降	
土坑墓	79号地	M23		※			※			
单砖室	79号地	M11	✓	※			✓			
	兴业街	M1		※			※			
		M3		※			※			
		M4		※			※			
		M5		※			※			
		M6		※			※			
	西环南路	M2		※			※			
		M3		※			※			
		M5		※			※			
		M8		※			※			
		M9		※			※			
	80号地	M10		※			※			
		M8		※			※			
	博兴路	M5		※			※			
	带墓道单砖室	79号地	M2		※				※	
			M8		※				※	
			M38	✓						✓
			M39	✓	※					※
		80号地	M73	✓						✓
			M76	✓						✓
M77			✓						✓	
42号地		M9		※				※		
博兴路		M2	✓						✓	
		M3	✓					✓		
		M4		※					※	
		M7	✓						✓	
新风河路		M6		※					※	
	M14		※					※		
带墓道双砖室	79号地	M3	✓					✓		

类别	地点	墓号	时代依据			时代			
			出土器物	墓葬形制	铜钱	王莽至东汉初	东汉早期	东汉中期	东汉晚期以降
带墓道双砖室	79号地	M5		※					※
	西环南路	M11		※					※
	80号地	M72		※					※
		M75	✓						✓
	新风河路	M7	✓						✓
		M12		※					※
带墓道多砖室	79号地	M6		※					※
		M7	✓	※					※
		M10		※					※
		M34		※					※
		M37	✓	※					※
	80号地	M74	✓	※					✓
		M78		※					※
	博兴路	M6		※					※
	新风河路	M1	✓	※					✓
		M2	✓	※					✓
		M3		※					※
		M4		※					※
		M5	✓	※					✓
M8			※					※	
M9			※					※	
M10		※					※		
M11		※					※		
M13		※					※		

注：无墓道砖室墓无代表器物，暂归东汉早期。带墓道单室墓无代表器物，暂归东汉时期。带墓道双室墓和多室墓无代表器物，暂归东汉晚期。“✓”代表依据陶器分期；“※”代表依据墓葬形制分期。

亦庄 X10 号地汉墓共 58 座，有出土器物的 47 座，出土器物中时代特征较明确，贯穿于早晚的有细颈壶、鼓腹罐、鼎、尊等陶器。依据主要时代特征器物，我们将亦庄 X10 号地汉代墓葬分为四期：第一期为王莽至东汉初；第二期为东汉早期；第三期为东汉中期；第四期为东汉晚期（图二）。

(1) 王莽至东汉初：最能代表这一期的陶器有：



北京史地

细颈壶 M15:7、壶 M15:23、鼓腹罐 M15:35、尊 M15:1、鼎 M15:11 和 M14:2、仓 M15:30 (图二)。据此,这一期的暂有:M14、M15。

考察汉墓中所出陶器:陶壶 M11:1 (见《北京亦庄 X10 号地考古报告》,以下简称《X10 号地》,图一四,1) 形制同于 M15:23 (图二),鼓腹罐 M11:20 (《X10 号地》,图一四,4) 形制同于 M15:35 (图二),鼎 M11:14 (《X10 号地》,图一四,6) 同于 M15:1 (图二),仓 M11:2 (《X10 号地》,图一四,7) 同于 M15:30 (图二)。尊 M12:4 (《X10 号地》,图一六,4) 形制同于 M15:1 (图二),仓盖 M12:9 (《X10 号地》,图一六,10) 形制同于 M15 出土仓盖 (图二)。鼎 M8:1 (《X10 号地》,图三二,1) 形制同于 M14:2 (图二)。据上,M8、M11、M12 等时代为王莽至东汉初。

(2) 东汉早期的代表陶器有:细颈壶 M17:4 和 M43:1,壶颈较 M15:7 长 (图二);壶 M41:10 和 M55:2,球形腹最大径较 M15:23 下移 (图二);鼓腹罐 M19:1 口较 M15:35 侈直,下腹绳纹渐少 (图二);尊 M19:7 腹较 M15:1 浅 (图二);M41:6 较 M15:11 腹深,足较简化 (图二);仓 M41:1 较 M15:30 (图二) 形体小,腹壁更直。据此,这一期的暂有:M17、M19、M41、M43、M55。

参照以上标准器,考察汉墓中出土陶器:细颈壶 M6:2 (《X10 号地》,图二九,2),敞口,束颈,溜肩,形制同于 M43:1 (图二)。细颈壶 M13:1 (《X10 号地》,图三六) 形制同于 M17:4 (图二)。细颈壶 M18:1 (《X10 号地》,图五二,1) 形制同于 M17:4 (图一三九)。井 M22:1 (《X10 号地》,图四一) 同于 M17:8 (图二)。鼓腹罐 M39:1 (《X10 号地》,图四七,1),口微侈,肩颈之间压一圈网格纹,腹下部压印绳纹,形制同于 M19:1 (图二)。细颈壶 M57:3 (《X10 号地》,图二三,2),束颈,溜肩,形制同于 M17:4 (图二)。据上,M6、M13、M18、M22、M39、M57 等时代为东汉早期。

M54 和 M61 墓葬形制同于 M55,均只出土大泉五十钱币,时代暂定为东汉早期 (表一)。

据表一统计,无墓道单砖室墓最晚时代为东汉早期。M9、M10、M16、M31 这 4 座墓,无随葬品或随葬品时代特征不明,依据其墓葬形制暂定为东汉早期。

(3) 东汉中期代表陶器有:细颈壶 M56:1 和 M33:2,颈较 M17:4 更长、直,体形变瘦 (图二);鼓腹罐腹部最大径较 M19:1 (图二) 下移,腹部绳纹不见;鼎 M25:1 (图二) 耳消失,足等弱化;细柄灯 M25:15 (图二),制作较精,浅盘,喇叭柄;

井 M33:16 (图一三九),曲腹盘柄较 M55:4 (图二) 粗。据此,这一期的暂有:M25、M33、M56。

参照以上标准器,考察汉墓中出土陶器:奩 M20:4 (《X10 号地》,图五六,5),其腹深介于 M19:7 (图二) 和 M27:8 (图二) 之间。M40:2 (《X10 号地》,图七七,1) 博山盖,这批汉墓东汉晚期未见博山器,时代暂定东汉中期。据上,M20、M40 等时代为东汉中期。

M23 和 M36 出耳珰,墓葬形制同于 M17、M18 和 M19,其中最晚的 M19 为东汉中期,故 M23 和 M36 暂定为东汉中期。

(4) 东汉晚期代表陶器有:灯 M26:4 较 M33:14,盘更浅,柄更细直 (图二);细颈壶 M27:5 较 M33:2 颈更长,形体更瘦 (图二);M27:14 (图二) 变为喇叭口,球形腹下移变为折腹;尊 M27:8 较 M19:7 腹更浅,器足弱化 (图二);粗柄灯 M27:12 较 M33:14 更矮胖,制作较粗糙 (图二);井 M27:3 较 M33:16 口更大,腹浅 (图二);M51:2 较 M25:13,口更直,最大腹径下移,素面 (图二)。据此,这一期的暂有:M26、M27、M51。

参照以上标准器,考察汉墓中出土陶器:灯 M29:7 (《X10 号地》,图六六,6),敞口弧壁,深腹,形制同于 M27:12 (图二)。细颈壶 M34:8 (《X10 号地》,图一〇三,1) 形制同于 M27:5 (图一三九),尊 M34:4 (《X10 号地》,图一〇三,2) 形制同于 M27:8 (图二)。灯 M53:1 (《X10 号地》,图一〇七,1) 制作更粗糙,形制近于 M26:4 (图二),但柄更细直;尊 M53:3 (《X10 号地》,图一〇七,6) 腹较 M27:8 (图二) 更浅,暂定东汉晚期或较晚。鼓腹罐 M62:1 (《X10 号地》,图一一一,1) 形制同于 M51:2 (图二)。灯 M64:12 (《X10 号地》,图一一四,6),曲腹盘,形制同于 M27:12 (图二)。井 M28:1 (《X10 号地》,图一一七,4) 形制同于 M27:3 (图一三九)。壶 M59:4 (图一二二,6) 腹最大径较 M27:14 (图二) 下移;灯 M59:8 (《X10 号地》,图一二二,4) 较 M26:4 (图二) 更细直,时代应晚于东汉晚期,暂定东汉晚期。据上,M28、M29、M34、M53、M59、M62、M64 时代为东汉晚期。

据表一,本次发掘的有墓道双砖室墓和有墓道多砖室墓,从出土器物判断,均为东汉晚期以降。因此,我们将有墓道双砖室墓 M7、M24、M30、M34、M46、M58、M63 和有墓道多砖室墓 M28、M35、M44、M45 时代暂定为东汉晚期。

此外,M37 出土 1 件夹砂红陶双耳罐,为东汉晚期特征,M37 暂定为东汉晚期。M48 出土铜镜为七连

弧形圆带纹镜，河南陕县东汉后期墓曾有出土^⑨。该墓还出剪轮五铢。M48 时代暂定为东汉晚期。

(5) 时代不明墓：据表一统计，无墓道单砖室墓最晚时代为东汉早期。M9、M10、M16、M31 这 4 座墓，无随葬品或随葬品时代特征不明，依据其墓葬形制暂定为东汉早期。据表一统计，M32、M38、M42、M47、M49、M50、M52、M60 这 8 座墓葬，均为单墓道单砖室墓，无出土文物可对比，这一形制的墓葬时代可证者为东汉早期以后。因此，暂将它们定为东汉时期。

综上，王莽至东汉初墓有 M8、M11、M12、M14、M15，共 5 座。东汉早期墓有 M6、M9、M10、M13、M16、M17、M18、M19、M22、M31、M39、M41、M43、M54、M55、M57、M61，共 17 座。东汉中期的墓有 M20、M23、M25、M33、M36、M40、M56，共 7 座。东汉晚期的墓有 M7、M24、M26、M27、M28、M29、M30、M34、M35、M37、M44、M45、M46、M48、M51、M53、M58、M59、M62、M63、M64，共 21 座。时代不能确定，可定在东汉时期的有 M32、M38、M42、M47、M49、M50、M52、M60，共 8 座。

2、亦庄 79 号地

亦庄 79 号地发掘东汉墓 14 座。其中 M23 和 M24 为竖穴土坑墓；单室砖墓 M11；带墓道单砖墓 M2、M8、M38、M39；带墓道双室砖墓 M3、M5、M37；带墓道多室砖墓 M6、M7、M10、M34。

M23 和 M24 为竖穴土坑墓，无明确时代文物，依据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表一），暂定东汉早期。

M11，无墓道单室砖墓，壶 M11:1（图三（1））形制同于 X10 号地 M43:1（图二）。结合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表一），时代应为东汉早期。

M3，横向双室墓，出土方形陶灶，M3:1（图三（2）），模制。灶面上印有各类厨具模样，时代应为东汉晚期。陶奩 M3:5（图三（2）），口较敛，器足更为简化。对比 X10 号地汉墓分期图（图二）和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表一），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为东汉晚期。

M2，带墓道单室墓，没有代表时代的器物，对比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表一）暂定为东汉时期。

M8，带墓道单室墓，没有判定时代的出土器物，参照亦庄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表一），暂定为东汉时期。

M38，带墓道单室砖墓，出土奩（M38:4《03—05 报告》^⑩第 48 页，图四六，1），无足，平底，形制为东汉晚期。结合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表一），时代为东汉晚期。

M39，带甬道单室砖墓，出土剪轮五铢，结合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表一），暂定为东汉晚期。

M5，带墓道前后室双室墓，参照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表一），暂定为东汉晚期。

M6、M10，带墓道多室墓，参照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表一），暂定为东汉晚期。

M7，带墓道多室墓，壶（M7:2 和 M7:4，《03—05 报告》第 29 页，图二八，1—2），盘口，细长颈，高圈足，形制要晚于 X10 号地 M27:14（图二）。因此，从墓葬形制和器物判断应在东汉晚期或更晚。

M34，带墓道多室砖墓，出土器物总体特征为东汉晚期中期，结合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表一），时代为东汉晚期。

M37，带墓道双室砖墓，奩（M37:5《03—05 报告》第 45 页，图四四，5），无足，底下凸，形制为东汉晚期。结合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表一），时代为东汉晚期。

据上，79 号地汉墓分期如下：东汉早期有 M11、M23、M24（表二）；东汉晚期有 M3、M5、M6、M7、M10、M34、M37、M38、M39 等（表二）；东汉时期有 M2 和 M8（表二）。

3、兴业街汉墓

M1、M2、M3、M4、M5、M6 均已被破坏，从残存平面判断，为无墓道单室砖墓。参照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表一），暂定为东汉早期以前（表二）。

4、西南环路

M2、M3、M5、M8、M9、M10 破坏严重或无随葬品，从平面形制判断基本为竖穴土坑或无墓道单砖室，参照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表一），暂定东汉早期以前。M11 带墓道双室墓，参照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表一），有带菱形格和圆环突点型铺地砖，时代为东汉晚期（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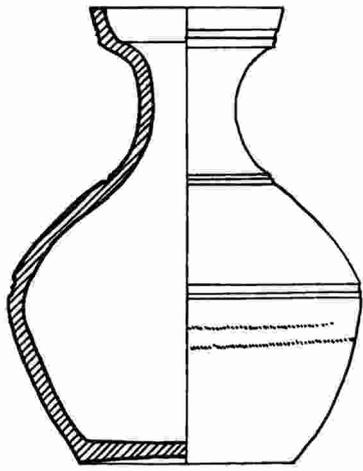
5、80 号地汉墓

M72，带墓道双室墓，参照 X10 号地分期表（表一），时代为东汉晚期。

M73，带墓道单室墓，但墓道和墓室之间有砖券甬道，出土陶罐 M73:2（图四），形制同于 X10 号地 M51:2（图二）。据此，该墓时代定为东汉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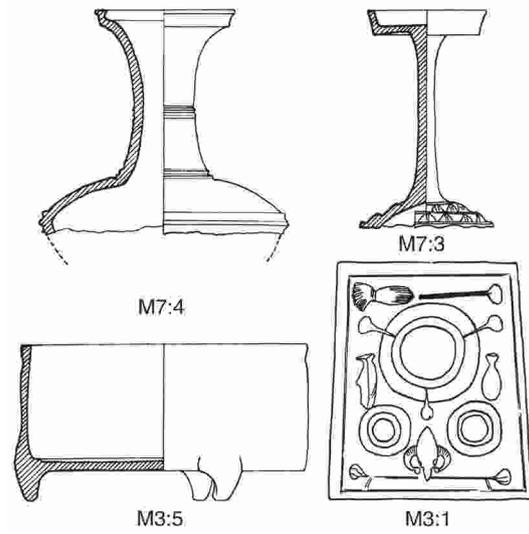
M74，带墓道多室墓，出土壶 M74:6（图四），形制同于 M27:14（图二）。灯 M74:5（图四），形制较 X10 号地 M26:4（图二）相比，灯柄更细直，显示出时代更晚的特征。据此，M72 定为东汉晚期。

M75，带墓道双室墓，出土壶（M75:4，《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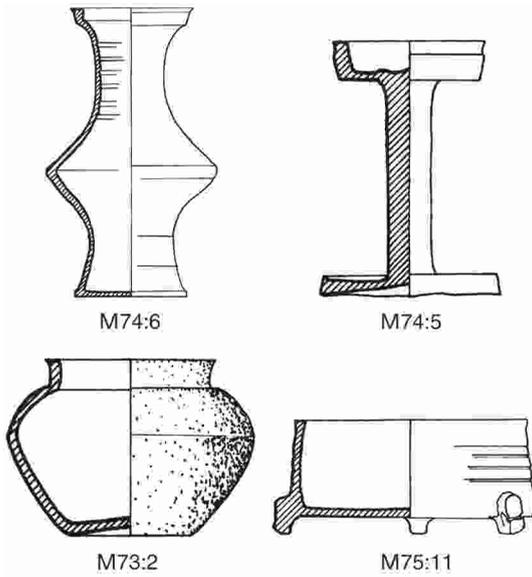


M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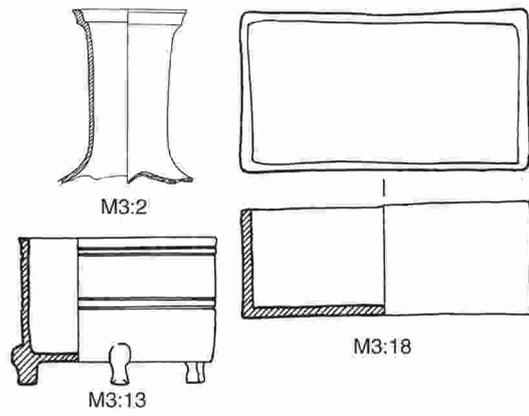
图三 (1) 79号地东汉早期陶器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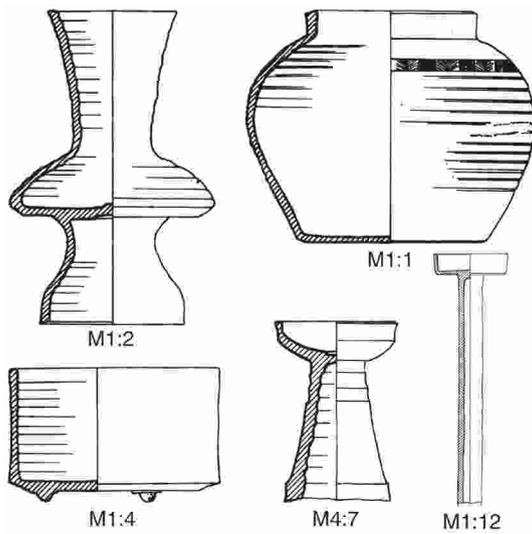
图三 (2) 79号地东汉晚期陶器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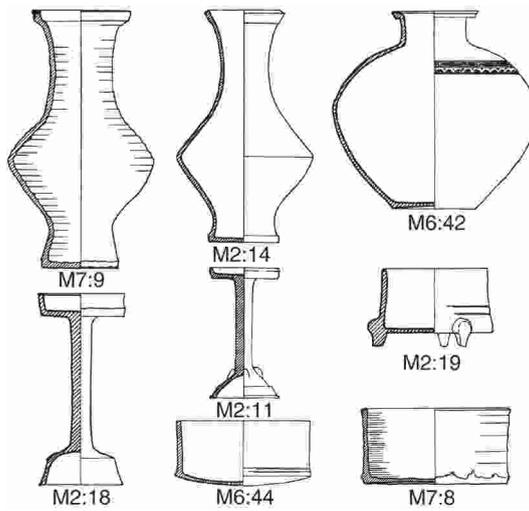
图四 80号地东汉晚期陶器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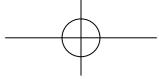
图五 (1) 博兴路东汉中期陶器举例



图六 新凤河路东汉晚期陶器举例



图五 (2) 博兴路东汉晚期陶器举例



05 报告》第 74 页，图七九，4) 腹下垂，最大径较 X10 号地 M27: 14 (图二) 更下移。井 (M75: 3, 《03-05 报告》第 74 页，图七九，2) 形制基本同于 X10 号地 M27: 3 (图二)。据此，M75 时代为东汉晚期。

M76, 带墓道单砖室墓，出土器物多不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罐 (M76: 12, 《03-05 报告》第 78 页，图八二，9)，折腹较明显，为东汉晚期壶、罐等器腹特征。据此，将 M76 暂定为东汉晚期。

M77, 带墓道单砖室墓，出土器物有陶鸡、俑等。参照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 (表一)，暂将其定为东汉中期以后。

M78, 带墓道多室砖墓，参照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 (表一)，依据形制其时代定为东汉晚期。

据上，80 号地汉墓全部为东汉晚中期 (表二)。

6、42 号地汉墓

M9, 带墓道单砖室墓，依据形制，参照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 (表一)，时代为东汉 (表二)。

7、博兴路汉墓

M5, 无墓道单室砖墓，无随葬品，参照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 (表一)，时代暂定东汉早期。

M3, 带墓道单室砖墓，出土壶 M3: 2 (图五 (1)) 残，直颈，盘口，形制同于 X10 号地 M33: 2 (图二)；奩 M3: 13 (图五 (1))，直口，深腹，形制介于 X10 号地 M19: 7 (图二) 和 M27: 8 (图二) 之间。据此，将 M3 时代定为东汉中期。

M2, 带墓道单室砖墓，出土壶 M2: 12 (《03-05 报告》第 87 页，图九〇，3-4) 和 M2: 14 (图五 (2)) 形制同于 X10 号地 M27: 14 (图二)，参照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 (表一)，时代定为东汉晚期。

M7, 带墓道单室墓，壶 M7: 9 (图五 (2))，形制同于 X10 号地 M27: 14 (图二)。奩 M7: 8 (图五 (2)) 与 X10 号地 M27: 8 (图二) 相比，足消失，时代更晚。据此，M7 时代为东汉晚期或更晚。

M4, 带墓道单室砖墓，无随葬品，参照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 (表一)，时代暂定东汉。

M6, 带墓道多室砖墓，壶 M6: 23 (《03-05 报告》第 100 页，图一〇一，4) 形制基本为东汉晚期。奩有敛口平底和凸底的，显示出时代更晚特征。参照 X10 号地墓葬分期表 (表一)，该墓年代为东汉晚期。

据上，博兴路汉墓分期如下：东汉早期墓有 M5 (表二)；东汉中期墓有 M3 (表二)；东汉晚期墓有 M2、M6、M7 (表二)；M4 暂定为东汉时期 (表二)。

8、新风河路汉墓

M1, 带墓道多室墓，壶 M1: 2 (图六)，形制较 X10 号地 M27: 14 (图二) 时代更晚。瓮 M1: 1 (图六) 与 X10 号地 M25: 13 (图二) 比较，口更直，形体基本同于 X10 号地 M51: 2 (图二)。据此，结合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 (表一)，M1 时代定为东汉晚期。

M2, 带墓道多室砖墓，罐 M2: 3 (《03-05 报告》第 116 页，图一一四，1)，折肩，风格同于东汉晚期壶。参照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 (表一)，时代暂定为东汉晚期。

M3, 带墓道多室砖墓，无随葬品。参照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 (表一)，时代暂定为东汉晚期。

M4, 带墓道单室砖墓，灯 M4: 7 (图六) 形制同于 X10 号地 M27: 12 (图二)。陶灶 M4: 9 (《03-05 报告》第 120 页，图一一七)，模制，灶面压印厨具，为东汉晚中期特征。M4 时代暂定东汉晚期。

M5, 带墓道多室砖墓，出土陶狗 M5: 2 (《03-05 报告》第 123 页，图一二〇) 为东汉晚期墓中常见^⑥。结合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 (表一)，该墓时代定为东汉晚期。

M6, 带墓道单室砖墓，无出土器物，参照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 (表一)，暂定东汉。

M7, 带墓道双室砖墓，奩 M7: 16 (《03-05 报告》第 126 页，图一二三，2) 浅腹，凸底，时代晚于 X10 号地 M27: 8 (图二)。结合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 (表一)，该墓时代为东汉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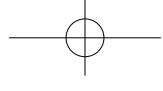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M8、M9、M10、M11、M13 为带墓道多室砖墓，M12 为带墓道双室砖墓，无可比出土器物，参照 X10 号地汉墓分期表 (表一)，时代定为东汉晚期；M14 为带墓道单室砖墓，无可比出土器物，参照 10 号地汉墓分期表 (表一)，时代定为东汉。

据上，新风河路汉墓分期如下：M1-M5、M7-M13 为东汉晚期 (表二)；M6 和 M14 暂定为东汉 (表二)。

三、考古证据反映的亦庄

1、亦庄的历史

目前考古发现亦庄最早的遗迹为 79 号地发现的一座战国墓，以后汉、唐、辽、金、明、清时代的遗迹皆有发现。至少证明在战国时期亦庄地区就有人类活动，X10 号地发现西汉晚期水井，证明西汉晚期亦庄地区已有定居人口。大量的王莽以后墓葬的发现，特别是东汉时期大量墓葬的发现，表明东汉时期这一带人口相对较多，经济较为发达。从



北京史地

目前的考古资料证明亦庄的历史主要从此开始,或者说大规模的人类活动从此开始。考古发掘表明,亦庄地区东汉特别是东汉晚期有可能存在较大的居住地,与墓葬同时期的遗存(如水井、村落、城址、窑址等)需要我们在以后的考古工作中加以重视和研究。

唐、辽、金墓葬的发现是汉以来经济和人口发展的延续,但从墓葬的数量分析,唐、辽、金时代亦庄地区人口较东汉时期减少。

2、亦庄地区汉墓葬的特点和葬俗

通过对已发表的亦庄地区的汉墓资料分析,从王莽朝到东汉晚期,亦庄地区汉墓的演变和葬俗可窥一斑。从墓葬形制观察,这一地区王莽至东汉初期主要流行竖穴土坑墓,少量无墓道单室砖墓;东汉早期流行无墓道单室砖墓和小型的带墓道单室砖墓;东汉中期流行带墓道单室砖墓;东汉晚期流行带墓道双室墓和带墓道多室墓。从器物类型演变观察,王莽到东汉初,陶器形体较大,制作较精,陶器组合以鼎、壶、罐、仓(圆形)为主;东汉早期陶器形体变小,制作相对粗糙,组合保留鼎、壶、罐、仓外,出现了灶等,鼎等器物器足简化,体形渐小;东汉中期,陶器器类增加,大量流行博山盖,鼎基本不见,或以其它三足器的形式出现。圆形仓不见,陶俑和动物俑出现。东汉晚期,陶器类型更加复杂,生活中使用的生活用品都以明器的形式出现。鼎不见,博山盖器物基本不见。

3、亦庄地区汉以后的气候

亦庄是大兴地区平原的一部分,大兴地区也属永定河冲积平原的一部分,总的特征是地势平坦,呈西北高东南低的微倾状,平均坡降 1/250。大兴地区按成因分类为老洪冲积平原^①,主要由古漂水洪积而成,分布在大兴县政府北部,即现在的亦庄、旧宫、万聚庄等地。

汉代气候相对干燥,冲积地带适合于人类居住和耕作,亦庄这一相对较低的地区开始人口增长,环境改善,居民始由平原较高处向低地迁移。^②据亦庄 X10 号地发掘地层观察,汉唐墓之上淤积沙土层约 1.5 米以上。亦庄 X10 号地紧邻凉水河^③,考古发掘观察,亦庄 X10 号地没有发现河道迹象,墓葬又能集中下葬,证明在汉、唐之际本地河流尚未发生大的洪灾,河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间段。墓葬之上堆积的淤沙,反映了元以来本地水灾不断,河流泛滥的事实。元代永定河(时称浑河)在宛平县看丹口分为两支,均过境大兴,大致与今大兴境内龙河、凉水河流量相当。浑河进入大兴后河道坡度

骤减,流速减缓,泥沙大量淤积。地表原始形态保存为褐色土、灰黄土,地势较为平坦。史载元代大兴水灾 36 次;明代 40 次,较大水灾 7 次;民国时期 12 次,较严重的 5 次;新中国成立后永定河大兴段决口两次。亦庄地区复成为水洼之地从考古层位证据主要是金元时期及以后。

①②③《北京亦庄考古发掘报告》(2003—2005 年)第 5 页,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

④《北京亦庄考古发掘报告》(2003—2005 年)第 6 页,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

⑤《北京亦庄考古发掘报告》(2003—2005 年)第 7 页。

⑥《北京亦庄考古发掘报告》(2003—2005 年)第 8 页。

⑦《北京亦庄考古发掘报告》(2003—2005 年)第 9 页。

⑧《北京亦庄考古发掘报告》(2003—2005 年)第 10 页。

⑨《北京亦庄考古发掘报告》(2003—2005 年)第 11 页。

⑩张治强:《近两年北京地区汉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汉代文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 160 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年。

⑪⑫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2008 年工作总结》。

⑬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亦庄 X10 号地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 年待刊。

⑭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第 374 页,文物出版社,1992 年。

⑮《03—05 报告》指“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亦庄考古发掘报告》(2003—2005 年),科学出版社,200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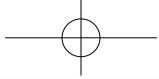
⑯《03—05 报告》中多处墓已经本文分析为东汉晚期的墓中多出现此类陶狗。

⑰大兴县志编纂委员会:《大兴县志》第 94 页,北京出版社,2002 年 9 月第 1 版。

⑱“汉代北京进入冷冰期,永定河自卢沟桥以北向东,经今凉水河往东南流。”(王伟杰:《第四纪冰期后气候变迁与北京平原永定河的流向》,《北京史论文集》(二),北京史研究会出版,1982 年。)

⑲凉水河是北京地区的一条河流,为北运河的支流。发源于丰台区后泥洼村,先后流经丰台区、大兴县、通县,在榆林庄闸上游汇入北运河。全长 58 公里,流域面积 6297 平方公里。其支流有草桥河、马草河、马草沟、大羊坊沟、萧太后河。目前河道上建有 4 座拦河闸:大红门闸、马驹桥闸、新河闸和张家湾闸。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门头沟区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

顾大勇

1958年到2005年，门头沟涉及本区内明长城的调查一共有10次，但仅限于初级阶段；2006年底开始迄今为止的门头沟区明长城普查范围涉及门头沟区3镇15村。

门头沟地区现存的长城主要分布在东经 $115^{\circ}53'49.20''$ 、北纬 $40^{\circ}08'03.78''$ 与东经 $115^{\circ}26'20.20''$ 、北纬 $39^{\circ}57'43.3''$ 的地域空间之内。西北边为雁翅镇房良村、大村、马套村一线；西南边为清水镇洪水口村、小龙门村、燕家台村一线；中间以斋堂镇柏峪村黄草梁、天津关、沿河口、沿河

城、东岭为一线，三条线隐约相关联，“沿”字编号敌台15座，未编号敌台2座，墙体10段。明长城墙体约长4289米。相关附属物有斋堂城东城门、沿河城2个城阜和2个烽火台、6段挡马墙以及5个砖瓦窑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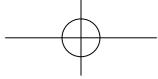
门头沟区明长城遗存的修筑年代大抵是隆庆至万历年间。因此，它的结构特征深受蓟镇戚继光修筑长城模式的影响。

现存长城墙体的结构特点：城墙断面下大上小呈梯形，为块石干垒，墙芯为碎石和土填心，垛口，女墙多无存。现存长城敌台的结构特点为环形筒拱四柱式（三眼或四眼）空心敌台，“沿”字十号敌台为三眼敌台，其余均为四眼敌台。平面大多呈正方形。敌台基座四周底部刨槽夯实，用长方形条石抹白灰泥找平，然后垒砌青砖，青砖表面抹白灰泥错缝平砌，从下至上按比例收分，从侧面看形成梯形，上窄下宽。四墙中部填充碎石块和山皮土夯实，形成基座平面。基座平面均用三、四层青砖平墁，最后一层用方砖砌面，四周砖墙继续上垒形成中部空间，连接墙体的墙面各设有一门，两个箭窗，两门均与城墙相通。门框用条石做成券拱，拱石是用预制的弧形石垒砌，厚度与框相同，框下有门基石。不与墙体相连的墙上有三或四个箭窗，所有箭窗尺寸相同。四墙内部砌成一周环形筒拱，外成回廊，内出天井，中部天井东、西、南、北分别有一个券门，四券门隔开形成4个砖柱，在天井两侧墙壁上有一个或两个阶梯可通三层，为砖砌阶梯，多为11—12步。三层顶部呈方形，四周宇墙垛口大多坍塌或无存，个别敌台处可见射孔和流水槽，三层中部楼橹大多无存，有的可见铺舍立墙以及柱础，三层表面遗存有残破的砖瓦，有灌木生长。



门头沟区斋堂镇黄草梁“沿”字八号敌台附近明长城的现存状况

现存明关堡的结构特点：沿河城千户所



沿河城堡西城门外侧

城周长 1182 米，该堡呈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窄。四面均有墙体遗存。北墙上有五座马面。四面墙体均无宇墙。平面格局情况：该堡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500 米，南北宽 250 米。斋堂城关堡仅存东城门。关堡为方形，长宽约一里。斋堂东城门为砖石结构，青砖发券，券洞完整。整个东城门建筑面积为 209.55 平方米，城门面阔 16.9 米，进深 12.4 米，高 5.28 米，券洞上题有双勾行楷“廓清”门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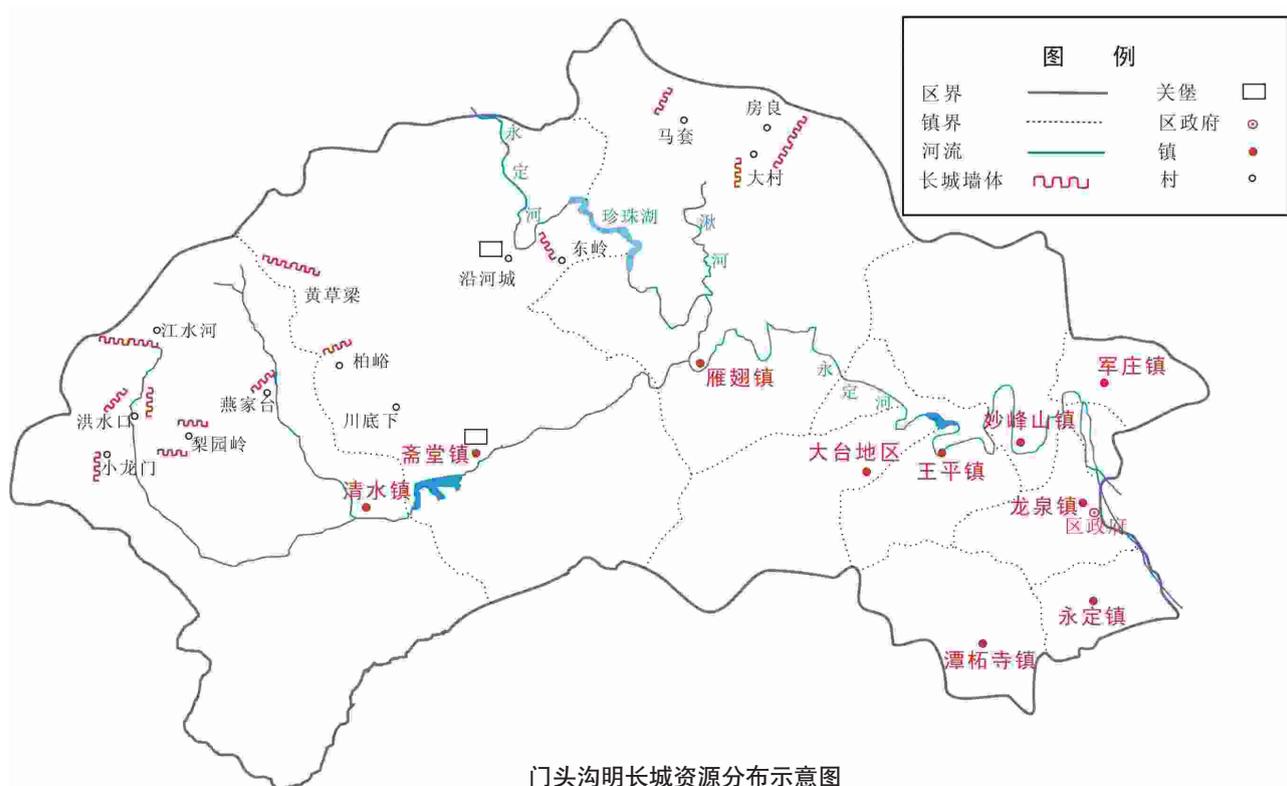
现存明长城烽火台结构特点：南山烽火台为大块毛石垒砌，呈方形，中间碎石和土填芯。

现存明砖窑的结构特点：窑室一般为椭圆形，

四周多为黄土堆积，周围有水源。

门头沟境内长城多位于深山区要道隘口处，两边连接自然山险，属于内三关长城，目的是扼守北京西部山区通往北京的各处重要小路，主要是预防从河北怀来、涿鹿来犯之敌。黄草梁七座楼墙体横亘在黄花坨山顶，视野开阔，西南面临河北怀来盆地，西北与北京最高峰灵山相对，形似张开手臂，主要是防止从河北怀来越黄花坨进入斋堂川的敌人，是防御通往柏峪榆木沟的第一道防线；柏峪天津关墙体横亘于陡峭山崖上，扼守天津关隘，是防守斋堂川的第二道防线。沿河城周围的墙体都是为守护沿河城而修筑的，周边的“沿”字一号至五号敌台控白羊石虎沟，也是防河北怀来经白羊石虎沟抵达斋堂川。“沿”字一至五号敌台均分布在此沟的两侧，居高临下，卡住隘口，并可即时向沿河城关堡传达消息。沿河城南山上的烽火台是向沿河城关堡内传达消息的重要单体建筑。梨园岭敌台与墙体是洪水口关隘的辅助防御设施，洪水口关隘的四周墙体都是防御河北涿鹿来犯之敌的，墙体位置都是卡住隘口，在两侧山坡修筑而成，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其中“沿”字十二号敌台至“沿”字十四号敌台分布在洪水口隘口两侧，主要防御大地沟与灵山地沟两条

修筑的，周边的“沿”字一号至五号敌台控白羊石虎沟，也是防河北怀来经白羊石虎沟抵达斋堂川。“沿”字一至五号敌台均分布在此沟的两侧，居高临下，卡住隘口，并可即时向沿河城关堡传达消息。沿河城南山上的烽火台是向沿河城关堡内传达消息的重要单体建筑。梨园岭敌台与墙体是洪水口关隘的辅助防御设施，洪水口关隘的四周墙体都是防御河北涿鹿来犯之敌的，墙体位置都是卡住隘口，在两侧山坡修筑而成，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其中“沿”字十二号敌台至“沿”字十四号敌台分布在洪水口隘口两侧，主要防御大地沟与灵山地沟两条



要道，堵塞从河北涿鹿来犯之敌。小龙门“沿”字十五号敌台东南侧山脊上的墙体与敌台夹沟而对，山坡极陡，地形险要；“沿”字十五号敌台分布在小龙门口关隘处，亦是防御河北涿鹿方面的敌人。

门头沟区明长城遗存基本分布在区西北、西南深山灌木林地，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多，人为影响略少，其中有45%的部分易受人为活动影响而导致破坏，有55%的部分受自然因素影响而导致破坏。

门头沟区境内气候为中纬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湿润，冬季寒冷干燥。门头沟区内的地质大多为山地棕壤以及山地淋溶褐土、山地碳酸盐褐土等，容易风化、水蚀、冻融，可对长城遗存本体造成物理性的破坏。长城本体内外生长灌木杂草，这些植物根系对长城本体也有分裂瓦解等破坏作用。

自然环境包括：长城分布地区的地质、地貌、植被、山川、气候、水文等自然环境分类统计。

	长石质山地碳酸盐褐土	长石质山地淋溶褐土	长石质山地棕壤
墙体	4	5	1
敌台	4	13	0
烽火台	2	0	0
关堡	1	0	1
挡马墙	4	2	0
砖窑	0	4	1

由上表可知：门头沟区辖境内长城分布地区为西北部深山区，长城遗存的地质分析为：长石质山地碳酸盐褐土35.7%，长石质山地淋溶褐土57.1%，长石质山地棕壤7.2%。

	山地杂木混交	山地灌木林带	山地草甸	耕地	荒地
墙体	4	5	0	1	0
敌台	8	4	0	2	3
烽火台	0	2	0	0	0
关堡	0	0	0	2	0
挡马墙	0	2	0	4	0
砖窑	0	1	0	2	2

长城遗存的植被统计数据为：山地杂木混交28.6%，山地灌木林带33.3%，山地草甸0%，耕地26.2%，荒地11.9%。

人文环境包括：城镇、村屯、厂矿、交通、水力、耕地、林渔牧场等。

	城镇	村屯	耕地	林场
墙体	0	0	2	8
敌台	0	0	7	10
烽火台	0	0	0	2
关堡	1	1	0	0
挡马墙	0	1	4	1
砖窑	0	0	4	1

由上表可知：门头沟区辖境内明长城分布区人文环境统计数据：城镇2%，村屯5%，耕地40%，林场53%。

	国道	省公路	镇公路	乡村级公路	山地小路
敌台	1	3	0	5	8
烽火台	0	0	0	0	2
关堡	1	0	1	0	0
挡马墙	0	0	3	1	2
砖窑	0	0	0	2	3
墙体	1	2	1	1	5

门头沟区辖境内明长城分布区的交通状况数据分析：国道7.1%，省公路11.9%，镇公路11.9%，乡村级公路21.7%，山地小路47.4%。

气候为中纬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湿润，冬季寒冷干燥。

沿河城附近有永定河流过，“沿”字十二号至“沿”字十四号敌台以及附属城墙有山涧溪水，其余长城遗存分布地带无水文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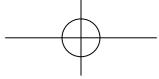
部分长城遗存距离村庄较近，因此受到人为破坏较多，比如洪水口村“沿”字十二号至“沿”字十四号敌台，沿河城村“沿”字一号、二号敌台以及仅存东城门的斋堂城堡等。

经过两年多的野外调查，我们进一步摸清了本区内明长城的存在状况，其中黄草梁七座楼以及柏峪天津关、沿河城周围，包括白羊沟“沿”字3-5号敌台、永定河两侧“沿”字1-2号敌台、“沿”河城关堡、南山1-2号烽火台、洪水口“沿”字12-14号敌台以及周围3个砖窑遗址、斋堂镇东城门（斋堂城堡）急需重点保护与修缮，尤其是黄草梁七座楼以及天津关更需要进行抢救性保护。

为此，我们建议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长城资源保护管理的资金注入；增加保护管理人员，并提高保护管理人员的保护管理意识；制定具体的保护管理规划与执行步骤；合理利用开发门头沟境内长城资源。

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积极举办门头沟区境内长城资源的图片、影像资料展示；开展关于门头沟区境内长城资源的座谈会，举办关于门头沟区境内长城资源的学术报告会；在确保本区内长城资源不被破坏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门头沟区境内长城资源进行旅游开发；应该更加深入具体的研究门头沟区辖境内长城资源的各个方面，结合实地考察与存世文献并重的方法，细致研究，详加考证，多出研究成果。

（作者为门头沟区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



韩愈和北京国子监土地祠

——从“优入圣域”匾额说起

王琳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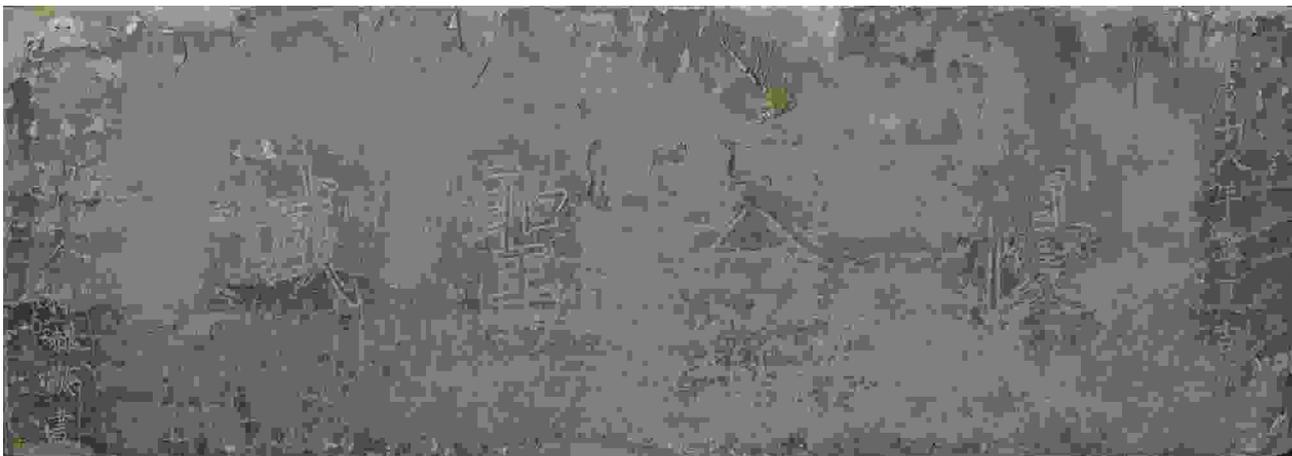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现存有匾额五十多块，由于年代久远，这些匾额何人题写，题写于何时，悬挂于何处等问题都有待考证。其中“优入圣域”这块匾额引起笔者的注意，经过深入研究，笔者不仅揭开了这块匾额的庐山真面目，而且还有意外的发现。

一、“优入圣域”，褒扬韩愈

“优入圣域”匾黑地红字，长 171 厘米，宽 61 厘米，厚 4 厘米，匾保存不是很好，一些地方已经掉漆，但还是可以辨认出：正中楷书“优入圣域”四个大字，左侧题写“嘉庆十八年孟夏吉日”，右侧题写“助教金特赫敬书”。看到“优入圣域”这四个字，一下子想起韩愈《进学解》来：“昔者孟轲好辩……荀卿守正……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进学解》是韩愈在元和七至八年（812 ~ 813 年）任

国子博士^①时所作，假借向学生训话，勉励他们在学业、德行方面取得进步，学生提出质问，他再进行解释，故名“进学解”，借此抒发个人怀才不遇、仕途不顺的情怀。文中说孟子和荀子德才俱佳，“优入圣域”，可以进入并达到圣人的境界。由此，判断此匾额可能褒扬的是孟子、荀子或韩愈三人中的一个。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研究部高彦主任曾经说过，以前国子监还有一座土地祠，供奉的是韩愈。“优入圣域”这块匾额会不会就是悬挂在土地祠、褒扬韩愈的呢？笔者查阅道光十三年（1833 年）修订的《钦定国子监志》，果然在有关记载土地祠的章节中找到：“又额曰：‘优入圣域。’嘉庆癸酉，助教金特赫题。”^②书中记载与实际匾额情况一致，可以断定笔者的猜测是正确的，“优入圣域”这块匾额是嘉庆癸酉年（嘉庆十八年，1813 年）国子监助教^③金特赫为韩愈题写的，悬挂于国子监土地祠中。



匾额“优入圣域”

二、昔日祠堂，今朝废弃

国子监土地祠又称昌黎祠，在明嘉靖年间王材、郭磐等专门为国子监纂修的志书——《皇明太学志》^①中就有记载，但是具体建造年代书中并未提及。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编修的《钦定国子监志》，即“四库本”也记载：“祠之始立无考。”^②北京国子监始建于元代，但土地祠至少在明代就已有。

虽然没有记载土地祠的建造年代，但是《皇明太学志》对土地祠的位置、大小、环境等都有详细的描述：

“土地祠五间，在饌堂^③门之右。庭植松树二株，缭以垣，中门一座，折而西，门一座，即由广储之路以入者。（旧名小广储门）”^④

除了祭祀孔子外，国子监师生“每十二月二十四日祭本监土地等神。”^⑤《皇明太学志》卷之五详细记载了明代国子监师生祭拜土地神的情况：

“斋期前期一日，本监□典簿□□□□祭器，午后省牲。至日□明本监祭酒率合属官员，躬行祭礼于祠内。祭品：羊一，豕一，鸡，鱼，馒头，时果，酒。祭器：锡爵三，锡酒壶一，木方盘五，铁香炉一，铁烛台二。陈设：王日，执事监生各诣坛所，依式陈设，以俟祭酒行礼。”^⑥

虽然文中缺字，但不影响我们的理解。祭祀的前一天，准备好祭器；为了显示虔诚，前一天午后，一一审查祭祀用的牲口——省牲。二十四日当天国子监祭酒率领全体师生，在土地祠内躬行祭礼，祭拜土地。祭品有：一只羊，一头猪，还有鸡、鱼、馒头、时令水果和酒。祭器有：三只锡爵，一把锡酒壶，五个方木盘，一个铁香炉，两只铁烛台。祭祀时，国子监祭酒还要宣读祝文：

“某年岁次，某甲子，某月，某朔越，某日某，国子监祭酒某等，敢昭告于本监土地之神曰：‘国朝设立太学，以作养人才，凡师生朝夕起居，赖神之庇，岁云暮矣，礼宜报祀。谨以牲帛果品式陈，明荐尚飨。’”^⑦

太学之地，化育人才，一年苦读，神灵庇佑，年终将至，不敢怠慢，陈设牲帛果品，祭献土地。从此处记载，可以看出明代师生祭祀土地神之恭敬虔诚。

乾隆四十三年编修的《钦定国子监志》记载了清朝乾隆时期的土地祠，较《皇明太学志》的记载更为详细：

“土地祠在崇圣祠后迤西。正祠三楹，南向，高一丈七尺五寸，广一丈一尺，深一丈八尺左右；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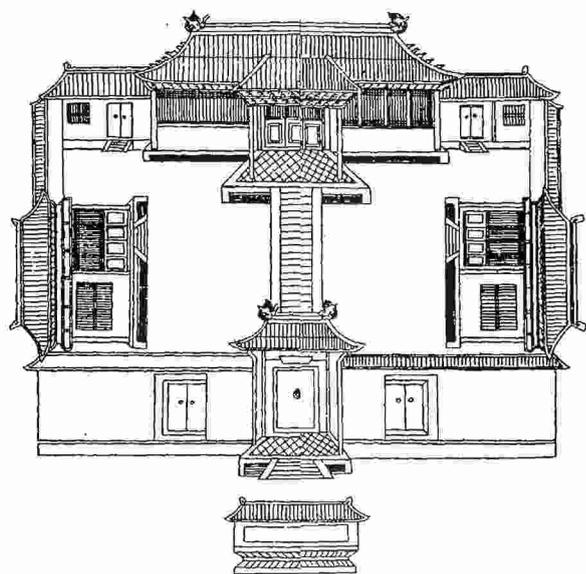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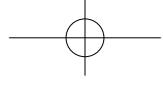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皇明太学志》中国子监土地祠陈设图

房各一楹，高一丈四尺一寸，广九尺，深一丈四尺，前抱厦一楹，高一丈一尺三寸；又前左右厢房各二楹，高一丈三尺九寸，广一丈八尺四寸，深一丈二尺；均覆以版瓦，周缭以垣，前为大门，高七尺九寸，广一丈，深五尺，左右小门各一。

谨案：祠之始立无考。《明太学志》云：土地祠五间，在饌堂门之右。疑即此也。国朝康熙戊辰、丙戌，乾隆己巳、甲申，节经丹雘。三十二年附先师庙大工，一体庀材加焕饰焉。”^⑧

这里不仅写出了土地祠的方位、建筑布局，还交代了建筑的高度、长度和进深。“谨案”中的内容也值得研究。土地祠始建于何时，在清乾隆年间就已经无从考证了，最早关于它的记载就是在《皇明太学志》中，前文已述。此清代土地祠是否就是彼明代土地祠，清人存疑，不敢妄下断言，“疑即此也”。从明清两代国子监全图土地祠的位置来看，此即是彼，彼即是此。清代对土地祠还是很重视的，多次修缮油饰：康熙戊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



文渊阁四库全书《钦定国子监志》中国子监土地祠全图

丙戌（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乾隆己巳（乾隆十四年，1749年）、甲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土地祠的斗拱（“节经丹雘”之节）经过染料涂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孔庙大修，土地祠也随同一起修缮，一同备齐建筑材料，增加新的装饰。

土地祠正祠内悬挂着众多赞颂褒扬韩愈的匾联，《钦定国子监志》载：

“联曰：‘进学解成，闲官一席曾三任；起衰力任，巨学千秋本六经。’康熙戊辰，司业彭定求题。

又匾曰：‘泰山北斗。’联曰：‘贯日矢天，正气衍千秋之俎豆；驱邪辟异，精英振八代之文章。’俱康熙戊辰，典簿张璿题。

又匾曰：‘浩气独存。’联曰：‘道统接邹鲁而后，功在千秋；儒修开濂洛之先，泽流多士。’皆康熙丙戌，祭酒孙岳颂书。”^①

司业^②彭定求和典簿^③张璿为土地祠题写的匾额、楹联都是在康熙戊辰年，也就是康熙二十七年。祭酒^④孙岳颂书的匾额、楹联在康熙丙戌年，也就是康熙四十五年。与乾隆版《钦定国子监志》卷九中有关记载相对照“国朝康熙戊辰、丙戌……节经丹雘”，会发现这两个年代土地祠恰好修缮、油饰。笔者推测，很有可能在康熙二十七年和四十五年对土地祠油饰过后，国子监的官员为表示对韩愈的尊敬，对土地的虔诚，题写以上匾额、楹联。这些匾联的内容不外乎概述韩愈的生平、表现韩愈的思想，表彰韩愈的贡献。

彭定求（1645～1719年），字勤止，江南长洲人，康熙十五年（1676年）状元。康熙二十四年

（1685年）任国子监司业^⑤。康熙二十七年题写。

“进学解成”，这里指韩愈散文名篇《进学解》；“闲官一席曾三任”，韩愈多次出任国子监官员^⑥，三，多次之意，国子监官员主管教学，无实权，故被认为是“闲官”；“起衰力任”，韩愈散文开一代之风气，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一扫骈文奢华之文风，居“唐宋八大家”之首，苏轼评价其“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这几个朝代正是骈文由形成到鼎盛的时代；“巨学千秋本六经”，韩愈在哲学思想上尊孔孟反佛老，因谏阻宪宗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韩愈

创造性地构造出儒家的“道统”来对抗佛教的“祖统”，他的学问以儒家的“六经”为根本。

张璿，生卒不详，顺天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任国子监典簿^⑦。康熙二十七年题写。

“泰山北斗”，韩愈的“道统”说对宋明理学影响深远，他的散文是后人习作的范本，因此称得上“泰山北斗”。《新唐书·韩愈传》：“自愈没，其学盛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贯日矢天”，韩愈的衷心天地日月可鉴，精诚感天；“正气衍千秋之俎豆”，韩愈生前为国为民，力谏皇帝被贬潮州，正气被后人称颂，所以身后入祀孔庙，享受俎豆之礼；“驱邪辟异”，韩愈力辟佛老，尊儒家为正统；“精英振八代之文章”，韩愈散文开唐宋散文之先河，“文起八代之衰”。

孙岳颂（1639～1708年），字云韶，江南吴县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进士，康熙三十四至三十五年（1695～1696年）任国子监祭酒，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以侍郎兼任国子监祭酒^⑧。康熙四十五年题写。

“浩气独存”，韩愈之浩然正气千百年来尤在。“道统接邹鲁而后”，韩愈的“道统”说认为儒家的道的内容是“仁义”，他认为从孟子以后，“道统”就失传了，韩愈接续了孔孟这个道统；“功在千秋”，韩愈的“道统”说直接开启了宋明理学，功在千秋；“儒修开濂洛之先”，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是宋明理学的重要人物，周敦颐的老家有条濂溪，后世称之为“濂溪先生”，二程的老家在洛阳，有洛水，世称其学为“洛学”，韩愈的“道统”说直接

影响了周敦颐和二程兄弟；“泽流多士”，韩愈的哲学思想、散文等对后代士人影响深远，泽被后世。

道光十三年修订的《钦定国子监志》对土地祠也有记载：

“土地祠在崇圣祠后迤西，正祠三间，南向。高一丈七尺五寸，广一丈一尺，深一丈八尺。

内悬联曰：‘进学解成，闲官一席曾三仕；起衰力任，钜学千秋本六经。’康熙戊辰，司业彭定求题。

又额曰：‘泰山北斗。’联曰：‘贯日矢天，正气衍千秋之俎豆；驱邪辟异，精英振八代之文章。’康熙戊辰，典簿张璿题。

又额曰：‘浩气独存。’联曰：‘道统接鲁邹而后，功在千秋；儒修开濂洛之先，泽流多士。’康熙丙戌，祭酒孙岳颂题。

又额曰：‘昭垂宇宙。’乾隆丙申，助教嵩龄题。

又额曰：‘斯文在兹。’联曰：‘起八代衰，自昔文章尊北斗；兴四门学，即今俎豆重东胶。’嘉庆丁巳，祭酒法式善题。

又额曰：‘优入圣域。’嘉庆癸酉，助教金特赫题。

又额曰：‘忠直正大。’道光己丑，伯庆阿题。”

左右掖房各一间，高一丈四尺一寸，广九尺，深一丈四尺。前抱厦一间，高一丈一尺三寸。均覆以版瓦，周缭以垣。庭中杂植各树。前为大门，高七尺九寸，广一丈，深五尺，左右小门各一。

谨案：祠之始立无考。《明太学志》云：土地祠五间，在饌堂门之右。疑即此也。国朝康熙戊辰、丙戌，乾隆己巳、甲申，节经丹雘。三十二年附先师庙大工，一体庀材加焕饰焉。^⑤

将《钦定国子监志》乾隆“四库本”和道光“修订本”两个版本中对土地祠的记载及两个时期的土地祠全图相比较，发现土地祠的位置、建筑没有什么变化，甚至建筑的尺寸都一致，“谨案”内容也完全一致，只是祠内的匾额、楹联增多了。从文字内容上看，这些匾联与之前的内容大体一致，也是褒扬韩愈。

嵩龄，原名阿克章阿（生卒年不详），乾隆二十三年奉命改名为嵩龄，字与九，满洲镶红旗人，著名满族画家。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任八旗助教^⑥。乾隆丙申（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题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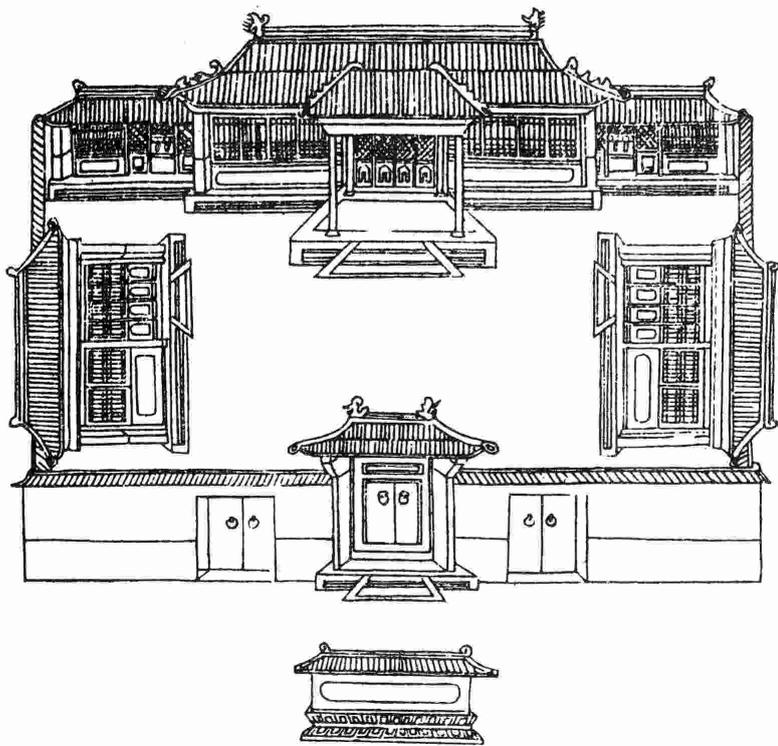
“昭垂宇宙”，赞颂韩愈的功业昭示、垂范天地。

法式善（1753～1822年），原名运昌，蒙古正黄旗人，清代文学家，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任国子监祭酒^⑦。嘉庆丁巳（嘉庆二年，1797年）题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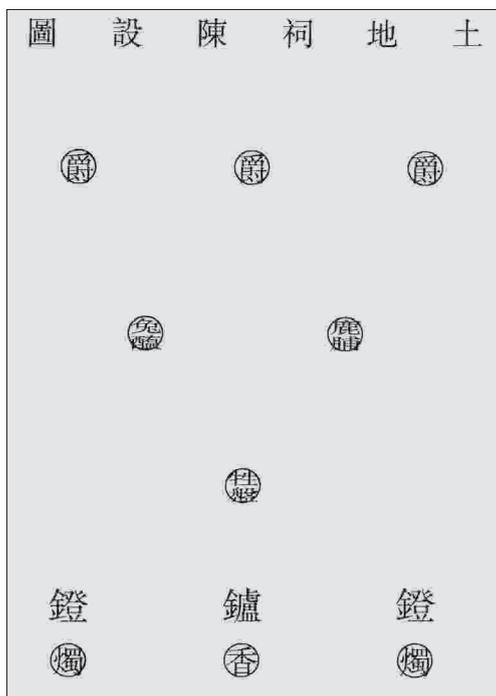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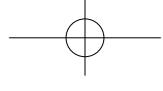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斯文在兹”，出自《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斯文”指周初文武周公相传之礼乐、典章制度。这里称颂韩愈继承儒家“道统”，继承儒家文化。“起八代衰，自昔文章尊北斗”，韩愈文章挽回八代以来文章的衰落势头，文章堪称典范，受后人景仰；“兴四门学，即今俎豆重东胶”，“四门学”是古代学校名，北魏正始四年（507年）创建四门小学，因初设于京师四门，故名。“兴四门学”，这里指韩愈任职国子监，发展教育。“东胶”出自《礼记·王制》：“周人养国老於东胶，养庶老於虞庠。”东胶，泛指兴化教育、养老之所。“即今俎豆重东胶”，而今，国朝重视教育，韩愈受后人尊敬入祀孔庙享受俎豆之礼。

金特赫，生卒不详，满洲正白旗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任八旗助教^⑧。嘉庆癸酉（嘉庆十八年，1813年）题写。

“优入圣域”，就是本文开篇所提匾额，借用韩



道光年间《钦定国子监志》中国子监土地祠全图



道光年间《钦定国子监志》中
国子监土地祠陈设图

愈《进学解》的词语赞颂韩愈已经进入圣人的境界。

伯庆阿，生卒不详，蒙古正蓝旗人，嘉庆十三年（1808年）任国子监笔帖士^⑧。道光己丑（道光九年，1829年）题写。

“忠直正大”称颂韩愈对国家忠诚正直，公正无私。

从乾隆、道光两朝的志书记载，发现当年土地祠中悬挂了很多匾额、楹联，由此可见当年国子监官员对土地祠的重视程度。

乾隆“四库本”和道光“修订本”《钦定国子监志》对土地祠内陈设情况记载一致：

“土地祠位：南向，供案一。案设磁爵三、磁盘二，左实鹿脯，右实兔醢。牲盘一，实以牛肉、豚肉各一方。其前炷香一、烛二，炉一、镫二，质用绿色琉璃。”^⑨

与明代土地祠陈设相对比，发现明清两代祭祀土地的用品有很大差别。

清代记载国子监的志书还有光绪二十三年补刊重印本。但是光绪本主要是对道光本作以补刻，内容几乎没有变动，所以，道光至清末、民国年间孔庙和国子监的情况鲜有史料记载。道光十三年之后土地祠的情况也无文献可查。

明末清初人孙承泽著的《春明梦余录》记述明代典故，颇为详细，其中也有关于国子监土地祠的记载，但是与《皇明太学志》比较，发现其中记载完全来自于《皇明太学志》，没有更多的内容。《日下

旧闻考》关于国子监土地祠的记载也与乾隆四十三年“四库本”《钦定国子监志》内容一致。

根据志书的记载，按图索骥，找到了当年的土地祠，它位于崇圣祠西北，与崇圣祠一街之隔。据说，解放后土地祠曾是一家工厂的仓库，目前，归国学小学所有，荒废无人使用。土地祠院子呈长方形，门口一扇红铁门，院内除了三间正祠，其余均为现代建筑。正祠三间，面南，前抱厦一间，这与乾隆和道光的《国子监志》记载：“前抱厦一楹”一致。正祠有被今人改建的痕迹，但是屋内梁柱还未破坏，房檐处隐约能够看到彩绘。

三、文起八代，道统传承

为什么唐代的大文人韩愈成了土地爷，受后人祭祀呢？这得先从韩愈本人说起。

韩愈（768～824年），唐代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圣”之称。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因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

韩愈早孤，由嫂抚养成人，刻苦读书，《新唐书·韩愈传》载：“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⑩贞元年间韩愈中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元和元年至元和四年（806～809年），元和七年至八年间（812～813年）任国子博士；元和十三年（818年），元和十五年至长庆元年（820～821年）任国子祭酒。卒谥文公，世称“韩文公”。“宋元丰七年（1084年）从祀孔庙，封‘昌黎伯’，明嘉靖九年（1530年），改称先儒韩子。国朝称先儒，不称子。”^⑪清代韩愈从祀于孔庙西庑，东面，北侧。这样看来，韩愈与国子监和孔庙都有很深的渊源。

土地庙中的土地神，俗称土地公、土地爷，是古代神话中管理一个小地面的神。土地神源于远古人们对土地权属的崇拜，土地能生五谷，是人类的“衣食父母”，因此人们祭祀土地。最初的土地神是社神，后来人们还将一些去世的有功德之人奉为当地的土地神：杭州太学就奉岳飞为土地神；南京有的地方以萧何为土地神；重庆有的地方奉韩愈为土地神，翰林院、吏部、国子监奉韩愈为土地神。

韩愈何时成为土地神清代就已无从考据，清代学者赵翼所著的《陔余丛考》中载：“今翰林院及吏部所祀土地神，相传为唐之韩昌黎，不知其所始。……又《宋史·徐应鑣传》：临安太学本岳飞故第，故飞为太学土地神。今翰林吏部之祀昌黎盖亦

仿此。”^⑥土地神为民间百姓所信奉，韩愈造福潮州百姓，深受爱戴，很有可能最早是潮州地区百姓奉韩愈为土地，后来逐渐被各地接受。“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韩文公碑》）韩愈以文章、以“道统”说、以高尚的操守为后世所尊崇，为民众所称颂。他生前任职于国子监，身后入祀孔庙，故尊为国子监“土地”。

四、结束语

韩愈以其在理学和文学史上的重要贡献而为后代学子所敬仰，以其高尚的操守为百姓所爱戴，因此奉为国子监土地，受最高学府国子监师生香火。“优入圣域”这块匾额很好地体现出后人对韩愈的崇敬，只可惜今日土地祠荒废，祠中众多匾联，也只留存这一块。



土地祠正祠三间

①博士，国子监学专门从事教学的官员。清代为从七品。

②[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4页。

③助教，国子监教官，协助博士教学。清初为从八品，乾隆元年（1736年）升为从七品。

④[明]王材、郭鏊等纂修：《皇明太学志》，首都图书馆编辑《太学文献大成》卷五，学苑出版社，1996年。

⑤[清]梁国治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358，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⑥饌堂，明代国子监食堂，在国子监东北，清代已无。

⑦[明]王材、郭鏊等纂修：《皇明太学志》，第45页。

⑧[明]王材、郭鏊等纂修：《皇明太学志》，第543页。

⑨[明]王材、郭鏊等纂修：《皇明太学志》，第543—544页。

⑩[明]王材、郭鏊等纂修：《皇明太学志》，第545页。

⑪《钦定国子监志》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⑫《钦定国子监志》卷6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⑬司业，为国子监内的副长官，协助祭酒，掌儒学训导之政。清代为正六品。

⑭典簿，国子监主管人事和财务的官员。清代为从八品。

⑮祭酒，古代飨宴时酌酒祭神的长者，后亦以泛称年长或位尊者。隋唐以后，专指国子监的主管官员。清代为从四品。

⑯[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第714页。

⑰元和元年至元和四年（806—809年），元和七年至八年间（812—813年）韩愈任国子博士；元和十三年（818年），元和十五年至长庆元年（820—821年）任国子祭酒。

⑱[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第776页。

⑲[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第713页。

⑳[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第44页。

㉑[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第763页。

㉒[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第719页。

㉓[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第768页。

㉔[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第782页。笔帖士，清代低级文职官员，主管翻译、起草或办理奏章文书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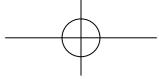
㉕《钦定国子监志》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第482页。

㉖[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76《韩愈传》，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5255页。

㉗[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第92页。

㉘[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五“韩昌黎为土地神”。

（作者为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馆员）



二 一 闸

明清北京的公共休闲空间

周
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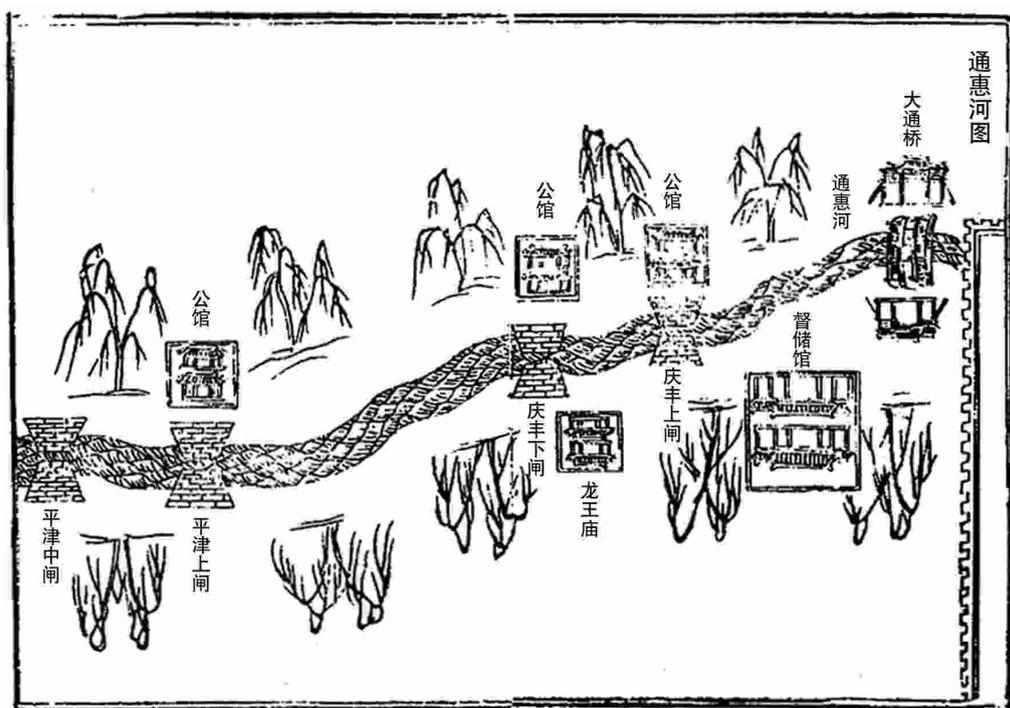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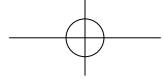
自元朝郭守敬主持开凿通惠河后，这一运河不但是北京物资供应的生命线，也是一条风光旖旎的风景区，尤其是起自东便门外大通桥，向东到庆丰闸的河段。自明代起，逐渐成为京城上自官员，下至百姓日常观光休闲的胜地，到清末渐趋鼎盛。民国后，这一带渐渐萧条。建国后，这一名胜则完全荒废。时至今日，只有经过修缮但却原味尽失的庆丰闸遗址可寻，但已完全失去了观光游览的功能。本文仅就明清这一河段作为城市的休闲空间职能略作阐述。

一、明代以大通桥为中心的通惠河之游

通惠河从东便门外大通桥到八里桥的河段上共有五座闸门，从西到东依次是大通闸、庆丰闸、平津上闸（高碑店闸）、平津下闸（花儿闸）、普济闸，按其顺序，庆丰闸又被称为二闸，民间也多呼为二闸，很少称其正名。

明代的通惠河游览多在大通桥至庆丰闸一线，但多以大通桥为中心。明朝刘侗的《帝京景物略》有“三忠祠”一条描述这一带的景致：

出崇文门三里，曰大通桥。运河数千里，闸七十二，抵桥下闸，不复通矣。大通云者，著有成也。水从昌平白浮村之神山泉，过双塔榆河，会一亩、玉泉诸水，入城，汇积水潭，繇玉河中出。桥下闸而滩之，淘淘沌沌，撻怒则鸣。过滩窅然，泚泚活活，水乃疾行。疾者去之，缓以洄者取之，吱吱轧轧，林间之桔槔也。倚高城，临运河，一二园亭而东之。三忠祠祀三忠：汉武侯、宋鄂王、信国也。祠后濯缨亭，亭即河之岸，拨船千艘，亭榭艘檣，日与摩拂。河故元通惠河，都水监郭守敬浚者，即金辽故河也。我成化正德中再疏之，再未就。嘉靖丁亥，御史吴仲请修，修三月告成功，上舟观之，廛居夹岸二十里，柳垂垂蘸河，漕舟上下达。大学士张璁等联句以闸，上喜，给光禄饌，又分御膳赐焉。万历中岁运，二月徂五月，冻粮至，去年粮也；夏徂秋，逮乎冬而至，本年分粮也。十年来，餉用急，漕政渐修，闸河一线，无守冻船。每花信麦秋时，亭阴闲闲，岸草静好。出都门，半取水道，送行人，闲者别张家湾，忙者置酒此祠亭，去住各荒率，亭所阅，少闲人。对岸鹿园，金章宗故园也，今曰蓝靛厂。



通惠河图（采自《通惠河志》）

可见，自大通桥向东，有一二座园林。园林东面运河南岸有三忠祠，是明代周珍创建，专门供奉诸葛亮、岳飞和文天祥这三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忠臣。在祠堂北面紧邻运河有一座濯缨亭，此处经常被作为送别宴客的场所。嘉靖六年（1527年），此段通惠河再次修浚，沿河20里，遍植垂柳，形成了一条别具江南水乡特色的景观带。工程告竣后，嘉靖帝也曾亲自登舟视察，首辅大学士张璁等为此联句作诗，题为《侍上泛通惠河，同官联句》。诗中有“落日秋风好放舟，已过三闸顺安流”及“残柳压堤闲宿鹭，轻帆破浪未妨鸥”等语^①，描绘了泛舟通惠河上心情的畅快与环境的美丽。

此后，明朝北京的官员、文人都以泛舟通惠河为乐事，而且游览的重点大多以大通桥一带为中心。著名诗人，“南园后五子”之一的欧大任（1516～1596年）曾作诗《三月晦日游大通桥濯缨亭》，诗中也提到濯缨亭西侧的桔槔亭^②。明代著名文学家，“公安派”主要代表人物，号称“公安三袁”的袁氏三兄弟中的袁宏道（1568～1610年）与袁宗道（1560～1600年）都曾游览过通惠河。袁宏道有诗《夏初，黄无净邀同项玄池诸友及家伯修，泛舟大通桥》：“京师百戏都，所少惟舟筏。御水落漕渠，淙淙流一发。凡目未经先，虽少亦奇绝。何况集棠舟，游遨似吴越。菱蒲得水长，凫驾避沙热。朱碧好亭子，稀疏出林樾。双航无定质，随波作周折。遇树即停帆，因风或舟楫。闸水高十仞，百斛量琳屑。骏马下危坡，疾雷震空碣。西门亦有水，宽丈

深寸尺。计较今昔游，居然分胜劣。朝日照来骑，归途见微月。”^③可见，对于繁华的京城缺少水景，作者不无遗憾，但是通惠河却填补了这一缺憾，并且其风光酷似吴越，给来自水乡的作者以亲切之感。袁宗道也有诗《夏日，高户部循卿，招饮大通桥》：“一望皆林塘，孤亭临水际。连簪四五人，一揖易巾屣。主人陈尊壘，花下趋人吏。两行檀压酒，百巡车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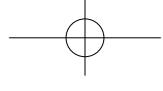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截。长艘潞河来，人衣沾草翠。潭影见轩窗，游鱼呷亭宇。散坐捐烦苛，纵谈忘忌避。水风醒心脾，百罚不成醉。舟行穷幽奥，目境转奇邃。临涯逼悬流，万雷击山坠。对面不闻语，但见口开闭。冰柱万条直，雪岩千片碎。侧身奔石间，趾酸心病悸。归卧北窗下，枕边闻水气。”^④同样描绘了大通桥一带运河的秀美风光。

明代通惠河的游客中多为朝廷官员，少见百姓，且南方出身的官员较多。这与大通桥一带近似江南水乡的风光有关，旖旎的景色更能给这些远离家乡的游子以故园之思。

二、清代官民同乐的休闲活动——逛二闸

到了清代，从大通桥到庆丰闸的通惠河段依然是游览胜地，与明代不同的是，由以大通桥为中心转而以庆丰闸为中心，并且此地也成了平民百姓观光休闲的绝佳场所。

康熙十五年（1676年），工部郎中田雯主持修复大通桥，为此作诗《大通桥行》。公务之余，在庆丰闸游玩，作有《庆丰闸闲步》二首，其一：“村口人家浅，为园傍野塘。疏泉畦水细，铺地芥花香。斜缆穿堤柳，饥鸟上钓床。北方宜种秫，亦插稻田秧。”其二：“莽莽沙村路，遥连渔浦烟。小桥垂柳下，古庙野花香。风过雕翎落，山昏两脚悬。



北京史地

忘归天欲暮，野兴剧流连。”^⑤可见，清初的庆丰闸尚不是十分热闹，具有幽静的荒野田园景色。但是，由于通惠河的水乡特色在北京尤显难得，因而此地逐渐游人如织，游船如云，以二闸为中心成为了京城的游览胜地。“城东卷地黄埃，一过大通桥，见水顿觉心旷神怡，故二闸泛舟，都人目为胜游之一。”^⑥

逛二闸的主要活动当然是乘舟沿河游览，游览路线一般是自大通桥到庆丰闸，也有少数人紧接着游到平津闸。如劳宗茂有《游二闸》诗：“红船白板绿烟丝，好句扬州杜牧之。何事大通桥上望，风光一样动情思。庆丰才过又平津，立遏通渠转递频。莫谓盈盈衣带水，胜他多少犊轮辛。”^⑦泛舟通惠河所雇船资并不昂贵，能为普通百姓所接受。“小舟三两，舣岸相待，游人投之钱，即款乃行。”^⑧但如有特殊需求，则价格甚贵。“赁船并不昂，若偕伎包船往来，则贵不可问。”^⑨二闸观水，是一项重要的游览活动，由于闸坝形成的上下流落差，二闸向下流泄水处“水声潺潺，酷肖瀑布”。^⑩而“雨后观水，尤壮旺。”^⑪二闸一带的居民多以漕运为生，因此水性都很好，其子弟也因游客众多，利用良好的水性为游客表演以赚取奖赏。“闸下水深数仞，窥不及底，游者辄凭桥栏，下掷钱物，附近居民，窜入急流，取原物归，藉博赏资。业此者多十龄左右之小儿，都人称之为‘水虾子’。”^⑫有竹枝词描绘这种场景，“几个儿童赤体蹲，身轻如鸟浪中翻。今朝乞得钱三倍，归于爷娘共笑言。”^⑬

游人的众多，也促使二闸一带饮食服务业的繁盛，茶馆、酒楼，举目皆是，并且环境宜人。震钧就曾在大通桥西的茶馆饮茶，感叹环境虽好，但水及茶叶都不太令人满意。“大通桥西坝下，旧有茶肆，乃一老卒所辟。并河有廊，颇具临流之胜。秋

日苇花瑟瑟，令人生江湖之思。余数偕友过之，茗话送日。惜其水不及昆明，而茶尤不堪。”^⑭较为知名的茶馆有如意馆、雅利居等。^⑮有的茶馆也供应酒席，“临河茶棚甚多，以大花障为有名，肴酒俱备，价昂而不佳，以缺为贵也。”^⑯大花障之类是较为低档的餐饮场所，较高档的则有望海楼、望东楼等。望东楼鱼汤尤给人回味无穷之感。“乘舟二闸欲探幽，食小鱼汤味亦甘。最是望东楼上好，桅樯烟雨似江南。”^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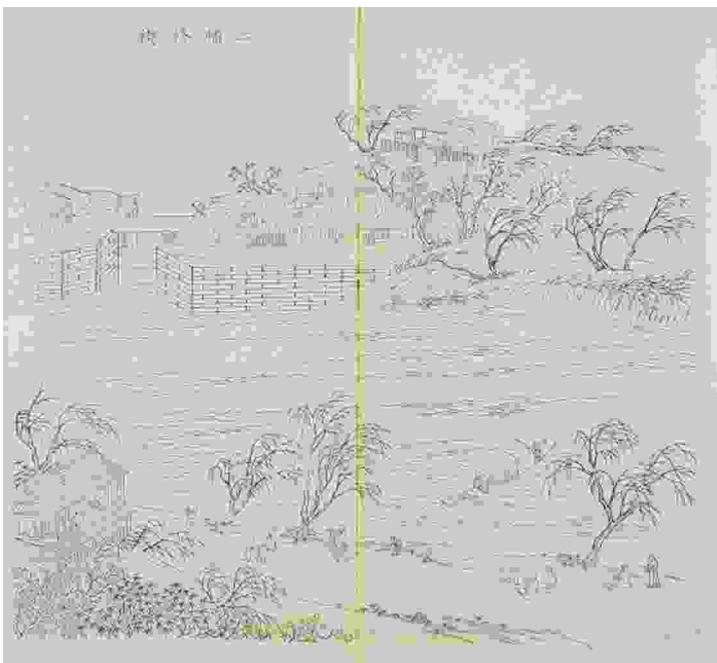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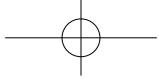
二闸还有一项重要的岁时活动，那就是中元（阴历七月十五日）放河灯。“而中元之夕，月光大好，则雾縠披躯，茉莉堆髻，脂粉狼藉，履舄杂遝。凭栏俯瞰，闸波漾天，月如串珠，足媲卢沟晓景，然一年一度，转瞬即逝，以是趋者争先，唯恐或后。迨宵阑月斜，凉侵芳肌，冒露言归，蹄痕碎月，柔意弥爽，雅怀滋适亦。”^⑱在这一天，还有扭秧歌、舞狮等民间娱乐活动。“运河二闸，自端阳以后游人甚多。至中元日例有盂兰会，扮演秧歌、狮子诸杂技。晚间沿河燃灯，谓之放河灯。中元以后，则游船歇业矣。”^⑲另外，每年二月二日，各种民间花会在此汇集、表演。“每届二月二日，文场少林、太狮少狮子，于此会集。”^⑳其中的狮子会就是二闸当地人表演的，舞狮有大狮子和小狮子之分，大狮子名之为“太师”，小狮子名之为“少狮”。平日二闸的娱乐活动还有听大鼓书、三弦等，有竹枝词记载道：“雏莺乳燕不知名，开口欣然座客迎。一曲清歌金一饼，游人念尔亦苍生（女唱向人乞怜，客有掷以金钱者——原诗后小注）。”^㉑

二闸游玩，可雅可俗。雅的可在此举行上巳修禊的古礼，俗的则有阔大奶奶之闲逛。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初三，后来官至江南河道总督的完颜麟庆曾与友人15人来到通惠河边，仿照东晋

王羲之等人著名的兰亭会，举行上巳修禊之礼。“或泛小舟，或循曲岸，或流觞而列坐水次，或踏青而径入山林，日永风和，川晴野媚，觉高情爽气各任其天。”^㉒时隔多年，他回忆及此，为永久保留美好的印象，而留下了一幅《二闸修禊》图，描绘了烟柳迷茫的三月二闸美丽的景色。在满族民间文学子弟书中，有一篇《阔大奶奶逛二闸》，细致描摹了满族贵妇逛二闸的整个过



二闸泛舟



二闸修禊（采自《鸿雪因缘图记》）

程，文字浅显易懂，读来饶有兴味。引录如下：

命仆从前往渡头将船雇，买了些爆竹花鸭作乐游。带了些美味干鲜果品，预备着对景开怀遣兴幽。众家人船中陈设多齐整，这佳人香车慢下弃岸登舟。丫嬛连忙铺下坐褥，佳人坐定吩咐开舟。不多时清风阵阵吹人面，仿佛身从镜内游。真可喜新晴一派清凉景，远望郊原豁倦眸。傍岸野花香气放，沿堤杨柳翠烟浮。迢迢载米船来往，款款寻泥燕子幽。观不尽水秀山青天然古画，却喜那波光掩映荡轻舟。三忠祠选胜任来争唤酒，得月轩叫会声喧过渡头。弦管嘈杂三块板，笙歌宛转韵偏幽。柳阴时看垂钓客，花间笑语踏青畴。这佳人画舫已过芦花岸，观不尽水色连天霞色浮。又则见两岸高桅排燕翅，见船家拽缆停舟到渡头。寻茶社雅座偏宜如意馆，近水滨料看相对望东楼。这佳人斜倚栏杆观佳景，一望山河爽二眸。又则见几个儿童浮水面，盼望着下水摸钱把客兴留。这佳人春扇轻摇消永昼，光分银汉日映中流。不多时夕阳欲下催归棹，两岸边鸟韵悠扬绿树头。渡头前从新把香车上，前后围随进了皇州。^①

二闸一带，游人群聚，难免鱼龙混杂，出现一些丑恶现象。二闸附近有一座灵官庙，尼姑广真住持，时人称之为广姑子。道光中叶，其庙香火极盛，又靠近二闸，游人众多。广真在庙内招妓设赌，贵族子弟多在此嫖妓、赌博、吸食鸦片，胡作非为，可谓“黄赌毒”俱全。历时数年之久，风声极大。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被御史举报，“参军统领派弁往抄，适值广真作寿，来宾甚盛，因而俱罹

于难。”^②其中牵涉到庄亲王奕劻、辅国公溥喜、镇国公绵顺等王公大臣。道光帝一时震怒，几人的爵位都被革除，广姑子被刑部判罪发遣，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当时就有好事者将此事编成子弟书《绪（续）灵官庙》^③，到处传唱。

进入民国后，随着运河航运业的衰落，二闸作为风景名胜区也随之衰落了。待到1927年沈从文先生写下著名的散文《游二闸》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讨钱的戏水儿童了。童谣所唱：“劳您驾，道您乏，明年请您游二闸。”也已成为明日黄花的往事了。

①（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东内外》，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2页。

②⑤（清）佚名编：《人海诗区》卷一《桥闸》，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23页，第131页。

③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东内外》，第85页。

⑥（清）戴璐：《藤阴杂记》卷十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3页。

⑦（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卷十二《郊坰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49页。

⑧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引《侧帽余谭》，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51页。

⑨⑩⑬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4页。

⑪⑫⑱《北平风俗类征》引《京华春梦录》，第352页。

⑲⑳（清）王述祖：《二闸竹枝词》，载《余园诗稿》，转引自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7页，第216页。

㉑（清）震钧：《天咫偶闻》卷八《郊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7页。

㉒（清）得硕亭：《草珠一串》，载《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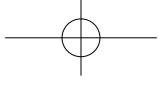
㉓（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出版社，1961年，第72页。

㉔（清）完颜麟庆：《鸿雪因缘图记》第一集上册，道光丁未年七月扬州刻本。

㉕北京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辑校：《清蒙古王府藏子弟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第111～112页，第306～309页。

㉖《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第20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从明、清北京孔庙祭孔 析清代尊孔

常 硕

北京孔庙是清朝统治者供奉和祭祀孔子的最主要场所。作为朝廷敕建的孔庙，它充分体现了当时统治者对孔子及儒学的态度。因而，对北京孔庙的研究很多。本文仅从北京孔庙的祭祀情况入手，通过所见实物资料及文献资料来研究清代统治者对孔子及儒学的态度。

一、北京孔庙现状

北京孔庙始建于元代，经历明、清两朝修葺扩建，形成今日规模。它是元、明、清三朝皇帝尊奉孔子、举行祭祀孔子典礼的地方，在全国各地的孔庙中等级最高，属于国家级的坛庙。它位于东城区国子监街，坐北朝南，主体建筑自南向北依次为先师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门、崇圣祠，构成了一条由南向北的中轴线，并在中轴线两侧建有殿堂，对称布局。^①

北京孔庙为三进院落。一进院东厢有宰牲亭、井亭和神厨，西厢有致斋所、神库，并有持敬门与国子监相连，构成“左庙右学”规制。大成门与大成殿之间为孔庙第二进院落，是孔庙的中心院落。中间一条笔直甬道连通大成门与大成殿，院落两侧有东庑、西庑。东西庑北端有东西掖房，南端有祭器、乐器库。大成殿为孔庙中最主要建筑，是供奉孔子神位、祭祀孔子时皇帝行礼的地方。大成殿内的祭孔供桌上摆放着笾、豆等祭器及编钟等乐器，是康熙时期的御制真品并刻有铭文，是国内仅有的保存最完整的皇家祭孔器具。第三进院为崇圣祠，由崇圣门把它与第二进院落隔开，是祭祀孔子先祖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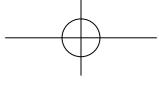
今天的北京孔庙是保存完好、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皇家祭祀建筑群，从中人们可以领略到皇家古建筑的非凡气派，感悟到孔子思想和儒学文化在中国封建王朝中的至高地位。

二、浅析明代祭孔

祭祀是古代最重要的大事之一，是人们通过某种仪式，表达对逝去之人的崇敬和追思。在祭祀中，由国家进行祭祀或者由皇帝亲祀是至高无上的尊荣，显示了祭祀对象地位的高贵。所以，祭孔仪式的沿革最能反映历代统治者对孔子的态度。

关于祭孔仪式的程式，历代有所不同，时至明代遂成定式。《钦定国子监志》记载：“成化十三年闰二月丁丑，释奠初用八佾，笾豆各十二”^②。佾，意为行列。佾舞最初是一种礼仪性的舞蹈形式，此种舞蹈行列整齐，跳舞时应以歌诗，一字一舞，以俯仰顿措的姿态配合着诗章字眼的含意。后经过演变，发展成为古代宫廷乐舞，依据等级限定人数，分别在祭祀天子、公侯、大夫等的演出。这里所说的“八佾”，八人为一佾，八佾共计六十四人。《左传·隐公五年》记载“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③。由此可知，佾舞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为“二佾”、“四佾”、“六佾”、“八佾”，其中最高等级为“八佾”，“八佾”舞只有天子才可以使用。在《论语·八佾》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鲁国大夫季氏本该用四佾舞，却僭用八佾舞，孔子听闻此事，气愤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可见佾舞为封建等级制度的一个重要载体，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不仅严谨，且作为人们生活、行为的准则深植人心。

嘉靖年间，大学士张璁根据明世宗旨意拟出的孔子祀典改制提案交礼部，会内阁、詹事府、翰林院诸臣议：“人以圣人为至，圣人以孔子为至。宋真宗称孔子为至圣，其意已备。今宜于孔子神位题至圣先师孔子，去其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改大成殿为先师庙，大成门为庙门。其四配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门弟子，皆称先贤某子。左丘明以下，皆称先儒某子，不复称公侯伯。遵圣祖首定南京国子监规制，



制木为神主，仍拟大小尺寸，着为定式。其塑像即令屏撤。春秋祭祀，遵国初旧制，十笏十豆。天下各学，八笏八豆。乐舞止六佾”^④。于是，自嘉靖皇帝开始，实行了抑孔政策，孔子的地位降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降孔子谥号。通过上文中提到的“去其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宋真宗称孔子为至圣，其意已备”，“今宜于孔子神位题至圣先师孔子”等内容，可以看出明嘉靖年间统治者实行了抑孔政策，变更孔子谥号，除去其王号和大成、文宣等称谓，改称孔子为“至圣先师”，从而在谥号上降低了孔子的地位。

2、大成殿降为先师庙。大成殿为祭祀孔子之所，孔子既不称文宣王，其祭祀之所等级必然相应有所降低，因而“改大成殿为先师庙，大成门为庙门”，依据其谥号等级降低其祭孔之所的建筑规制。

3、毁塑像，用木主，去章服。明初祭孔为木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改用塑像替代木主祭孔。与塑像配套出现的是章服，明朝依宋、元两代旧制，孔子用天子冕服。嘉靖年间，改用木主替代孔子塑像，免去孔子章服，这就如同削去孔子王号。此外，孔子木主规格较洪武年间有所降低。洪武年间“定大成文宣王木主，长三尺三寸五分，连上云、下座，共五尺二寸；阔七寸，连左右云，共一尺一寸五分”。嘉靖九年（1530年）改制，“定至圣先师木主高二尺三寸七分，阔四寸，厚七分；座高四寸长七寸，厚三寸四分。四配、十哲、先贤、先儒之木主俱如是”。

4、减祀仪。这主要是乐舞等级及笏、豆数量下降。笏、豆合为古代祭祀、燕享时所用的器皿，笏为盛储果品的用具，豆为盛储肉酱的用具，后演变为原始礼器的基本组合，依据受享之人等级不同而用不同的数量从多至少严格区分。明初祭孔为“乐舞八佾，笏豆各十二”。嘉靖年间，祭孔降为“春秋祭祀，……十笏十豆。天下各学，八笏八豆。乐舞止六佾”。孔子地位明初由“天子八佾”降为“诸侯六佾”。

三、浅析清代祭孔

满清贵族入主中原一统海内，主要是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其文化形态远远落后于历史悠久的中原汉族文化。为了巩固统治，顺治皇帝实行了用“汉法”，崇儒兴学的基本政策。顺治九年（1652年），“世祖章皇帝视学，亲诣先师庙释奠”，“王、公、百官，斋戒陪祀”。清

朝历代皇帝开始尊孔祭孔，并给以其极大的重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圣祖“至大成殿，行三跪九叩首礼”^⑤。雍正四年（1726年），“世宗亲诣释奠。初，春秋二祀无亲祭制，至是始定。……明年（雍正五年，1727年），定八月二十七日先师诞辰，官民军士，致斋一日，以为常”^⑥。至乾隆朝，清代祭孔发展到一个高峰。此时清朝国力强盛，文化繁荣。乾隆皇帝本人更是自小受儒家文化熏陶，对孔子和儒学倍加推崇敬慕，于是此时的祭孔大典极为隆重。《钦定国子监志》记载：“先期一日，乐部设中和韶乐于大成殿外阶下，分左右悬……皇帝御祭服，乘礼舆出宫，前引后扈如常仪……皇帝至庙门外降舆，赞引太常寺卿二人恭导，由中门入，至更衣大次少憩……赞引官恭导皇帝入大成门中门，由中阶升，入殿中门，至拜位前，北向立。太常寺赞礼郎引分献官至阶下，夹甬道立。鸿胪寺官引陪祀王公在殿外阶上，百官阶下，左右序立，均北面……文舞六佾进，皇帝就拜位立，迎神……皇帝立上柱香，次、三上瓣香……皇帝行二跪六拜礼，王公、百官均随行礼……送神，皇帝率群臣行二跪六拜礼……恭导皇帝由大成门中门出……至庙外，陞升舆”^⑦。根据文献记载，可以知道，清代祭孔仪式共分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饌、送神六部分，并配以乐舞，场面恢弘。到了清朝中后期，遂显衰败之势。嘉庆、道光二帝虽仍然仿效其先祖亲诣释奠、临雍讲学，但底蕴已大不如从前。至清朝末期，大清帝国走至尽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虽然废除科举制，设立京师大学堂，执行“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之策，但仍然尊孔祭孔。更是在第二年，逆势而行，提升祭孔典礼为“大祀”，使尊孔的规格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清王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仍想用尊孔来挽救其灭亡的命运，把孔子看作最后的救命稻草，其尊孔之策可谓是贯彻得有始有终，但这也充分暴露了自清朝入关，清政府以尊孔来巩固维护封建统治的真实目的。

（一）皇帝亲祭

皇帝亲祭是祭祀的最高形式，清代祭孔不同于明代遣官告祭，常采用帝王亲祀的形式。《钦定国子监志》记载：“顺治九年（1652年），……世祖章皇帝视学，亲诣先师庙释奠。顺治十七年（1660年）……以修葺先师庙工成，亲诣先师庙释奠。康熙八年（1669年）……圣祖仁皇帝视学，亲诣先师庙释奠。雍正二年（1724年）……世宗宪皇帝视学，亲诣先师庙释奠。……乾隆三年（1738年），高宗纯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⑧由此可以看到自顺治开始，清代每位皇帝均亲祀孔庙，到了雍正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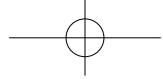


图1 康熙孔庙御笔题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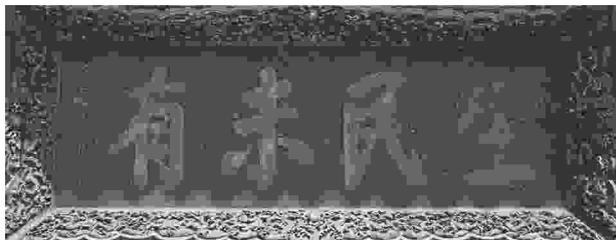


图2 雍正孔庙御笔题匾



图3 乾隆孔庙御笔题匾



图4 嘉庆孔庙御笔题匾

期，更是一改明代遣官祭祀的旧制，把皇帝亲祀孔庙定为规制，由此，皇帝亲祭孔子成为定制，其后历任皇帝皆需遵循。清代帝王亲祭孔庙次数之多，时间之久，是历代王朝所不能达到的。

（二）遣官告祭

除皇帝亲祭孔庙外，遣官告祭也是清朝祭孔的一大特色。遣官告祭是由皇帝亲点品级较高的亲王、官员或者宠信之臣，到孔庙告祭孔子。这是皇帝亲祭的一种补充。每当平定叛乱、祈求丰年、皇帝及皇太后逢十大寿、皇帝及皇后升配礼成、皇帝登基逢十大庆、皇帝南巡，甚至立国储、立正宫等，皇帝都会遣官告祭。《钦定国子监志》记载：“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诏升配朱子于大成殿，为十一哲。遣官至国子监，告祭先师孔子及朱子位前。……雍正元年（1723年），诏封孔子先师五代为王，遣大臣至国子监告祭。……乾隆二年（1737年），诏国子监文庙易用黄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诏大修国子监先师庙，遣大学士告祭。”^⑨

频繁的皇帝亲祀和遣官告祭显示了清廷将孔子思想视为正统的力度。清帝王将自己的决策、功绩、国事、家事，都禀告孔子，一方面显示了清代帝王对孔子的尊崇；另一方面，清政府通过告祭孔子在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及普通百姓中树立了自己秉承正统、遵礼制、以德立国的形象，从而进一步消除了不同民族间的隔阂。

（三）御笔题匾

清朝祭孔的另一特色就是御笔题匾。孔庙是极为庄严肃穆的地方，匾额和楹联极少。另外，由于孔子堪称文圣，所以即便是文学大家也不敢在此题匾。正因孔子的地位如此之高，因而只有帝王才有

资格在孔庙内题写匾额。自清代康熙皇帝开始，清历任皇帝即位，必亲临国子监辟雍讲学，称为“临雍”。随后到孔庙大成殿悬匾一方，并要求各地孔庙仿效摹制。孔庙匾额自康熙至宣统依次为：万世师表、生民未有、与天地参、圣集大成、圣协时中、德齐畴载、神圣天纵、斯文在兹、中和位育九块牌匾。

“万世师表”（图1）是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御书，意为孔子是千秋万世的老师和表率。

“生民未有”（图2）是雍正皇帝于雍正三年（1725年），御笔题书。语出《孟子·公孙丑》：“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⑩意为自有生民以来，世上就只出现了这一位圣人。

“与天地参”（图3）是乾隆皇帝于乾隆二年（1737年）御书。语出《中庸》：“唯天下至诚……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朱熹注：“与天地参，谓以天地并而立三也”^⑪。（古参、叁通用）意为孔子地位与天地并列。

此三块牌匾逐渐提升孔子地位，由最初的称赞孔子品德才学，发展为孔子与天地同辉，给予了孔子极致的赞誉。由此可见，清前期统治者一改明代抑孔政策，将孔子定位于人间至圣、与天地并立的地位。

“圣集大成”（图4）是嘉庆皇帝于嘉庆四年（1799年）御题。语出《孟子·万章》：“孔子之谓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者，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⑫这里用音乐作比喻：孔子善于把单个的音符，按音乐规律组成美妙的乐章，意即孔子能把古圣先贤的美德集于一身，形成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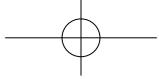


图5 道光孔庙御笔题匾



图6 咸丰孔庙御笔题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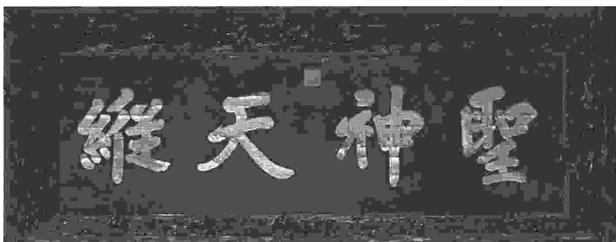


图7 同治孔庙御笔题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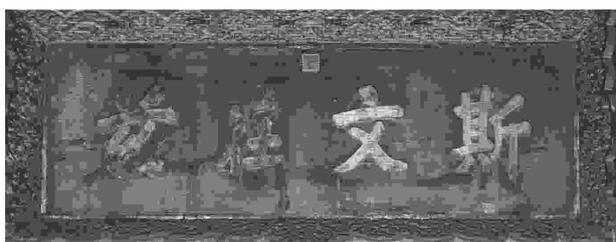


图8 光绪孔庙御笔题匾

的学术思想。

“圣协时中”（图5）是道光皇帝于道光元年（1821年）御题。语出《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朱熹注：“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又“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①意为孔子的学术思想，个人情操，都是符合中庸之道的，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能顺应时代潮流，合乎客观实际。

“德齐畴载”（图6）为咸丰皇帝于咸丰元年（1851年）御题。语出《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无不持载，无不覆畴。”^②畴为多音字，这里读“道”，覆盖的意思。此极言孔子之学术思想和个人品德，可以经天纬地，无所不包，完美无缺。

“神圣天纵”（图7）是同治皇帝于同治元年（1862年）御题。语出《孟子·尽心下》：“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程子注：“圣不可知，谓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测。非圣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③又《论语·子罕》：“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耶？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降圣，又多能也。’”^④这里的意思是：孔子是顺应天时、应运而生的圣人，所以他的知识是很渊博的。

“斯文在兹”（图8）是光绪元年（1875年）光绪皇帝御书。语出《论语·子罕》：“子谓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将之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朱熹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⑤（“后死者”孔子自称之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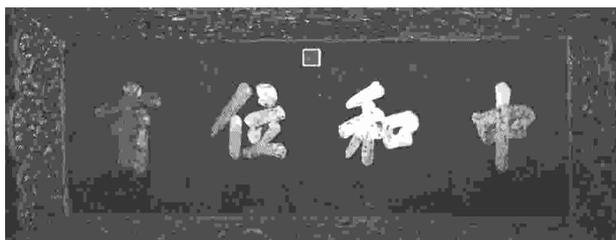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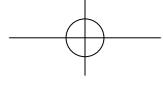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图9 宣统孔庙御笔题匾

“中和位育”（图9）是清末代皇帝宣统于1917年题书。在《中庸》中记载的“中和位育”，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⑥中和，和合，是天地万物存在、发育的规律，是儒家协调和谐思想的概括。

上述六块匾额赞誉了孔子的学术思想和个人品德，强调孔子的学术主张顺应天时，符合时代潮流，其人知识渊博、品德高尚。

通过浅析清代九块皇帝御笔题书匾额，可以看出清代自康熙皇帝始，历任帝王都对尊孔给予极大重视，通过题写匾额赞誉孔子的品德和学识，给予孔子极高的评价。御笔题匾浓缩了清代统治者对孔子的尊崇和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不仅单纯的赞扬了孔子知识广博、学术精深，更把孔子思想提升到了适宜社会发展、顺应天时的高度，其内容和形式均达到了较高的思想境界，体现了清代帝王对孔子的重视和尊崇。

通过追述明、清二代统治者尊孔、祭孔情况可以看出：清代统治者一改明代抑孔政策，大力赞誉孔子德行，频繁提升孔子地位，对孔子的尊崇远高于明代，甚至是中国历代前所未有的。孔子在清代具有至高的地位——与皇帝同尊。无论哪个朝代，



北京史地

都未有如同清代这般尊崇孔子之制。这主要是因为清代为少数民族政权，为了维护其统治，安抚广大汉族人民，他们需要实行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法”治国。经过推行汉法，清朝统治者看到了汉法的先进性。首先，儒家思想不同于“黄老之学”的“避世”思想，儒学提倡“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这就有利于为清朝统治者提供优秀的“治世”人才来治理国家。满族贵族初入中原，缺乏治国人才，尤其缺乏汉族的治国人才。儒家思想鼓励儒士为朝廷效力，这正符合清朝统治者的需要，解决了他们初入中原，无人可用的难题。其次，儒家思想崇尚“君臣父子”的伦理观念，强调“忠孝”观念，这既为清朝统治者解除了“能者治天下”，百姓起兵造反的后顾之忧，又缓解了士人对清政府的矛盾与敌视，并在潜移默化中使他们接受满族统治，效忠于清廷，使清政府可以安心的任用儒士为他们治理天下。第三，满族贵族认为儒家学说被历代统治者所尊奉，是统治者正统地位的标志。作为外族入主中原，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向广大中原人民证明其统治的正统性，采取了尊孔崇儒、沿用儒学作为全社会指导思想的治国策略。于是，清朝统治者以儒学为立国之本，封孔子为人中至圣，以儒学、孔子这一大宗来束缚百姓思想，规范百姓言行，让儒学成为百姓心中唯一信仰，从而通过控制儒学，来控制百姓，禁锢百姓的思想，维护其统治地位。因而清统治者大力提倡尊孔崇儒，甚至到了清晚期，由于社会变革、国力衰微、国内各种思潮涌现等种种原因，清政府更是把孔子作为另一位人间帝王来尊崇，企图通过对于尊孔之制来控制人们思想，挽救衰微的统治。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清朝统治阶层通过实施尊孔崇儒这一国策，在入关后逐渐笼络了人心，特别是博得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好感和信任，稳定了政权，巩固了统治，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不同民族思想意识上的差异和隔阂。

时值今日，孔子及儒家思想依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所蕴含的一系列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仍然无处不在，并不断地为人们提供智慧和启迪。儒家文化之所以会如此经久不衰，一个方面是统治者的扶植，但更重要的是儒家文化自身的特质适应了人们两千多年来的需求。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经过五百余年的战乱，国家需要统一，人们需要安定。此时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其历史责任，即面对混乱不堪的社会，应该如何使其有序、安定。就在这种大背景下，以孔子

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应运而生。他们以治世为根本，以建立一个和谐、有序、安定的社会为终极目标。这就符合了广大人民希望和平、要求安定的社会需求。孔子提倡人们应投身到社会中去，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治世，从而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这就与今天我党提出的建立安定和谐的社会不谋而合。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许多思想都是不受时空局限的。

因而，我们应该继承和完善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有机、恰当的结合起来，为当今所用。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积淀，它已经溶入中国人民的骨血之中，只有对其精华部分予以继承和弘扬，才能更好的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屹立于世界之林。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时代，更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随着世界交流的不断加深，儒家思想必定在世界范围的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①首都博物馆：《北京孔庙》，今日中国出版社，2001年，第8页。

②[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27《礼志三》，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18、419页。

③王伯祥选注：《春秋左传读本·隐公五年》，中华书局，1974年，第12页。

④[清]张廷玉：《明史》卷50《礼志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1299页。

⑤⑧[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25《礼志一》，第381页。

⑥[清]赵尔巽：《清史稿》卷84《礼志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2535页。

⑦[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25《礼志一》，第395页。

⑨[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30《礼志六》，第433、434页。

⑩[清]焦循：《孟子正义·公孙丑》，中华书局，2004年，第288页。

⑪王媛、徐阳鸿译注：《大学·中庸》，广州出版社，2004年，第148页。

⑫[清]焦循：《孟子正义·万章》，第672、673页。

⑬王媛、徐阳鸿译注：《大学·中庸》，第12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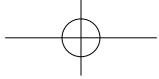
⑭王媛、徐阳鸿译注：《大学·中庸》，第154页。

⑮[清]焦循：《孟子正义·尽心下》，第994页。

⑯⑰《论语·子罕》，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第66页。

⑱王媛、徐阳鸿译注：《大学·中庸》，第189页。

（作者为国家大剧院艺术品部项目主管）



妙峰山古香道中北道漫考

王晓军

从明末至清、民国时期，中国北方京津地区香火最为旺盛的宗教场所，应该就是以供奉天仙圣母碧霞元君为主的妙峰山娘娘庙了。据《燕京岁时记》记载：“妙峰山碧霞元君庙在京城西北八十余里，山路四十余里，共一百三十余里。地属昌平。每届四月，自初一日开庙半月，香火极盛。……庙在万山中，孤峰矗立，盘旋而上，势如绕螺，前可践后者之顶，后可见前者之足。自始迄终，继昼以夜，人无停趾，香无断烟。奇观哉！”^①而当年去往妙峰山进香的古香道有多条，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应该是起点位于北安河的这条中北道。在《燕京岁时记》一书中，这样写道：“进香之路日辟日多。……近日之最称繁盛者，莫如北安合（河）。人烟辐辏，车马喧阗，夜间灯火之繁，灿如列宿。以各路之人

计之，共约有数十万。以金钱计之，亦约有数十万。香火之盛，实可甲于天下矣”。^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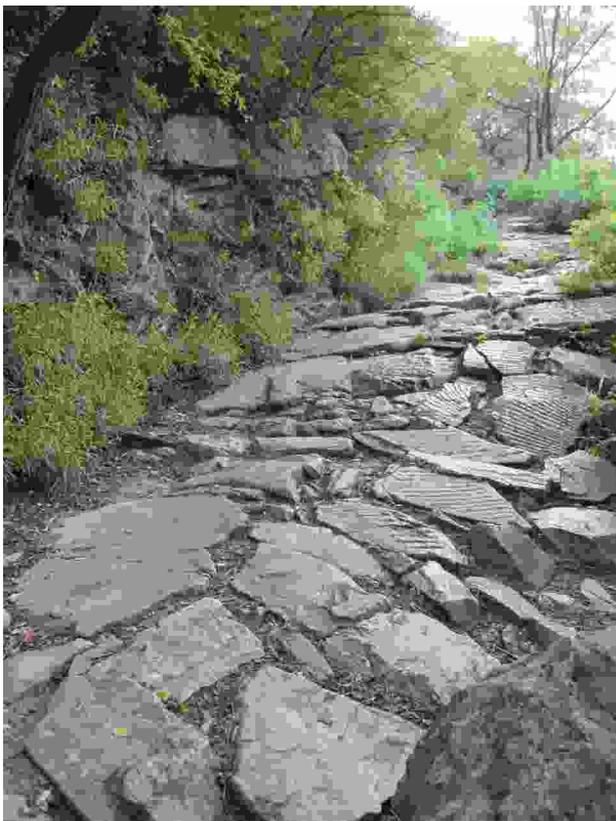
1925年著名民俗学者顾颉刚先生以妙峰山及其古香道为基地，开创了近代民俗学研究野外调查的先河，是中国近代民俗学野外调查研究的发祥地，因此这条古香道一直为中国民俗学界所关注，并不断有民俗学者考证和研究，留下了许多研究这条古香道的学术专著。其中著名的有奉宽的《妙峰山琐记》、顾颉刚的《妙峰山香会调查报告》、金勋的《妙峰山志》以及近年常华的《妙峰香道考察记》等等，这些都为今人研究妙峰山及其古香道的民俗活动留下了宝贵财富。

本人曾在海淀从事多年文史研究工作，曾经多次对位于海淀西山的妙峰山古香道进行过实地考察，向当地居民进行口碑调查，并查阅了大量相关的历史资料、碑刻文献，从而对这条妙峰山古香道的变迁情况有所心得，现将古香道之中北道的近年变迁情况，以及前人研究的一些未尽之处加以补考研究，具体考察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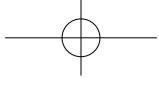
一、妙峰山古香道中北道概况

据相关史料记载，自山前去往妙峰山进香有多条山道可到达，但最为著名的应该有四条，即位于今天海淀区凤凰岭的老北道、北安河阳台山的中北道、徐各庄大觉寺的中道，以及位于门头沟区担礼的南道。《妙峰山琐记》记载：“四条进香山道，南道山景幽胜，中道、北道亦佳，中北道次之。以道里计，则中道最近，中北道稍远，北道又远，南道最远”^③。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四条古香道中从门头沟区担礼开始的南道，已大部分修建为公路，可以直接到达妙峰山山顶，原来古香道的景色已风光不再。位于海淀区的三条古香道中，地处大觉寺的中道和凤凰岭的老北道，因为当年中北道设施完备，道路齐整易行，香客多从中北道前往妙峰山而少有



中北道古道



北京史地

人行于此，因此这两条道就冷落下来，日渐荒废。现在所遗留下来的茶棚等古迹遗址，更是与中北道无法相比。在今天经济发达、旅游兴起时，也未能得到重视和开发，远不及中北道假以阳台山风景区之名，得到较为全面的旅游开发而日渐复兴。

从历史资料记载看，中北道自北安河到妙峰山，路途里程全长约为40华里，根据山势自然环境分为4段路，民国时期的金禅雨《妙峰山指南》中，记述中北道山路里程情况如下：“北安河4里——响福观3里——朝阳院1里——金仙庵8里——玉仙台（瓜打石）8里（中间最难走，山势奇陡，俗称三瞪眼）——庙尔洼8里（下行）——三岔涧（俗称涧沟）5里——灵官殿3里——妙峰朝顶。”^④

在去往妙峰山的众多香道中，位于北安河的中北道从自然景色到旅途行程都不是最佳选择，为何这条古道反而成为最为著名、最为繁盛，以至今天依然最有影响力的一条进香古道，究其原因应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1、沿途古迹历史悠久：从现存的古迹情况看，这条古香道上的古迹，最早的应该在辽金时期就已经存在，金仙寺（金仙庵）、朝阳院等有着浓厚的辽金时期建筑布局的特点，现存的古银杏树应为千年左右辽金时期的遗物。寺院有明确的碑刻记载是在明代，但为此时的重修碑，其初建年代则应更加久

远。这已充分证明最迟在明代以前，这里宗教活动就已存在。据当地老乡讲，这条古道不仅是妙峰山地区居民进出的要道，也是京西通往河北、山西、内蒙古的通道之一，在明代时就已经存在，可见其历史的悠久。

2、设施完备活动丰富：《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称此道“山道颇不坏，两旁都有路灯。自此处（北安河）至金顶圣母殿的香路共分六段，每段都有茶棚，相隔八里”。^⑤特别是在每年的香会期间，自山下村落到古香道沿途，不仅各段茶棚都有舍粥、饮食供应，还有轿夫、山货供应服务，以及各种民间花会表演等文化活动，为香客的进香活动提供了方便和兴致。

3、道路修建齐整畅达：现存的中北道古香道全长约40华里（20公里），大部分道路还保留着当年选用当地的青石，择平面作为下脚处，逐次铺砌成的石阶。实地考察可以看出，自北安河到金山寺茶棚，工程做得很齐整，表现出当时较高的水平，因此有“金阶”之美誉。路程的设计也是依山而进，有的路段，如平三里，表现出劈山开路的痕迹。而且一路上大部分路程都较为和缓，因此行走起来较为顺畅，是所有妙峰山古香道中行走最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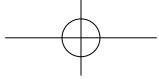
4、因慈禧太后从此进香而更有影响力：妙峰山，供奉以“天仙圣母碧霞元君”为首，包括子孙娘娘、送生娘娘、斑疹娘娘、眼光娘娘等五位娘娘，已形成集道、佛、儒、民间俗神为一体的综合庙宇群。当时是吸引近如京城、天津，远到浙江、川贵、湖广以至日本、东南亚的善男信女，前来朝山进香的宗教圣地，有着悠远的影响力。晚清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载，“每届四月，自初一日开庙半月，香火极盛”。^⑥特别是到了清末，慈禧太后曾经由此道到妙峰山进香，影响更为深远，至今在妙峰山娘娘庙还有慈禧太后题写的“慈光普照”匾额。妙峰山成为上至皇家、达官，下至普通民众都信奉的宗教场所。



古香道新貌

二、妙峰山古香道中北道近年变迁情况

妙峰山古香道自明末至清、民国时期，兴盛数百年，但随着时代变迁，也不可避免的盛极而衰，日渐荒废。时至今日，另外几条古香道已是建筑尽毁，道路断续，旧迹无多。唯有中北道在近年开发的基础上，原有景观得到部分恢复，但大部分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在自阳台山风景区入口处至海淀区西山最高峰阳台山的这段古香道，基本上原状还得以保留，自北安河村至阳台山风景区入口处的



阳台山骆驼石

这段，大部分已面目全非了。

中北道的起点是在山下最大的村落北安河。北安河是大西山沿线最大的村子之一，历史悠久。据大觉寺现存的辽碑记载，此时该村就已存在，名为北安窠，后来名为北安河。在村南还曾发现有汉代的窖藏，可以印证很早以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明清时期，这里已成为北京西部一处交通重镇，在村落中各种文化融汇，民俗文化尤为浓厚，最多时村中寺庙达十余座，现在村中留有痕迹的还有五六座，其中很多都与古香道进香活动有关。近年位于村中主要广场前的关帝庙，已重新修缮，而这座寺庙就是当年妙峰山进香时中北道的第一站。这座建筑的保留恢复，为我们研究妙峰山古香道中北道的行程及相关的民俗活动，提供了直观的实物资料。

沿着其北侧有一条长街，一直向西可以延伸到村的西口，街的两侧建筑形态基本保持着原貌，可以清晰地看出当年进香古道穿行村中的痕迹。在今后村落的发展中，应及时对这条街道进行规划，尽最大可能的保留下进香古道的形态，使古香道从形式上得以保留。

穿过村子向西北，是一条山水冲击而自然形成的河沟，古香道从此河沟的北侧继续向上，原来从这里就已砌有石板道，但随着村子的扩容，这里已盖满了房屋。

实际上这段古香道还有一部分得到很好的保留，这就是自四十七中学环谷园石桥前古松林为起点，沿环谷园南墙外山沟向上，进入到阳台山老年公寓范围内，到铁路的东侧这段。这段古香道经过修整，还基本呈现出古香道的原状，将古香道断续的加以体现。

据相关记载，自北安河村至第一道茶棚响墙茶

棚距离约8华里，保存完好的为铁道以西约2华里部分，铁道以东部分在修铁道时，拦腰切断，随着周边环境的变化，现在已很难看出还残存的部分，而且即使见到这段古道遗址，也很难将这段已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地方与饱经沧桑的古香道联系在一起。

从现存的古香道现状看，造成这段古香道缺失的原因，应是以下几方面原因：

1、该地段古香道距村落较近，古香道原来的痕迹就不很明显。在妙峰山香火渐息，进香古道日衰之后，村落扩展时未予以重视，无意中毁掉了这些历史遗存。

2、为了交通的方便，在对道路扩展时，未考虑原有道路保留对一个地区发展历史延续的参照意义，而是采取异地建设的方式，扰乱了今人的视线。现在城市建设中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对城市地理研究影响很大。

3、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过程中，如铁道线、森林防火道的修建等，强烈冲击了原有的历史原貌的存在，人为的割断了古香道的完整联系，切断后又未认识到其内在的连续性，将原有环境保留好，为今后研究这里的历史演变，提供相关的历史信息。典型的还有元大都土城遗址等，也同样是因道路修建而割裂为数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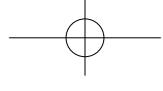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虽然中北道在很多路段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位于村落及其附近的地段，几乎已难辨识，但总的路段及相关的古迹遗址，还基本上保存下来，是去往妙峰山的数条古香道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条，是最为能够全面反映妙峰山进香民俗文化的历史遗迹。

三、妙峰山古香道中北道景观杂考

妙峰山古香道中北道在其发展繁荣时期，有着许多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这些景观使这条古香道形成了自己的特性和魅力。但因为多种原因，特别是经过多年的历史变迁，古籍史料的记载缺失，古迹遗址的地理环境已经混乱，有些古迹的历史沿革、变迁情况等，尚存疑问。在多年来本人对妙峰山古香道中北道的考察中，经过实地勘察，查阅史料，以及借鉴相关的口碑资料，对几处存疑，进行了梳理，并提出自己的认识。

1、关于金仙寺与金仙庵、金仙庵茶棚旧址的存疑

在中北道中，最著名的景观应该是金仙寺（金仙庵）了。在阳台山古香道前山中，有一处最大的山谷平台，平台之上现在还遗存有三处古迹遗址。



北京史地

这三处古迹遗址何为金仙寺、何为金仙庵、何为金仙庵茶棚，曾有着不同的观点。

主要观点认为位于平台之上，古香道北侧的那座坐北朝南四合式建筑院落，即金仙庵茶棚所在地为金仙庵旧址。而位于平台南端的那座，坐西朝东依山而建、并列着的三座五进院落组成的建筑群为金仙寺。金仙寺与金仙庵一庵一寺，为不同位置上的两处古迹。现根据碑刻史料记载及实地勘察，认为金仙寺、庵应为同一处古迹，只是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名称。

在明正德年间《修营金仙寺记》碑记载：“妙峰山陟而上之，矚台也。山之巔則金仙寺也。”^⑦此时已称其为金仙寺。清光绪年间的《金仙庵悟璋和尚碑记》可知此时已名为金仙庵，但此后又更名为金仙寺。碑中记载：“（清道光年间悟璋和尚）重修开山添建殿庭改名金仙寺”^⑧，从此中可知此处改称为寺的时间、年代，只是只知曾名为庵，现无资料可知何时名为庵。

而位于北侧的建筑遗迹则是后来古香道繁盛时期，在此增建的为香客服务的茶棚，因此地名为金仙庵，而称为金仙庵茶棚。在清同治九年（1870年）《妙峰山茶棚碑》中，有这样记载：“同治庚午春，有钟粹官范平喜处心发愿，鸠工葺补，数月之间一律修整，逾崖越蹬如履平地，人称便焉，顾道路既平而往返无憩息，爰于金仙庵下坎建立茶棚。”^⑨因此可知金仙庵在上，茶棚在下。

平台中间的遗址，则是民国年间修建的金山泉汽水厂的旧址。与金山寺、金仙庵无关，而今人附会此处为金章宗西山八大水院的金水院，未见任何史料记载，实难确认。

2、朝阳院茶棚与朝阳院之分

自骆驼石继续向上，平台上的建筑就是朝阳院茶棚。

茶棚为一座三合式院落，房屋有坐西朝东正房三间，南北各有配房三间。据记载此地为古香道第二座茶棚——朝阳院茶棚的位置，建于清道光年间，抗日战争时期被毁，1997年重建。这座茶棚有名是因为在这里原来供奉的神像不同一般，是一位传为宜子之神、半人半神、称之为“傻哥哥”的喜神神像。这里曾经有民国十年（1921年）李树谷撰并书的《傻佛爷出世记碑》，对此有记述。朝阳院茶棚是妙峰山中北道上一处独具特色的茶棚，因此很多人都认为这里就是朝阳院。其实，朝阳院茶棚与朝阳院是两处不同的古迹，朝阳院位于茶棚西北侧约100米之处的山坳中。

朝阳院是古香道路上一处规模较大、很有特色

的景点，只是由于其主要建筑主体位于古香道较远的地方，而且毁坏得较早，很多人都知道朝阳院，但对于其具体情况却少有人考察过，而在有关妙峰山古香道的考察史料、资料中，仅有寥寥数语，难以窥其全貌。在民国时期，北京著名旅行家李慎言在其所著的《燕都名山游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朝阳院“内古松夭矫侧出，状如游龙。殿前有流觞曲水，作圆寿字式。院后有塔，高约十数丈，明万历时建。”^⑩因此可知，这里至少在明万历年间就已经建设了，应早于古香道及朝阳院茶棚的建设。而从其名称及周边环境推断，在西山辽金时期的寺庙建筑多以院命名，如：黄普院、清水院、香水院等等，特别是在金章宗时期最喜游历的西山，在西山留下了著名的“西山八院”。至今大觉寺清水院、妙高峰香水院皆有明确记载，其余尚在考证中，而朝阳院与著名的金山泉相近，其院后为曾经泉水丰沛的冰壶沟，朝阳院或许就是西山中以水著名的辽金西山八院之一，也是极有可能的。只是因史料掌握有限，仅为推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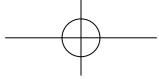
朝阳院的主院院落的围墙仍存，可以看出院落原来的范围，只是里面的建筑已经尽毁了，近时当地村民组织对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出一些建筑的基础痕迹。院落坐西朝东，依山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现在一层除了几间原来施工时的临时房，以及一些遗址清理出石构件、残碑碎片和渣土外，就是平地了。如有可能在对遗址进行全面发掘勘察基础上加以恢复，那将成为一处很有吸引力的景点。

在中北道上，朝阳院茶棚与朝阳院应分属为两处不同性质的古迹遗存，而不是一处古迹。

3、玉仙台 — 三瞪眼 — 瓜打石的情况

在中北道金仙庵上行约8华里（4公里）处，连续有三处著名景点，但在以往史料记载中，对这三处古迹的记录或是很简单，或是前后颠倒不很清晰。在奉宽《妙峰山琐记》中这样记载：“上路盖陡。再上，大石突兀，塞路如壁，自下视之，若无路通。至尽头处，柳暗花明，乃得曲径南转。如是者三处，名三瞪眼。山舆经此，前既转头，后者难于掉尾，故舁夫视为畏途。再上，为后膊子，北瞰深涧，摇人魂魄。”^⑪《北京妙峰山记略》载：“再进有巨石塞路，边道又险峻，俯视则行人蠕蠕，如蛇巡山腰，是奇观，亦险境也。每山轿经此，转头掉尾尤感不便。名曰三瞪眼者，谓须注视，且谓如此者有三处也。再进名为后膊子，平三里。”^⑫

而在实际中这三处景点布局，与前之记载却是略有不同，应该是这个样子：自“瞻云妙”刻石上行至高起的山脊处，古道正中有一处建筑遗址，这



里即为玉仙台茶棚遗址。因此处茶棚之上，有巨石名为“瓜打石”，而多将此处称为“瓜打石玉仙台茶棚”。不熟悉这里地理环境的人，多认为茶棚处即为瓜打石是错误的。自此再上，为一段崎岖艰险的山路，为此行中北道中最为艰险之处，即为当地人所称的“三瞪眼”（“三瞪眼”土名，为当地轿夫抬香客至此要转过三道险弯，因其奇险而使轿上香客三次紧张瞪眼而得名）。转过“三瞪眼”，上至又一座山巅，一方巨石横于道中，古人辟石为道，一侧为是巨石高悬道侧，一侧为万丈绝壁深壑，此石方为著名的“瓜打石”。

玉仙台茶棚、“三瞪眼”、“瓜打石”这三处景观遗迹关系之所以以前考察记述时未能准确，应是因为这三处相距较近，“瓜打石”、“三瞪眼”虽然著名，但均为当地约定俗成，没有当地人具体指证很难准确确定。

4、中北道上的奇石景观

在常华《妙峰香道考察记》中，多次提到在中北道上有“骆驼石”、“瞻云妙”、“瓜打石”三奇石。这三处独具特色的岩石，为古香道增色许多。其实在中北道上，三奇石外还有“过道石”、“壮儿石”、“饭台子”等几处颇具特色的巨石。

在经“瓜打石”过“平三里”后，路中横有一方无法绕行的巨石，只有从石中间辟出通道，古香道穿石而过，当地人形象的称之为“过道石”。也许是因为那方更具特色的“瓜打石”，很多人对“瓜

打石”一名不好解释，而认为是“过道石”的谐音而来，所以将其称之为“过道石”了。其实这方石称为“过道石”才是更为形象的。

在这条道上还有一方在奉宽《妙峰山琐记》中已提到的巨石“状元石”，书中记载：“再上，曰状元石，奇石粘空，玲珑欲坠。”^⑨在常华《妙峰古道考察记》中，何处为状元石无考。在“平三里”之后，将要上至十八盘的路侧，巍然耸立着一方巨石，这就是“状元石”。其实“状元石”是书中文雅的叫法，当地人则俗称之为“壮儿石”、“壮士石”。

“饭台子”相比之下就很一般了，这是从“状元石”上至“妙儿洼”茶棚路上，最艰难的十八盘途中，一处较为适于休息的岩石，约有5平方米左右，很平整。在人们艰难跋涉至此时可以休息、饮食，也可以在石上集体合影留念。称之为“饭台子”，就是因为可以将之作为吃饭的台子而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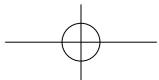
中北道路上有着许多独特的自然景观，只有亲身行此并有当地人讲述，才会有深刻的体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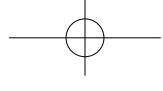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四、妙峰山古香道中北道自然风物散记

妙峰山古香道因其所处的西山地势具有独特的自然环境，生长着不同的植物，从而形成了不同的风物景致。在这些不同的自然风物中，最具有特色的是：野山茶（黄芪）、六道木、山杏、山里红等。



雪后朝阳院茶棚





北京史地

野山茶（黄芪）：它实际上是一种叫黄芪的中药材。

在西山古香道的路途中，上至海拔 800—1000 米左右高度，在山坡上自然生长着这种植物，当地人将其割下，切碎自然风干之后，作为一种茶叶沏水喝，因其野生在高山上，俗称之为山茶。这种山茶既经济，又可以消暑解暑、医治多种疾病，是一种天然的饮品。现在因为采摘的人多了，存在的已不是很多。在北京、河北山区的一些已经开发起来的旅游区，已有将其作为当地的土特产品进行开发。在这里如能将野山茶和茶棚结合起来进行旅游开发应是独具特色的。

六道木：六道木又称为降龙木。属硬杂木，其特点是坚硬、顺直，很适合于用其制成辅助登山的拐杖。一般有拇指粗细，表面有六道凸起的树棱，因此称为六道木。传说它还有辟邪的作用，山西五台山有很多降龙木做的佛珠和其他饰品。

此物生长环境特殊，一定要在海拔 600 米以上，还基本上生长在山的阴坡。有很多爬山的人把持有一根好的六道木做的拐棍，当作一种炫耀和自豪。在五台山、北京的潭柘寺、灵山等地都有卖的。这种木在西山古香道附近海拔高度 600—700 米的山坡上也有生长，当地人也有将其用作拐杖的，这也应该是古香道进香路上的一个特色民俗产品。

山杏：西山之中最有名的果树就是杏了，在妙峰山古香道中北道的途中，自然生长着成片的杏树林，每至早春时节漫山遍野开满了灿烂的杏花，在民国时期到西山古香道附近的大觉寺至管家岭一带赏杏花，成为当时很时尚的事，很多有名的文人墨客留下了吟咏杏花的诗篇。顾颉刚记到：“自妙儿洼西路下山，一路杏花满山，比苏州邓尉山的梅花更要茂盛。杏花丛中又间以白杨，风来时萧萧作响”。杏的果实也是名闻京城，最著名的品牌叫“玉巴达杏”，曾是“贡杏”，分为大玉巴达和小玉巴达，已有 200 多年的种植史，栽培历史悠久，自然形成了众多名特优品种，如：玉巴达杏、铁巴达杏、大白杏等，至今西山一带仍然生长着许多杏树，可见北京西山一带历史上曾经是杏树的原产地和栽培区。

杏肉不仅味美色艳、香气宜人，还含有大量丰富的营养物质，是一种非常好的水果，只是由于其果实成熟期太短，不易保存，果期很快就过去，因此现在这种果树正在日渐消亡。而在深山中生长的野山杏就不相同，果期较长，5、6 月上山行走在中北道十八盘时，还可以见到。因为这种山杏口感不太好，采摘的人少，因此掉落了在道上很多，其实，野山杏的杏仁营养价值很高，很多地方都已将其作

为当地的土特产开发了，可惜这还没有重视起来。而且现在因为多种原因，树种也在不断的减少。

山里红：又名山楂，是北方山中盛产的经济野果之一。

在西山之上，古香道沿线野生着许多这样的植物，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物质生活还不很丰富，那时生活在妙峰山的村民下山时，总是带着这些山里红，让山下的人很羡慕。上山进香的人也总是采买一些，作为礼物带回。现在物质生活丰富了，山里红的种植、品种很普遍，也就不稀罕了，但还是很怀念那些野生的果实，因为现在的产品，没有那时天然的果实味道纯正。现在古香道上的山里红确实不多见了。

中北道上还生长着玫瑰花、山樱桃、野酸枣等植物，也是有着盛名的。中北道上的这些自然风物，除玫瑰花已被门头沟涧沟地区恢复种植以外，其它的正在渐渐消失，也许不久也会如古香道上的茶棚、轿夫、花会等民俗活动一样，成为一个历史时期的一种记忆。

后 记

妙峰山古香道的中北道，作为当年到妙峰山进香古道中，使用时间最为长久、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条古道，因妙峰山香会的衰落等原因，也曾一度毁弃。现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妙峰山香会的恢复，古香道也正在逐渐的恢复、开发、利用，更多独具特色的历史遗迹、民俗文化，正在被发掘出来成为阳台山风景区的主要景区，古香道已成为人们探寻历史民俗、登山、远足、休闲的场所。

①②⑥ 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年 8 月，第 62—63 页。

③⑩⑬ 奉宽：《妙峰山琐记》，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929 年，第 21、43、45 页。

④ 金禅雨：《妙峰山指南》，名胜导游社，民国 25 年（1936 年），第 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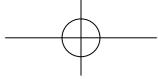
⑤⑩⑭ 常华：《妙峰香道考察记》，北京出版社，1997 年 12 月，第 28、39、51 页。

⑦ 《修营金仙寺记》碑，首都图书馆《北京记忆》网站《燕京金石》栏目。

⑧ 《金仙庵悟璋和尚碑记》，首都图书馆《北京记忆》网站《燕京金石》栏目。

⑨ 《妙峰山茶棚碑》，首都图书馆《北京记忆》网站《燕京金石》栏目。

（作者为原海淀区文化委员会副主任）



清代明黄色缎刺绣

夔龙拱福纹织成宝座垫套

的修复保护



清代明黄色缎刺绣夔龙拱福纹织成宝座垫套系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于西藏博物馆开馆之际的移交藏品，经相关人员初步鉴定为清雍正时期文物。由于西藏为全民信教地区，在其广大领域内遍布数量众多的佛教文物。此垫套就其用途来分析，应为高僧大德在进行宗教讲经说法、赐福、摸顶、商讨事情时盘坐的，由黄金包裹并镶嵌有诸多宝石的宝座上坐垫的垫套，因其特殊用途和保存条件的限制，该文物出现了大量油污及结痂土块。

一、文物状况

该垫套长 130cm，宽 126cm，高 15cm。整体材质酥脆；四角有很厚重的黑色油污，其余部分有土色的结痂，中间部分尤为严重；三个角都有破损处，分别约 11cm、13.5cm、5cm，其中一角有较新的裂口，约 20cm 长；另外有一处约 10×8cm 的补丁及多处小的破洞。绣线多处磨损缺失。

二、修复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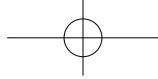
- (1) 分别取黑色油污和土色结痂的样品进行仪器分析检测，以确定其成分；
- (2) 由于文物材质脆弱，缝线部分尤其如此，因此将垫料的四边拆下，各部分分别清理，避免清理时损伤缝线部分；
- (3) 做脱色试验后用棉签蘸酒精擦洗黑色油污；
- (4) 用竹签清除土色的结痂；
- (5) 修补破损的地方；
- (6) 整形；
- (7) 按照原工艺缝合垫料的四边。

三、修复技术路线

1、分别取黑色油污和土色结痂的样品进行仪器分析检测。用傅立叶红外光谱分析黑色油污的成分，发现其成分很复杂，和西藏酥油的红外光谱对比，可看出黑色油污中有酥油的成分。用 X 荧光衍射仪检测土色结痂样品的成分，检测结果如下：

a. 分析结果：富含的物相： SiO_2 ，可能存在的物相有（可依据其他分析结果作最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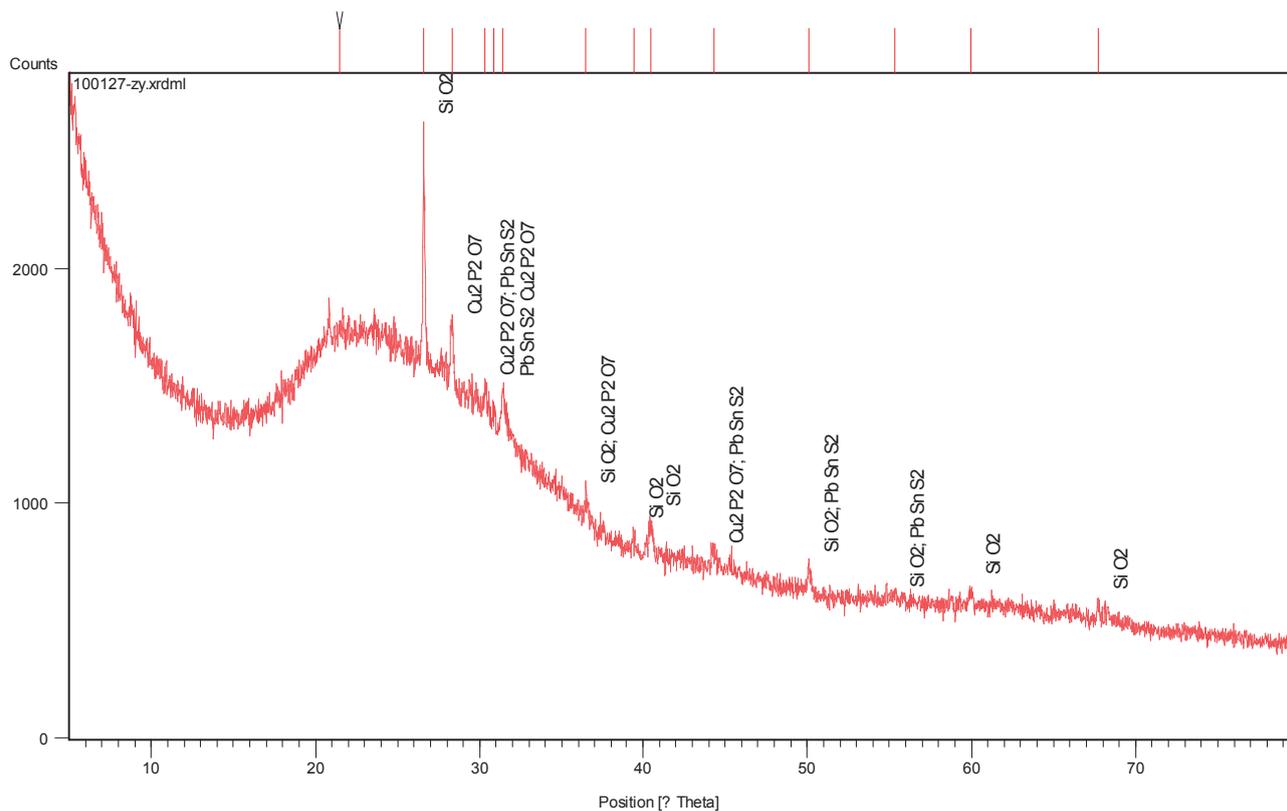
卫
国



文物保护

判定)：钾钠长石及 $\text{Ca}_2\text{P}_2\text{O}_7$ 等 (主要应为土壤成份)。

b. XRD 谱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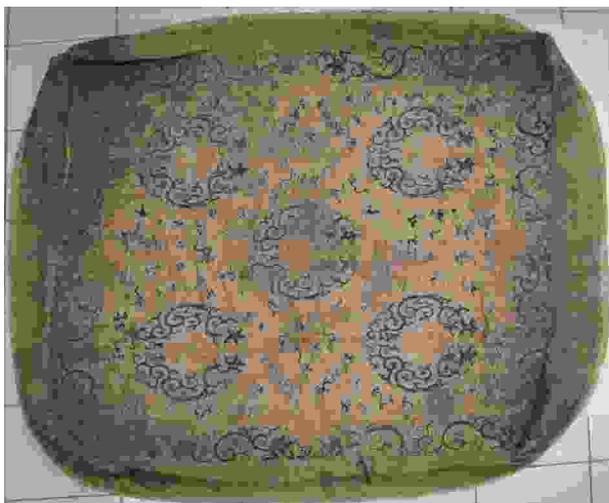
可见，这件文物上的污渍主要就是油污和土壤。

2. 对垫料的缝制工艺进行详细的书面和照片记录后，将垫料的四边拆下来。分别清洁垫料的垫心和四边。垫料的四边和垫心是用黄色丝线倒针缝

上的。

3. 用棉签蘸酒精在隐蔽的地方测试酒精是否会使垫料及其上面的绣线脱色，测试的结果是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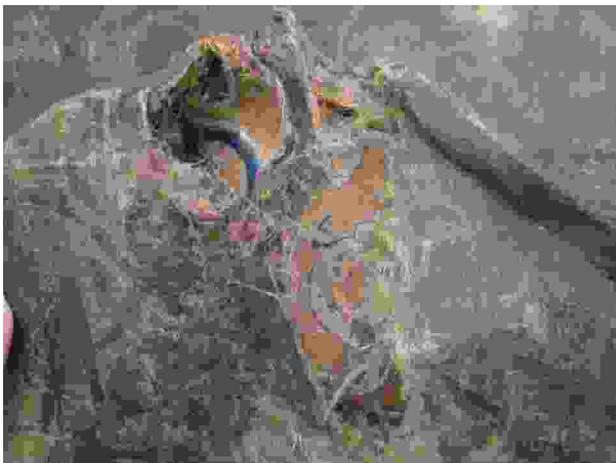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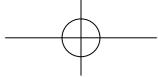
不脱色。酒精溶解性和渗透性好，对垫料上的油污有很好的清洁作用，又不会影响真丝文物本身。我们用棉签蘸着酒精清洗掉了几乎所有的油污。虽然碱性的洗涤剂对油污有很好的溶解作用，但是，碱性洗涤剂对丝绸也有很大的降解作用，因此我们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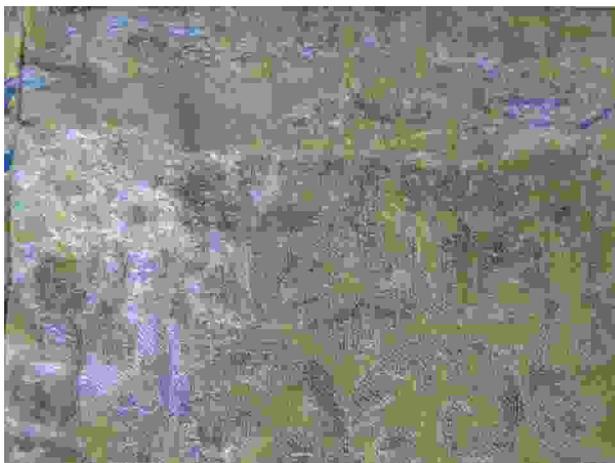
修复前垫套整体照



修复后垫套整体照



角处的破损



修复后破损

有选择用碱性洗涤剂。

4. 对于垫料中心结痂的土块，用竹签轻轻地剔除。

5. 油污和结痂都清除后，就把垫料放在溶有中性清洗剂的水中清洗，清洗掉深入到丝纤维中的污物。在清洗之前也做了脱色试验，结果证明水和清洗剂都不会使垫料及其上面的绣线脱色。我们对垫料的四边也进行了清洗。清洗后，按照垫料原来的尺寸固定好垫料，在低温避光条件下让其慢慢阴干。

6. 对垫料和四边整形后，修补破损的地方。我们选择了真丝电力纺作为修补破洞的材料，并染成和该文物的颜色接近的颜色。将染好的电力纺衬垫在破洞下方，用同色的丝线缝钉固定，并将散落的纬丝（经丝磨损）缝钉在其上。

7. 用黄色丝线按照倒针的方法缝合垫料的四边。

四、图案等研究

这件垫料的主要图案为五个团窠夔龙蝙蝠纹，每个团窠由两条相对的下行夔龙形成圆环将一只蝙蝠环在中间，垫料四周围绕夔龙，每边四条，分别相对、相背，夔龙图案间以祥云，夔龙形态矫健，凶猛。《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夔是古时代神话奇兽，生于东海流波山，“其状如牛，苍色无角，一足能走，出入水即风雨，目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名曰夔。”夔纹图案多见于商周青铜器上，明清时复古之风盛行，夔纹被重新应用，演绎为吉祥图案。在清代的万件纺织品上可见夔纹，如故宫

博物院藏夔龙夔凤锦等。

垫套的四边由几片不同图案的织锦拼接而成，有龟背纹和葡萄纹两种。葡萄纹是从中西亚传入中原的，在中西亚大部分地区气候干旱炎热，盛产葡萄，因此，葡萄纹被应用于各种工艺品，象征生命。据《西京杂记》载，汉时已有蒲桃锦。新疆民丰曾出土鸟兽葡萄纹绮，青海都兰也出土过葡萄纹绶。葡萄纹应用于各个方面，如壁画、铜镜等。这件垫套上的葡萄纹和都兰出土的葡萄纹绶上的葡萄纹很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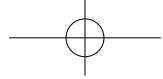
龟背纹起源很早，东汉时期即已应用，唐宋时已很流行，在永乐宫壁画的服饰图案中就有很多的龟背纹。

五、结语

通过对这件垫料的修复和研究，我们认为制作这件垫料的真丝缎和织锦很可能出于中原，再由皇帝赏赐或别的途径而到西藏。

在此次西藏博物馆藏品得到圆满修复保护完成之际，本人由衷地代表西藏博物馆向参与完成此项工作，并付出巨大努力的首都博物馆技术部刘树林主任、王亚容老师、张国英、付萌、黄悦、贾汀、栾桂芝及实验室的同仁表示谢意，正是在首都博物馆领导及上述同志无私的援助下，此次文物藏品修复保护才得以圆满、顺利的完成，从而更加提升了两馆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突显了民族团结互助的和睦。

（作者为西藏博物馆保管部主任）



北京丰台王佐遗址出土金属器的初步科学分析

杨 菊 李延祥 李建西

一、简介

王佐遗址位于丰台区南部西王佐村。2007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陶、瓷、金、银、铜、玉器等随葬器物。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合作,对遗址中墓葬出土的部分金、银、铜器进行了分析检测,并初步探讨了金银器的加工工艺。

二、样品和分析方法

本次科学分析涉及到的金属器有金器 16 件(组),鎏金银簪 1 件(M59:1),银环 1 件(M8:4),铜镜 1 件(M21:8),共计 19 件(组)。由于这些器物大部分保存完好,为保证其完整性,对其表面合金成分的检测均采用无损分析,即将金属器物直

接放在扫描电镜的样品台上,推进样品腔中进行分析,分析时尽量避开器物表面的污染物。而金属器表面及纹饰加工痕迹的观察是在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镜中分别进行,把观察到的有技术特征的痕迹进行照相记录。以上分析采用扫描电镜外接能谱(SEM-EDS)无标样定量分析方法(ZAF),所使用扫描电镜型号为日本电子公司的JSM6480LV,外接能谱为美国热电公司Noran System Six能谱色散仪,激发电压 20 千伏。对每个样品基体成分的扫描进行 1~4 次的面分析,累计分析面积不低于 15mm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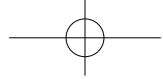
三、分析结果

1. 金器成分分析结果

共分析了 16 件(组)保存状况较好的金器的基本成分,分析结果参见表 1。

表 1 丰台王佐出土金器扫描电镜能谱无损分析结果

样品编号	器物名称	原始编号	分析部位	成分 (wt%)		
				Au	Ag	Cu
1	镯	M39:5	有花纹段	97.5	2.5	0.0
			无花纹段	97.0	3.0	0.0
2	戒指	M39:7	戒托	94.7	5.3	0.0
3	戒指	M39:8	戒托	83.4	13.9	2.7
4	镯	M39:11	有花纹段	97.4	2.1	0.5
			无花纹段	95.7	3.8	0.5
5	戒指	M39:12	戒托	93.4	6.4	0.2
6	戒指	M39:13	侧面	92.6	7.4	0.0
			连接处	91.8	6.9	1.3
			宝石底座	95.7	3.4	0.9
7	环	M39:15	侧面	97.8	1.5	0.7



北京丰台王佐遗址出土金属器的初步科学分析

样品编号	器物名称	原始编号	分析部位	成分 (wt%)		
				Au	Ag	Cu
8	环	M39:17	侧面	98.9	1.1	0.0
9	字簪	M76:2	字叶脉纹	96.3	2.7	1.0
			簪杆	98.6	0.7	0.7
10	簪	M76:3	簪杆	97.7	1.5	0.8
11	字簪	M76:4	簪杆	98.8	1.0	0.2
12	头花	M76:5	叶片	90.9	8.4	0.7
13	头花	M76:6	叶片	92.7	6.6	0.7
			枝	92.3	6.6	1.1
			网络连接处	87.2	11.4	1.4
			珠 1	88.2	10.6	1.2
			珠 2	86.6	10.9	2.5
			银针上缠金丝	85.2	14.3	0.5
14	头花	M76:7	叶片	95.5	3.5	1.0
			叶片	92.3	6.9	0.8
			网络连接处	83.3	15.2	1.5
			珠 1	80.5	18.4	1.1
			珠 2	83.6	13.8	2.6
15	环 (6枚)	M76:8	环 1	96.7	2.6	0.7
			环 2	97.5	1.8	0.7
			环 3	97.4	2.3	0.3
			环 4	98.2	1.3	0.5
			环 5	97.2	1.9	0.9
			环 6	97.7	1.9	0.4
			平均	97.4	2.0	0.6
16	簪	M76:9	簪杆	98.3	1.4	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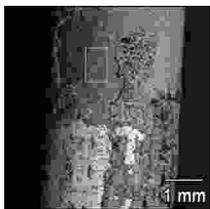
2. 鎏金银簪、铜镜、银环的成分分析结果

(1) 鎏金银簪 (M59:1), 簪体表面的背散射电子像白亮部分为覆盖鎏金层区域, 粗糙不平灰黑区为鎏金层脱落后露出的厚锈层, 平整灰黑区为厚锈层脱落后露出的金属银基体表面的薄锈层 (图 1、表 2)。虽然未检测得金属银基体的成分, 但通过表面锈蚀的成分仍判定鎏金银簪本体是含少量 Cu 的银合金。鎏金层含 20% 的 Ag 可能是鎏金过程中与银合金基体作用的结果, 也可能是用于调配金汞齐

的金料本身成色不高含较多 Ag。鎏金层中未检测出残留的 Hg, 推测不是采用汞鎏金的方法制作的。银器在空气中的锈蚀产物常有硫化物、氧化物等, 而此件鎏金银簪与传世银器锈蚀不同, 其锈蚀产物含明显的 Cl 和 O, 其中的 Cl 应源于埋藏环境。鎏金过程要经过金汞齐在器表的多次涂抹、烘烤、赶压, 才能在器物表面形成达到要求的金层。鎏金层表面背散射电子像显示出沿簪体方向有明显的赶压痕迹 (图 2)。

表 2 鎏金银簪 (M59:1) 扫描电镜能谱无损分析结果

分析位置	成分 (wt%)					
	O	Cl	Cu	Ag	Au	Hg
鎏金层 (区域 1)	n.d.	n.d.	0.9	20.2	78.9	n.d.
鎏金层 (区域 2)	n.d.	n.d.	2.1	19.1	78.8	n.d.
厚锈层 (区域 3)	13.0	21.9	0.5	64.6	n.d.	n.d.
薄锈层 (区域 4)	23.9	18.3	4.8	52.9	n.d.	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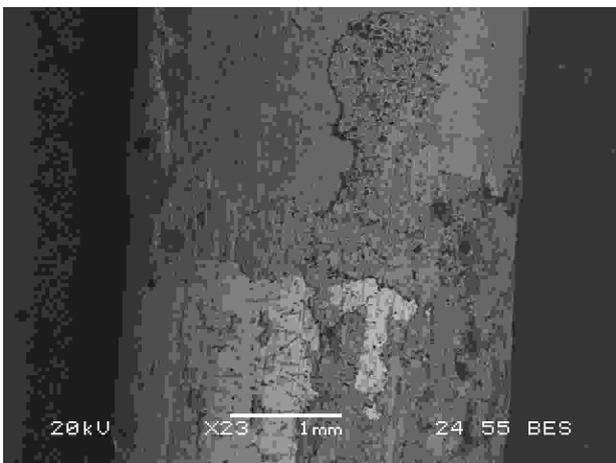


图1 鎏金银簪 (M59:1) 背散射电子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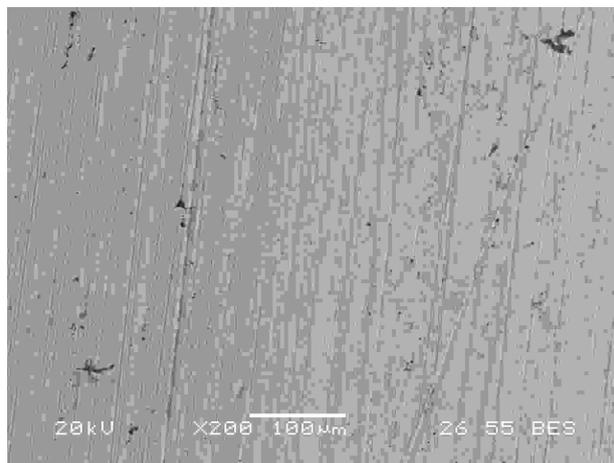


图2 鎏金银簪 (M59:1) 鎏金层表面背散射电子像

(2) 铜镜 (M21:8) 的检测, 对铜镜表面无厚锈区域以牛皮纸搽拭去表面氧化层直接送入样品仓作无损分析。结果表明铜镜成分与一般汉

代铜镜成分吻合, 属于低 Pb 高 Sn 青铜合金, 锈蚀成分含 Cl, 可能是有害锈, 应注意保护处理 (表 3)。

表 3 铜镜 (M21:8) 扫描电镜能谱无损分析结果

分析位置	成分 (wt%)			
	Cl	Cu	Sn	Pb
基体 (区域 1)	n.d.	73.7	22.5	3.9
基体 (区域 2)	n.d.	61.8	29.2	9.0
基体 (区域 3)	n.d.	69.0	28.7	2.4
平均	n.d.	68.2	26.8	5.1
点状锈蚀	35.8	64.2	n.d.	n.d.

(3) 银环 (M8:4) 的检测, 以细砂纸轻磨去表面氧化层露出极少金属基体, 分析显示基体成分为纯银, 未检测出其他微量元素 (图 3)。

异同对比, 可以对器物的制作工艺以及器物之间的关系及社会背景的探讨给出依据。

1. 复杂金器不同部件间的成分特征表明金器的生产制作采用了模块式生产模式, 应源于生产规模较大的商业作坊。比如两个头花 (M76:6, M76:7) 的网络状部分及其表面所缀金珠的成色稍低, 而枝叶部分成色都较高, 说明缀金珠的网络状部分和枝叶部分是使用不同批次 (成色) 的黄金预制, 最后组装而成, 应是生产规模较大的商业作坊的流水线性生产产品。个别器物背面见有商号戳记也印证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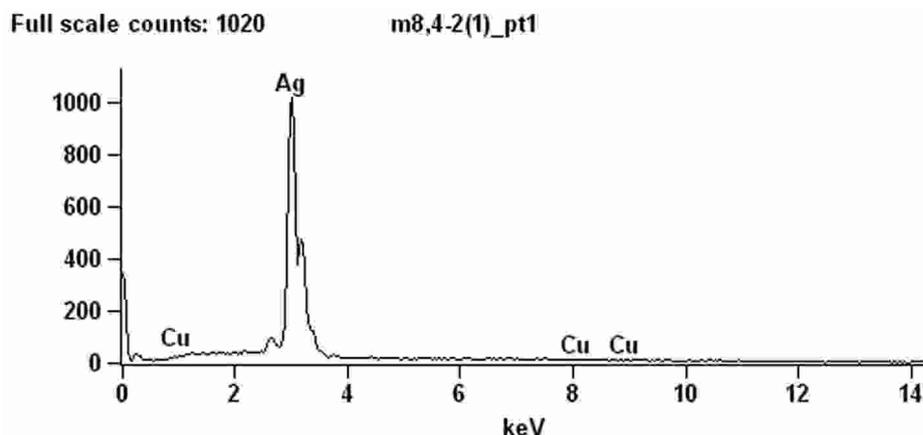


图3 银环 (M8:4) 能谱

四、结果讨论

通过器物之间以及器物不同部位之间成分的

2. 较简单的同组器物或同一器物不同部件间的成分都相近, 是利用同一批金料一次性制作完成的。M39 两件钺 (M39:5, M39:11) 都是由有花纹和无花纹两段组合成的, 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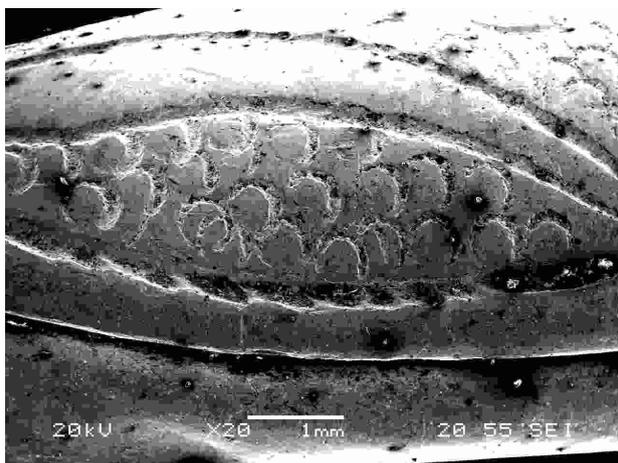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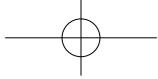


图5 镯 (M39:5) 二次电子像 (示鑿花工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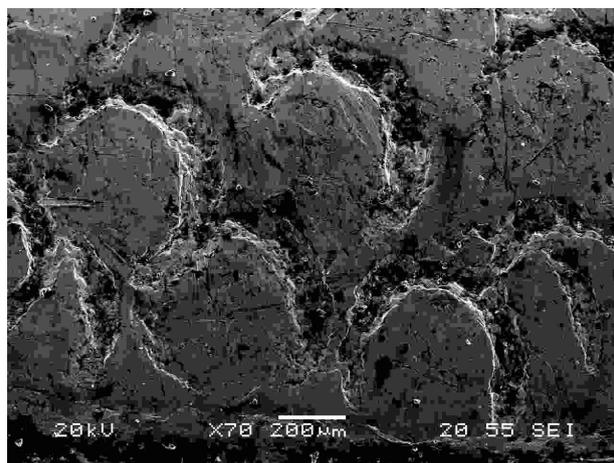


图6 镯 (M39:5) 二次电子像 (示左上两个具有相同细部特征的鑿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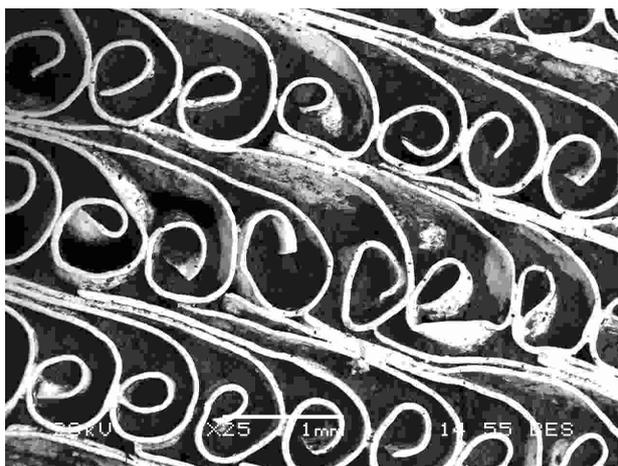


图7 卍字簪 (M76:2) 背散射电子像 (示花丝工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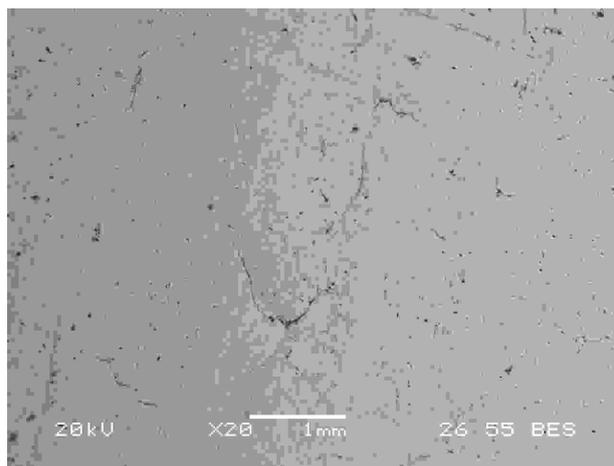


图8 簪 (M76:3) 背散射电子像 (示锤揲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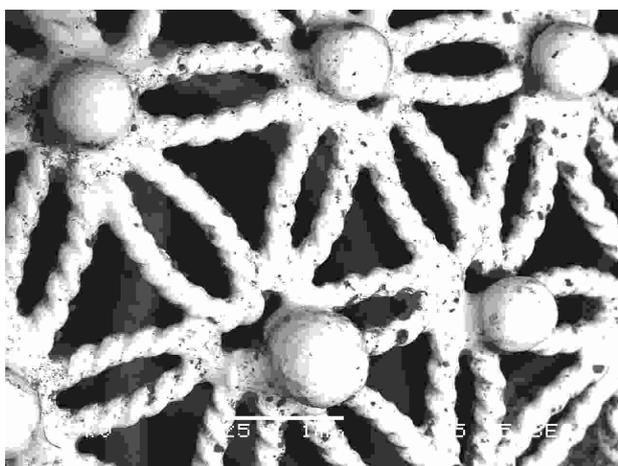


图9 头花 (M76:6) 背散射电子像 (示网络焊缀金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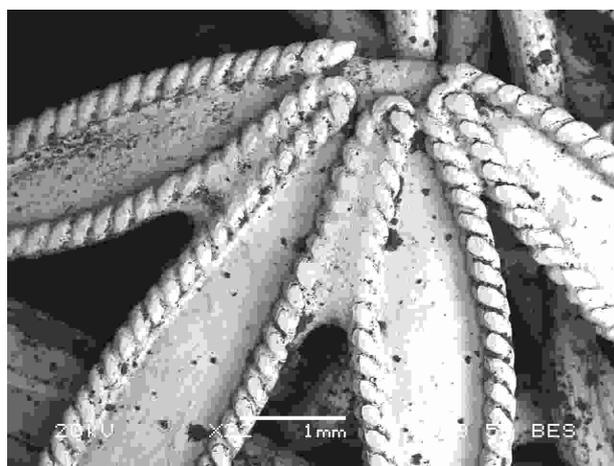


图10 头花 (M76:7) 背散射电子像 (示枝叶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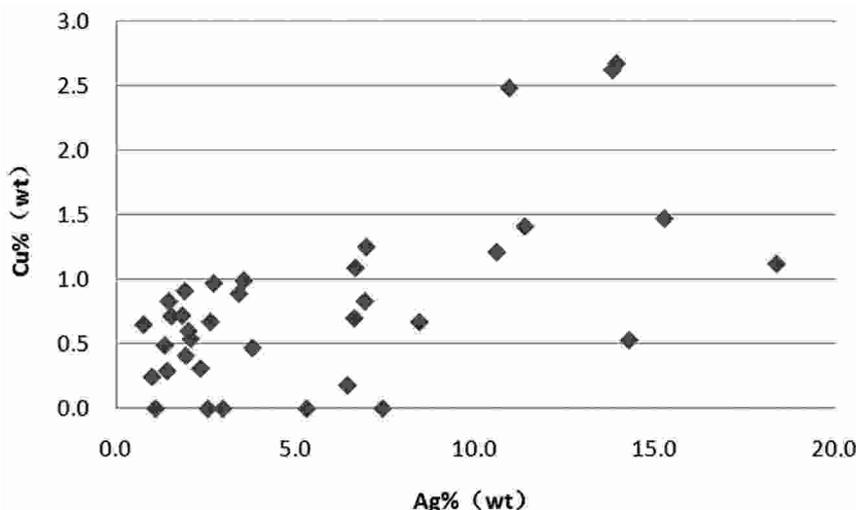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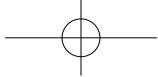


图4 金器 (含不同部位) 含Ag、Cu散点图

段成分一致, 两件镯之间成分也一致, 是使用同一批次 (成色) 的黄金材料制作的。环 (M76:8) 1组 6 枚, 平均成色 97.4%, 含 Ag 在 1.3%~ 2.6% 之间, 含 Cu 在 0.3%~ 0.9% 之间, 数据较集中, 从成分上进一步证实 6 枚环属于同一组器物。M76 有 4 件金簪, 其中两件 (M76:2, M76:4) 为形制相同的卍字簪, 明显为同组器物。两件卍字簪和另两件不同形制的金簪 (M76:3, M76:9) 成色都很高, 从成分上不能排除是制金作坊的同一批产品的可能性。M39 出土 4 枚戒指, 其中 1 件成分 (成色 83.4%) 与另外 3 枚戒指的主体部分成分 (成色 91.8%~ 94.7%) 明显不同, 可以断定不是制金作坊的同一批产品。戒指 M39:13 的指环和宝石底座部分成分也有一定差异, 可能是用不同黄金材料预制的构件。

3. 天然黄金一般含有少量 Ag、Cu, 而本批金器中有超过大半成色较高 (图 4), 含 Au 超过 95%, 可能经过了精炼提纯, 精炼方法推测是在敞口坩锅中氧化性气氛下熔炼将 Ag、Cu 等杂质氧化从而与黄金分离。M39 的 4 枚戒指和 M76 的头花各部件成色较低, 含 Ag 较高, 可能是为了防止在佩戴过程中的变形, 而有意选用成色稍低硬度稍大的金料, 而簪、镯等器物并不需要有很好的抗压性能, 可以使用成色较高较软的黄金。说明当时工匠能了解不同成色金料机械性能的差异, 并在制作不同器物时考虑金料成色不同引起的机械性能差异对使用性能的影响。

4. 对金器的宏观观察和显微照片的分析可判定这批金器的制作过程中使用了范铸、锤揲、掐丝、炸珠、焊接等成形工艺及鍍花、镶嵌等表面装饰工艺 (图 5~ 图 10)。

范铸是一种源自青铜铸造的加工工艺, 将金银液熔化后浇入范模以成器。锤揲利用了金银的延展性能, 用铁锤或木锤将金银锤打成片。焊接是在金银器部件之间浇灌金属液体以连接器物。掐丝利用金银的延展性能, 用工具将金银掐成各种纹样。炸珠通常用于制作大小金银珠, 即将熔化的金银液体滴入温水中, 利用表面张力使其凝固为大小不等的金银珠。鍍花就是用鍍刀在金银器表面刻画出各种花纹图案。镶嵌则是在金银器表面嵌入珍珠、水晶、宝石等饰物以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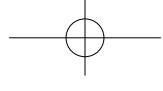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器物美观度。收挑也是一种鍍花工艺, 不同的是, 收挑时, 于器物两面鍍花, 有收有挑, 有凹有凸, 使金银器表面装饰纹样的立体感更强。

五、结论

对于王佐遗址出土金属器的分析表明, 这批金器中有超过大半成色较高, Au 含量超过 95%, 可能经过了精炼提纯。同时通过对戒指、头花、簪、镯等器物的成色对比发现, 当时的工匠可根据器物使用性能要求的不同, 而采用不同硬度的金料。另外, 金器不同部件间的成分特征也表明金器的生产制作采用了模块式生产模式, 这应源于生产规模较大的商业作坊。最后, 借助于宏观观察和显微照片, 可判定这批金器在制作过程中使用了范铸、锤揲、掐丝、炸珠、焊接等成形工艺及鍍花、镶嵌等表面装饰工艺, 几乎囊括了金器加工的各种工艺方法。由此进一步证实了清代金器加工工艺的繁荣, 表明其对中国传统工艺技法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总之, 对王佐遗址出土金属器的检测, 确认了器物材质和成色, 通过宏观观察、显微照片分析及器物之间、器物构件之间成分的异同对比, 推测了部分器物的制作加工工艺。综合以上可以看出清代金器的加工较为精细, 在器物的造型、纹饰、材质等各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馆员、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博士)



北京市文物局 2010 年二季度文博事业

大事记

4月7日 启动北京市文物普查实地调查验收工作，专家组对东城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阶段工作进行了试点验收。

4月7—9日 举办2010年度中青年干部培训班，采取领导授课、观看专题片、撰写培训心得、分组讨论等形式，分层次、分发展方向，有计划、有重点地培养中青年干部，为文博事业发展储备力量。局系统共120名中青年干部参加培训。

4月16日 北京市文物局青年学术论坛第19次活动在国子监敬一亭举行，主题为“北京的城门城墙”，正阳门管理处和北京古代钱币展览馆的同志介绍相关研究情况，首都博物馆刘高研究员现场点评。局系统50余名青年业务人员参加了活动。

4月20—24日 在大觉寺管理处举办两期法制培训班，培训内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行政复议法及案例分析。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局属单位的党政领导共120人参加了培训。

4月26日 北京市文物局2008—2009年度学术论文评比结果公布。一等奖王继红、高凯军；二等奖4名；三等奖7名；优秀奖7名。

4月29日 组织专家完成了北京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阶段省级验收工作，专家组检查了各区县普查资料。

4月份 完成对全市69家拍卖企业的年审材料初审工作，并上报国家文物局。

与雅昌网络数据监测中心合作，开展对全市文物流通领域的相关数据监测及市场调研工作，完成

《2010年一季度北京文物拍卖市场报告》。

5月10日 受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表彰，北京文博交流馆荣获2010年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先进集体、首都博物馆吴明荣获2010年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先进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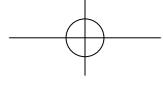
召开局属各单位党组书记例会，进一步落实全市宣传系统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及我局2010年组织宣传工作要点。

5月14日 北京市文物局青年学术论坛第20次活动在国子监敬一亭举行，主题为“北京市2009年考古发掘重要收获”，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同志介绍了延庆西屯基地和大兴高米店唐墓的发掘情况，并带领与会人员参观了明清建筑遗址考古工地。局系统30余名青年业务人员参加了活动。

5月14—17日 组织首都博物馆、北京文博交流馆、奥运博物馆及北京古玩城4家单位参加第六届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现场展出了奥运缶、“北京记忆”博物馆特色系列产品、仿元青花凤首扁壶系列产品等，并现场进行了智化寺京音乐表演和文物科学鉴定设备及技术展示，吸引了大量观众，获得一致好评。

5月18日 在首都博物馆举办了主题为“促人文建设 创世界城市”的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各区县文化委员会和各博物馆举办了多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展览和活动，全市大部分博物馆在5月18日当天对公众免费或优惠开放。

5月28日 在国子监彝伦堂举行了“第二届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启动仪式”，标志着文



资料信息

物博览会正式拉开大幕。

5月31日 完成对宋贾似道《宣示表》刻本原石的征集工作，藏品入藏首都博物馆。

启动2010年局属文物保护单位岁修保养工程。

5月份 申报2010年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3个。

6月1日 启动2010年局属各单位环境整治工作，消除安全隐患。

6月3日 北京市文物局学术报告会在首都博物馆多功能厅举行，清华大学建筑研究院副院长吕舟教授主讲“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趋势”。全市文博系统200余人参加。

6月10日 组织正阳门管理处夏明明《可置换濒危古钟的同类新产品研制与全面保护钟类文物的探索发现》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项目申报国家文物局2009年度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

参加北京市直属机关第三届运动会广播操比赛，取得了三等奖的好成绩。

6月11日 北京市文物局青年学术论坛第21次活动在国子监敬一亭举行，北京文物考古专家、局学术委员会委员吴梦麟研究员介绍文物古迹调查的经验和方法。局系统30余名青年业务人员参加了活动。

组织首都博物馆《首都博物馆藏北京地区经济史资料整理与研究》、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续修国子监志》、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钟铃文物概论》申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2010年度增补项目。

经北京市文物局、市政协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总参管理保障部服务局与故宫博物院签订了移交协议书，大高玄殿古建筑移交故宫博物院。

6月12日 在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举办2010年文化遗产日主会场活动。本市各遗产地、各区县在分会场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6月24 - 25日 为更好地完成2010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编制工作，召开记录档案制作工作经验交流会，总结与交流2009年制作70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的经验。

6月25 - 26日 组织局系统40余名新党员赴革命圣地西柏坡进行入党宣誓，并参观了西柏坡革命博物馆和中共中央旧址。

6月30日 与市文物鉴定委员会联合举办文物知识系列培训(二)，邀请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杂项专家夏更起先生讲授中国漆器、中国玻璃器的发展概述与鉴别。全市

文博系统约8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丽泽金融商务区B6、B7地块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结束。发掘面积38000平方米，共发现金代建筑基址57处，其中3处房址已发掘完毕，其余54处房址探明具体位置，并做了局部解剖。

6月份 完成北京美特斯邦威服饰博物馆的注销登记工作。

二季度 完成局属事业单位第二轮岗位设置及中层干部聘任工作；完成了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和文物出入境鉴定所纳入工资规范管理事业单位后在职、退休人员的职务核定工作。

完成对全市57场拍卖会52615件(套)标的的依法审鉴工作，确定国家一级珍贵文物30件，撤拍文物180件。

北京文物艺术品拍卖总成交额达121.24亿元，创单季度成交额最高纪录。黄庭坚书法《砥柱铭》以4.368亿元的天价，创中国艺术品成交最高纪录。

完成奥运博物馆展览大纲编写工作，展品征集工作取得进展，完成率达到61.7%。

继续推进文物调查及数据库建设工作，基本完成三级以上文物数据的采集工作，成立由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审核专家组”，分八个小组织开展数据审核工作。

完成局属各单位借入、借出文物的清理核查工作。据统计，目前局属各单位共有借入文物6558件，借出文物8368件。除局属单位之间借用文物外，文物借用涉及国家博物馆、国家大剧院、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焦作市博物馆、无锡博物院、各区县文管所等单位。

组织成立领导小组，研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工作。完成对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和占用情况、周边情况以及安全情况的拉网式排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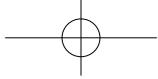
处理行政处罚案件两起。一是北京大学郝守刚教授未经批准擅自将清理发掘的门头沟东胡林地下文物收藏，并拒绝上交文物到指定博物馆的案件；二是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新街口管理所未经文物主管部门批准擅自拆除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广济寺文物围墙15.5米的案件。

接待公、检、法等部门涉案文物鉴定24次，鉴定涉案文物160余件。

完成香山昭庙、日坛棂星门神台、怀柔水长城、大觉寺北下院、丫髻山碧霞元君祠遗址抢险、太庙电路改造等20余项工程的招、投标工作，并办理工程开工及资金拨付的相关手续。

2010年第二季度市文物局属博物馆参观人数统计表

名 称	入馆总人数	购票人数	免票人数	学 生	老 人
首都博物馆	253131	15372	237759	27395	54410
大觉寺管理处	63292	50532	12760	488	5701
正阳门管理处	69962	68034	1928	140	590
徐悲鸿纪念馆	10678	0	10678	874	2420
北京文博交流馆	45489	41155	4334	688	865
北京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	9796	0	9796	3334	2292
北京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	14730	0	14730	6310	1050
北京艺术博物馆	211192	206901	4291	328	606
团城演武厅管理处	10571	0	10571	354	5677
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11042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	11295	5062	6233	913	2446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21816	18494	3322	456	354
白塔寺管理处	10992	6876	4116	80	1086
老舍纪念馆	3844	0	3844	1242	859
北京古代钱币展览馆	29757	28469	1288	111	1146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63554	60994	2560	607	1985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159134	150702	8432	16148	906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文博/陈晓苏主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402-2462-2

I. ①北… II. ①陈… III. ①文物工作—北京市—文集

②博物馆—工作—北京市—文集 IV. ①G269.27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02518号

责任编辑: 王 然

北京文博 (2010 *3)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邮箱)

中国印刷总公司

889×1194毫米 16开本 6.7印张 193千字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15元